

炎黄春秋

第 **7** 期
2011 年

建党90周年笔谈

宋平倡导的一次改革讨论

1959年对张闻天外交路线的批判

“延安一代”和“红岩一代”的心路历程

大清帝国的两道催命符

目 录

本刊特稿

- 1 适应时代 与时俱进——建党九十周年笔谈
- 1 继续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沈宝祥
- 3 一定要解决好民主化问题……何 方
- 5 执政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郭道晖
- 8 言论自由关系到党的兴衰……王海光
- 10 还权于民、让利于民才能保障民生……张曙光
- 11 守卫我党的政治伦理底线……周瑞金

求实篇

- 13 1959年对张闻天外交路线的批判……萧 扬
- 18 高学兰养鸡对不对?
——省委书记宋平倡导的一次改革讨论……秦卫东
- 21 1966年四见陈丕显……张文豹 口述 黄 谦 整理
- 26 一个沉冤几十年的大案……童梓平

一家言

- 31 应正式重新评价陈独秀……徐学江
- 35 “延安一代”和“红岩一代”的心路历程
——兼说他们的“两头真”……穆广仁

往事录

- 38 1956年的汉阳一中事件……朱 岩
- 40 李锐的坐牢心得……韩 磊
- 42 齐燕铭看闹剧……马 林
- 44 崔万秋不是文化特务……毛德传

亲历记

- 46 我眼中的广西文革……程 郁
- 51 我为周扬敲边鼓……邓伟志
- 53 一次“特殊”的抄家……季旭东
- 55 参加革命前后的记忆……戴 煌

品书斋

- 59 重读《国际歌》感言……杨 起
- 64 读《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翁永曦

人物志

- 66 湘西王陈渠珍……罗 维
- 71 抗日名将孙立人……陈 华 综合整理

忏悔录

- 75 我在“初澜”写文章……吴启文

古今谈

- 78 大清帝国的两道催命符……袁伟时
- 86 三国张鲁的“共产主义”辉煌……韩 起

海外事

- 88 戈尔巴乔夫与苏联解体……王铁群

顾 问:

杜润生 于光远 李 锐

编 委 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 实	王俊义	冯 健	冯其庸
卢跃刚	曲润海	何 方	吴 象
吴明瑜	宋木文	张文彬	张岂之
张希清	张荣华	张惠卿	杜 光
杜导正 (召集人)	李一鑫	李大同	李大同
李冰封	李宝光	李维民	杨天石
杨奎松	杨继绳 (副召集人)	沈志华	沈志华
苏双碧	邵燕祥	周瑞金	金冲及
赵德润	保育钧	郭道晖	资中筠
钟沛璋	凌 云	展 江	秦 晖
袁 鹰	袁伟时	高尚全	陶斯亮
钱理群	章诒和	萧蔚彬	彭 迪
韩 钢	董 健	曾彦修	鲁 諝
雷 颐	魏久明		

社 委 会:

杜导正 (主任) 吴 思 (副主任) 杨继绳
李 晨 徐庆全 胡竞成 张晓鸥

社 长:

杜导正

法定代表人、常务社长、总编辑: 吴 思

副 社 长: 杨继绳 李 晨

副 总 编 辑: 徐庆全 执行主编: 洪振快

社 长 助 理: 胡竞成 张晓鸥 杜明明

总 经 理: 李 晨

副总经理兼网络总监: 张晓鸥

理 事 长: 杜导正

副 理 事 长: 莊其環 李 琼

理 事: 白建钢

秘 书 长: 吴 思

副 秘 书 长: 杜明明

主管、主办单位: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 (吴昊越律师事務所 010-68083211)

步凌云 (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010-85869163)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国外发行代号: 1274M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 (所)

印刷: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编: 100045

本 刊 网 址: <http://www.yhcqw.com>

本刊电子信箱: yanhcq@sina.com

yanhcq@gmail.com

发行部邮箱: yhcqfxb01@126.com

电话: 发行部: 010—68532048 68539058

编辑室: 010—68534879 68523512

财务室: 68525374

办公室: 68522852 (传真)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 0296号

出版日期: 每月4日

定价: 8.00元

适应时代 与时俱进

——建党九十周年笔谈

编者按：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在90年的漫长岁月中，我们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使我们聪明起来，使我们今后的路走得更稳健。那么，最基本的经验教训是什么呢？在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以后，如何搞好党的建设？在新时期如何适应时代、与时俱进？在庆祝建党90周年之际，本刊编辑部举行笔谈，几位作者都是老党员，他们深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从六个方面回答了上述问题：一、继续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一定要解决好民主化问题；三、执政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四、言论自由关系到党的兴衰；五、还权于民、让利于民才能保障民生；六、守卫我党的政治伦理底线。

继续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 沈宝祥

在七十年代末的拨乱反正中，胡耀邦提出，研究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讲话，要看实践。他主张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总结和评价十年“文革”。他以实践标准排除了多年来流行的文件标准、语录标准。他审阅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稿，并拍板定稿。这篇文章的发表，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有力支持引导下，这场大讨论取得了完全的成功，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伟大历史转折，作了思想准备。

正如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那篇著名讲话中所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

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实践标准的提出，现实的针对性就是“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从我们党九十年的历史进程来看，实践标准的提出，有更深刻的背景。

我们党建立以后，置身于中国这样一个特殊性很大的社会，如何认识中国的基本国情，如何解决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只有靠中国共产党人自己在实践中探索。这就需要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经过全党同志的努力，特别是毛泽东的总结概括和倡导，我们党形成了一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党制定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一整套独创的方针政策、战略战术，取得了新

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邓小平说,“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23页)这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可是,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我们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逐渐偏离甚至抛开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搞大跃进、人民公社,特别是搞了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那时,邓小平所说的“亡党亡国”的危险,现实地摆在我们的面前!

需要我们严肃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是,为什么在长达二十多年的实践中,错误一犯再犯,后果越来越严重,而不能得到纠正呢?为什么前一阶段依靠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在另一种条件下,却走到了反面呢?

这是需要从多方面研究的课题。这里仅从思想路线的角度略作探讨。

实事求是,是一个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认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的认识成果,包括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也包括制度、体制等等,有可能是完全正确或基本正确的,也可能有部分错误甚至完全错误。这就需要有一个客观标准来检验,有一个客观见之于主观的过程。这样,才能保证认识的正确,不犯大错误。但是,在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二十多年中,由于认识主体的盲目自信,独断专行,也由于迷信盛行,人们盲目相信“句句是真理”。因此,在长时期中,不能自觉地拿起实践标准来检验主观世界的东西,甚至对于实践检验十分反感,将敢于以实践标准进行检验的同志打下去(如彭德怀等人在庐山会议上提出批评而被打成反党集团)。

实践标准本来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也可以说是一种常识,但要将这个原理同我们的政治生活紧密联系起来,真正成为人们的思想武器,还是很不容易的。实践标准的提出,实践标准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接受,这是付出了沉重代价后取得的思想升华。

粉碎“四人帮”以后提出“两个凡是”,有现实的背景。但“两个凡是”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由来已久,积习很深,是一种历史遗产。

经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

推倒了“两个凡是”,实现了一次思想大解放。从我们党九十年的历史来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出,也是全党思维方式的一个深刻转变,是一种新的觉醒,意义很深远。

在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我们就是依靠实践标准,破除了各种传统观念,冲破各种陈旧框框的束缚,不断开拓创新。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有人提出“姓资姓社”的问题,这是“两个凡是”的翻版。针对“姓资姓社”的诘难,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这是实践标准的展开。“三个有利于”标准有力地破除了“姓资姓社”的阻力,推进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推进了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推进了对外开放,有效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正如有的干部所说,这些年,我们就是靠“三个有利于”壮了胆。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也正是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十二五”时期。我们面临着新的机遇,也遇到了新的挑战。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各方面的体制改革,亟待深化,许多发展难题有待破解,人民有新的期待。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传统观念在各个领域仍然顽强地存在着,在舆论中不时地出现怪议论,实际仍是“左”的一套,只是换了新的装束而已。在当前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我们要更自觉地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断推进思想解放。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推进思想解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对这些经验,我们要珍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记取过去长时期中,未能用实践标准检验自己主观世界的东西,因而不能及时发现错误、纠正错误,从而造成严重后果的深刻教训。

我们所说的实践,是社会的实践,人民群众的实践。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要虚心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尊重人民群众的意愿。实践检验是一个历史过程,有些问题,要经过历史的沉淀,才能看清楚,因此,对有些事,不宜匆忙做出结论,宣布完全正确,要让历史来检验。要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就必须有勇气面对真实的历史,有勇气还原历史真相。■

(作者为中央党校教授)

一定要解决好民主化问题

。 何 方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开始的 1942 年说过,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两个生动活泼时期,一个是五四运动到大革命,一个是遵义会议到现在。他说的生动活泼局面,主要就是指有一定的民主制度和民主生活。

第一个时期的总书记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他严格遵守每年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制度。按党章规定,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有权制定党的政策路线,改选党的中央领导。不仅在大会期间,就是平时,党也让党员享受到应有的知情权、发言权和选举权,可以公开讨论党的方针政策,批评党的各级领导。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约束和干涉,这一时期的民主制度与民主生活还会更加健康和更加活跃。

第二个时期的总书记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张闻天。他更是尽最大力气发扬党内民主。虽然在他的任内因故没能开成党的七大,但他却以分别召开苏区和白区党的代表大会作了弥补。特别是在实际工作中,他坚持真正民主的集体领导,一切重要问题由会议讨论决定,绝不个人说了算。所以在他履行总书记职责的四年(1935-1938)中,中央各种形式的会议就开了 137 次。

此后,特别是经过延安整风,党中央的会议就大为减少了,以致 1931 年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召开的党的七大,1939 年各地已陆续选出代表(这也是我入党 73 年来唯一一次参加直接选举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但却没有按期开会,而是让聚集延安的代表进党校,参加整风,又开了近一年的七中全会,直到 1945 年才开成七大。这已多少有点不正常。而七大后过了 11 年(七大党章规定为 3 年),直到 1956 年才开八大。八大到九大,又隔了 11 年。只是九大到十大却只隔 4 年。那是

因为这两次会的重点都是要在党章中确定林彪的地位。九大党章规定林彪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但是,这种提法在林彪出逃后不能不从党章中去掉了。所以才不得不破例(因九大通过的党章规定每 5 年举行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十大。对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代表大会尚且如此随意,其他各种会议就更不在话下了。

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向全国人民做出了实行民主的承诺。人们都记得,1945 年毛泽东和黄炎培有著名的延安“窑洞对”。毛主席答应,执政后要走民主的道路,让人民监督政府。同年他在答复路透社记者甘贝尔的提问时说得更明确。他说,“‘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按即: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

我们党一直批评国民党的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专制制度。抗战期间我们要求国民党实行宪政,并于 1940 年 2 月成立了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我就亲耳听到毛泽东在会上批评蒋介石是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还说国民党顽固派是《封神演义》上的申公豹,走路只知道后退,所以我们要促进他向前走。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年周年纪念,明年又要召开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由党中央带头,发动全党同志,认真总结一下党在民主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履行以往在实行民主宪政问题上的承诺,把真正的党内民主制度和民主生活建立起来。

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
中,提出了许多正确主张,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
也有不少沉痛教训。而最大的教训,就是没有解
决好党的民主化问题。造成这个问题的根源有两
个。

一是没有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这里
说的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是指它的后期。因为
按照恩格斯的说明,马克思主义分为前后两个时
期。前期以《共产党宣言》、《法兰西阶级斗争》、
《哥达纲领批判》三大名篇为代表,坚持共产主义
理念,主张暴力夺取政权。对于这样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用一句著名的话给否定掉了,这就是
他说的,“我只知道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另据恩格斯的解释,后期的马克思主义不再坚持
共产主义理念与目标,主张和平过渡和实行社会
民主主义。欧洲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就是根据
这一理论建立起来的。这一阶段的代表作是恩格
斯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其中明确宣示放
弃共产主义理念。可惜列宁生前没能看到这一重
要文献。)。后来以列宁为代表的“左”派从第二
国际分裂出来,恢复了共产主义的理念和目标,组
建了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马、恩的建党思想
和列宁的建党思想的最大区别,不仅表现在放弃
还是坚持共产主义理念,更重要的还是马、恩主
张民主,列宁强调集中。延安整风文献中,有一篇
得到毛泽东高度赞赏的刘少奇《论党内斗争》,在
强调中国建党特点时也正好说明了这两个问题。
他说的第一个特点是,中国党“从一开始就是在
共产国际的指导之下,照着列宁的原则去进行建
设”的,“第二,中国党从开始到现在,在思想上和
组织上都没有受到欧洲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的
影响。”

中国党没能解决好民主问题的第二个原因,
是受两千年皇权专制主义传统的影响。从建党一
直到取得政权,中国都处在农业社会,党的基础
在农村,绝大多数党员也是农民。而中国的农民,
同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描写的法国农
民一样:他们的生产落后,思想保守,留恋过去,
缺乏自信,崇拜英雄,寄希望于清官和好皇帝。这
些特点正好成了制造个人崇拜和实行专制主义
的基础。1942年开展的整风运动,不再强调党内
民主,只有“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

书记处实行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党内干部的
任免,基本上也由上级党委决定,既经过民主
手续产生候选人和实行真正的差额选举,更没有
自由讨论和个人竞选,即使举行选举也只能流于
形式。

时间过去了好几十年,中国的工业化已经完
成,经验教训已经清楚,现在应该是我们兑现民
主承诺,认真实行宪政的时候了。为此,在当前就
要先做一些实事,如:提高普通党员的权利,降低
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权力;实现十三大提出的
党政分开;禁止个人崇拜和肃清其以往的流毒;
党的各级干部每年向各自任职范围(区向全区,
县向全县,省向全省,中央向全国)公布拥有的财
产和家庭情况,制定法规和采取行政措施,有效
地抑制成为当前民主化最大障碍的权贵阶层和
利益集团,严禁其滋长,等等。不采取实际行动落
实对民主问题的承诺,讲的再多再好也都是空
话,只能损害和丧失党在群众中的诚信。■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本刊稿件选用标准

一,本刊重点关注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
事件,特别关注亲历者的叙述。

二,内容真实可靠,不可有任何虚构。文中重
要引语,请注明出处。

三,篇幅不要过长,一般四五千字,长篇最好
在八千字之内。

四,原则上—稿—投。如一稿多投请予说明。

五,投稿三个月以上,未接到采用通知,请作
者另行处理。作者请自留底稿,本刊无力退稿。

本刊社址: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100045

本刊电话:010-68534879

传 真:010-68532569

编辑部邮箱:yanhcq@sina.com

本刊启事

凡未收到稿酬的作者,请将联系地
址、邮编和身份证号码告知我社。

联系人:肖林 电话:010-68525374

执政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 郭道晖

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 90 年的旅程，其中 28 年是作为革命党驰骋于中国政坛，62 年是作为执政党统领共和国的一切。在 90 年的“长征”中，既有辉煌的胜利，也有惨痛的失败，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沉痛的教训。其中如何在指导思想上实现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在治国方略上切实实行依宪治国，是夺取政权后必须解决和迄今尚未完全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治国的铁则与血的教训

2010 年 9 月 23 日温家宝总理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主持人法里德·扎卡里亚的访问时说：“我的观点是，一个政党在执政之后，应该和夺取政权时期有所不同。最大的不同是政党应该根据宪法和法律行事。……任何党派、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过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我认为这是现代政治体系中的重要特征。”这一“特征”和准则已载入 1982 年修订的宪法，随后“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也纳入党章，“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也已在 1999 年成为宪法的准则。2002 年 12 月 26 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在进行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特别安排学习宪法。胡锦涛在讲话中说，我们党是执政党，要坚持依法执政，应该在贯彻实施宪法上为全社会作出表率。（《人民日报》，2002 年 12 月 27 日）

党的领导为什么要特别重视宪法，党章为什么要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不仅是世界各民主国家治国的铁则，在我国还有血的教训为背景。

众所周知，由于过去我国执政党长期坚持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治党路线，轻视和践踏法治，导致党和国家及广大干部和群众深受其害，即使是党的高层领导人也难逃劫难。1959 年通过一个党内会议，就可以按党的领袖的意志把人大选举产生的国防部长彭德怀罢免，最后置于死地。文革中他的一张大字报就可以打倒一个按宪法选举产生的国家主席，待到被残酷批斗的刘少奇拿出宪法来试图维护自己的尊严和权利时，为时已晚，最终屈死他乡。我还亲聆彭真在 1979 年刚从秦城监狱中“解放”出来就任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时说过：他坐过 6 年国民党的牢；没有想到文革中，他竟又坐了 9 年半我们自己党的牢。这不能不引起他，以及许多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关进监狱的老革命的沉痛反思：这是“为什么”？——终于恍然大悟：这是过去党轻视法制、破坏法制所受的惩罚，否定法制也就否定了自己！

“以党治国”还是“法治天下”？

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无法无天的乱局已经得到纠正，法律制度和举国上下的法治意识都有较大进步。但毋庸讳言，某些漠视宪法的旧思维和违宪的行为仍不时发生，一些部门和地方近年还有所加剧。

是沿袭革命党的惯性，“马上打天下也继续马上治天下”，还是法治天下？是以党治国，还是依法治国？至今有些党政干部不能说已完全搞清楚。譬如，有人说，司法是“小技”，要服从政治“大道”，要服从“党的绝对领导”。这种观念使人不禁记起 1958 年 6 月最高法院党组向党中央的报告，其中就提出，“人民法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成为党的驯服工具。……不仅要坚决服从党

的方针政策的领导,而且要坚决服从党对审批具体案件以及其他一切方面的指示和监督。”这不但否定了宪法规定的法院独立审判权,而且把共产党置于违宪的境地。因为所谓“绝对领导”就意味着排斥其他任何领导;而法院和检察院却是由人大选举产生的,要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其实,这种错误观念早就受到刘少奇的批评,他指出:“不要提政法机关绝对服从各级党委的领导,它违法,就不能服从。”(《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51~452页。)

现在以党权干预司法的现象,并不鲜见。有些地方的司法机关甚至异化为一些贪官污吏、官僚权贵的家丁打手。他们越过法律程序,跨省抓捕那些批评检举当地党政官员腐败丑闻的公民,把他们扣以“侵犯名誉权”或“诽谤罪”,甚至“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投入监狱。或者半夜闯入民宅,不出示任何法律文书,就实施逮捕、抄家,实行先逮捕后罗织证据和罪名的“有罪推定”,长期羁押,不予审判,又拒不通知其家属;有的地方还搞什么罪犯公审大会,或押解妓女游街示众。这实际上是文革中无法无天的某些“要素”的复活。

这些不仅扭曲了党与司法的关系,而且涉及执政党同国家宪政体制的法理关系。党的十三大报告曾要求“划清党组织与国家政权的职能,理顺党组织与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十六大报告进一步要求“规范党委与人大的关系”。现行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这就表明在全国人大之上不能再有比它更高的国家权力机关。对比文革中产生的1975年宪法,曾在第16条中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这就无异于把执政党视为高于人大的国家权力机关,或者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从而混淆了党的政治领导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对此,1978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都作了更正,删去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语。

列宁讲过:“苏维埃高于一切政党。”(《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26卷第467页)“无产阶级专政不等于党专政,必须划清党的机关和苏维埃机关的界限。”(列宁在俄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转引自《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224~225页。)我国执政党与人大的关系也应是如此。在国家事务

中,人大的权力是至上的,人大高于一切政党,包括执政的共产党。诚然,我国宪法在序言中表述和肯定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的作用,但并未规定中国共产党是当然的执政党,二者是有区别的。共产党及其领导人要“执政”,必须通过每5年一次的人大选举,才能担任国家领导人,行使国家权力,依法执政。人们常说,我们党成为执政党“是历史的选择”,然而,我们也必须明白,“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2004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早在1941年4月,邓小平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中就指出“以党治国”的错误,严厉批评一些同志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遇事干涉政府工作,随便改变上级政府的法令,甚至把“党权高于一切”发展成“党员高于一切”。他尖锐地说:“‘以党治国’是国民党遗毒,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它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他明确表示:“我们反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一党专政,我们尤要反对国民党的遗毒传播到我们党内来。”(《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0~12页、19页。)可惜的是,这种遗毒仍或多或少遗留至今。

至于党与法的关系,也是迄今尚未完全摆正的老问题。所谓不能“以党代政”,实质上是不能以党权代国权,以党代国法。虽则在正常的宪制下,全国人大的立法工作,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进行的,宪法和法律一般是党的主张与人民意志的统一,但当党的主张(特别是地方党委的主张)同人民(人大)的意志(法律)不一致时,则应当服从人大和法律。现在讲“三个至上”(即党的事业、宪法法律、人民利益至上),如果它们发生矛盾时,谁至上?——显然,最终应是人民利益至上。因为党的事业和宪法法律都必须以人民利益为依归。

现今有些党政官员虽言必称法,却有意无意地扭曲法治的原则。他们把依法治国(重心是依法治权治官)变为主要是以法治民;他们立法谋私,执法违法,或者以法抗法,以小法(维护本部门、本地方利益的规章和“红头文件”)冲击、抵制大法(宪法和法律)。他们还乱用“两类矛盾”论,把日益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简单化为政治上的敌我两类,非我即敌,以所谓“六条政治标准”或

者哲学上的“对抗与非对抗性”来划分敌我,把依法抵抗政府侵权行为的人民群众视为“敌对势力”,予以压制,而不是诉诸法律。有的官员还爆出一些违反法治的雷人怪语,诸如“法律不是挡箭牌”,“你是准备替党讲话还是替老百姓讲话”,“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做不上访的良民”(这里潜台词是上访者都是“刁民”),“如果你上访,还只是人民内部矛盾;你要罢免市长,就是敌我矛盾。”“谁耽误嘉禾发展一阵子,就让他难受一辈子”,“什么法不法,老子就是法”……等等。都是对宪政的无知和对法治的蔑视!

治党也不能违法

“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原则还要求党章、“党法”不能与国法相抵触。政党在治理本党事务时有一定的自治权,但不能超越宪法和法律。截至1976年,全世界有157部宪法文件对政党作了规定,大多强调各政党的组成宗旨和纲领、组织原则和对内对外活动,都必须符合民主宪政原则、公开性和非暴力原则。德国的《基本法》(即宪法)规定:某一政党意图侵犯或废除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是违反宪法的。法国宪法第4条规定:各党派必须遵守国家主权原则和民主原则。我们中国共产党也应是现代的民主政党,不能借口党的“铁的纪律”,剥夺党员作为公民应当享有的宪法权利,如基本的言论自由和人身自由等。恩格斯1889年在批评丹麦党把持不同观点的党员开除出党的作法时,曾经指出:

“工人运动的基础是最尖锐地批判现存社会,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见恩格斯致格·特刊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7卷第323~324页。)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指出:“发扬党内民主,首先要允许党员发表不同的意见”,“由于认识错误而讲错了话或者写了有错误的文章,不得认为是违反了党纪而给予处分。”对党员对党组织或党内领导人的批评,“不允许追查所谓动机

和背景”。1995年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试行)》中,规定党员有权在党的会议上就党的政策和理论问题“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在党刊党报上以个人名义投送稿件无须经过其所在党组织审阅或批准。(第9条)党员也有权批评党的任何组织与党员。(第11条)这些党规应当受到极大重视与执行。

执政党是保证实施宪法的工具和宪法监督的对象

我国法治建设发展到今天,仅仅单讲依法治国的“形式法治”已经不够了,问题还在于依的是良法还是恶法?依“法”治谁?谁是治国的主体?凡此要求我们将法治提到宪治的高度,强调依宪治国,建立民主宪政国家。

执政党要依宪执政,首先要求执政的合宪性,即党恪守宪法规定,经全民真正民主的选举,进入宪政体制,组成人大和政府,依法行使国家权力;二是要求执政党成为领导自己的党和全体党员、特别是党的广大干部实施宪法和法律的工具,而不是把宪法和法律只当成是党实现自己政策主张的工具。邓小平在党的八大报告中就曾指出,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为完成特定历史任务的工具。(《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18页)第三是要求党是受宪法和法律所制约的对象,不得享有超越宪法与法律的特权。第四要厉行责任政治,有一份权力就有一份责任,特别是在法治、人权、保护私有财产等等原则入宪后,执政党的党员官员、党组织如果在处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上还继续搞人治,违反法治;或侵犯公民人身、财产、自由等人权,就构成违宪行为,应当受到宪法和法律的追究。

依宪执政当然不限于上述几点。但我深信,能认知和履行这些宪政原则,党的威望和执政地位与能力就会有所提高,真正的宪政国家有望实现。■

(作者现任北京大学宪法行政法导师组成员,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

言论自由关系到党的兴衰

○ 王海光

凡是具有现代政治观念的人都知道,言论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础。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到了工业文明阶段,民主的平权体制代替了君主的集权体制,言论自由的价值被提升到人的基本权利的首位,从而使人类的创造力空前蓬勃的爆发。现代文明对言论自由的需要,如同需要阳光一样,是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内容,成为现代社会构成的一个基本要件。现代革命运动都把争取言论自由为首的各项人民权利作为自己的革命目标。在现代国家的宪法中,无一例外地都列有公民言论自由的条文。

马克思主义就是在争取言论自由的过程中产生的。青年马克思当年曾愤怒谴责普鲁士的新闻检查制度,他批驳普鲁士政府以防止坏人参与的借口限制出版自由,他严正指出:“新闻出版自由不会造成‘变动的局势’,正如天文学家的望远镜不会引起宇宙系统的变动一样。”他断言“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

但是,马克思捍卫言论自由的立场,却没有被后来号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所继承。前苏联政权就是一个典型。他们在社会上压制任何不同声音,在党内残酷地镇压反对派,使全社会只有一种声音,即当权者的声音。

自中共诞生之日起,就把实现人民的基本权利作为自己的革命旗帜。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讲:“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1945年的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在向中外媒体公开讲话中说:中国人民建立的民主自由的中国,将实现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即:“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作为中国革命的成果之一,思想、言论自由的条款写入了新中国的建国大纲《共同纲领》之中,并被《五四宪法》和以后的其他宪法所继承。可见,认真落实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不仅

是捍卫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也是捍卫千百万革命志士流血牺牲得来的最重要的革命成果。

从党的历史上看,对言论自由的限制总是与错误和失败联系在一起。早在苏维埃革命时期,受到来自苏联肃反扩大化的影响,在各根据地相继开展了肃AB团、肃改组派、肃社会民主党的活动,捕风捉影,以言定罪,刑讯逼供,杀戮的干部战士据说有十万之众,而红军最多时也不过三十万人。在成为执政党之后,党也犯了诸如“反右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严重错误。分析这些错误发生的最初根源,也都能追究到限制言论自由的上面。

限制言论自由和政策错误有着不解之缘的道理其实非常简单。人类的许多实践活动实际上是“试错”性的探索,而言论自由是形成政治“纠错”机制的必要条件。有了言论自由,小错不至于变大,危害不至于蔓延。丧失了言论自由,国家的政治活动也就丧失了“纠错”的能力。往往是错误政策形成了全局性灾难以后才能被发现和纠正。在纠错的过程中,当政者不约而同地都提到开放言论的问题,曾有许多非常精彩的论述。如在总结“大跃进”失误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说:“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要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就必须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在党内是这样,在党外也是这样。”“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们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会后他还讲过:“从前老是讲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事实上没有实行,言者还是有罪。”反右运动“带来一个缺点,就是人家不敢讲话了。”

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讲话说:“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现在党内外小道消息很多,真真假假,这是对

长期缺乏政治民主的一种惩罚。”“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

其实,对于言论自由与社会稳定的关系,早就有古训可鉴。《国语·周语上》有言:“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历史经验一再证明,防与堵的办法是囤积和激化社会矛盾的办法。限制人民的言论自由,短期似乎是维护了稳定,长期则是在制造动乱。限制人民的言论,是消灭了社会的理性声音,制造了人民愤怒的怨气,以至于把小问题积累成大问题,个别问题聚合成群体问题,具体问题上升为抽象问题,致使各种矛盾不断激化,造成了自己全面崩溃的条件。正如唐人章碣的《焚书坑》诗云:“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中国几千年专制王朝的历史,不断上演的就是这种“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

现代民主政治的伟大之处,就是彻底摆脱了专制体制的政权狭隘性,把言论自由法定为每个人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从而确立了民主法治的基石,保证了国家政治的稳定性。限制人民的言论自由,无疑是旧时代的腐朽势力对历史进步的反动。而在当今的网络信息时代,限制言论自由,不仅是历史的反动,更是当政者力所不能及的。

中国共产党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现代政党,维护人民言论自由不仅是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而且也是实现中国现代化必不可少的条件,践行“三个代表”的基本前提。

从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来看,言论自由为社会提供了创造力的源泉。近代以来所有的重大技术创新,几乎都出现在言论自由的国家。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得到了举世瞩目的高速发展。现在,我们已经把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推广到了世界每一个角落。但是,我们“中国制造”的东西,并没有多少是自己的技术创新、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要把“中国制造”变为“中国创造”,需要全面提升我们思想力和创造力。而这除了充分发扬言论自由外,别无他途。

从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来看,言论自由也是

必不可少的。让各种思想、学说、流派能够自由地生长起来,在交锋、借鉴、比较、鉴别中,分辨真假,激扬美善,才能产生引领时代潮流的先进文化。而仅靠政府权力和金钱投入,能够扩张教学大楼的规模,但营造不出大学的学术。限制了言论自由,只让人讲官方课本上的话,势必降低人们思想能力和智力水准。

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是我党的宗旨。而人民的利益都是由一个个的个体利益组成的,只有在言论自由的环境下,个体的利益诉求才能得到表达。只有个体的利益得到了充分的表达,人民的利益才有具体的内容。如果不让人讲话,人们的利益诉求得不到伸张,最后只能把各种问题的原因归咎于当政者,不可避免地制造出社会动乱。最近,江西抚州市发生的连环汽车爆炸案,就是因为当事人因拆迁纠纷维权无果,最后绝望地采取以命相搏的极端报复行动。这类“黑色正义”行动的出现,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社会信号。说明依靠政府单向度的“维稳”,已经走到了尽头。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网络信息时代,目前网民数量已达4.77亿人,微博、Twitter等先进的通讯技术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任何政权要想控制信息传播,不仅要付出极高的执政代价,最后还都会是徒劳无功的。也就是说,在汹涌而来的信息技术革命的条件下,对言论自由的“堵”是堵不住的,只能是顺势而为。我们党引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目标,是要建立民主政治、法治国家、公民社会,保护人民言论自由的权利,正是其中应有之义,这与信息时代的发展要求是并行不悖的事情。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90年历史经验的政党。在对待言论自由问题上的经验和教训使我们懂得:不让人民说话,必然是理性不彰,戾气上升,暴力张扬;让人民说话,权力就可能服从真理,正气就可能得到伸张,社会就可能在和谐中发展。当前,中国的发展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也是前所未有的,需要我们党进一步加强执政基础,率领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地实现中国现代化。而要做到这一点,言论自由正是不二法门。■

(本文作者是中央党校教授)

还权于民、让利于民才能保障民生

○ 张曙光

我们的政府叫人民政府,党和政府部门的门口都有“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之类的标语。然而,这不只是讲在嘴上、写在纸上、贴在墙上的东西,必须落实到行动上;不是只在一两件事情上这样做,而是在所有事情上都这样做;也不是只有一段时间不能违背,其他时间可以另搞一套,而是全时空和全覆盖的。由于社会的复杂、组织的局限、人性的缺陷,完全做到是不大可能的,但在基本的方面和主要的问题上做到,就不错了;如果在主要的方面能够不断前进、不断改善,那就更好了。

不过,口号往往是给人看的,很难用来衡量和检验相应主体的行为。哪一个政府官员和党的领导不说自己是为人民服务的?最近被“双规”的铁道部长刘志军及其同伙、那个与本人同名的总工程师不也把“为人民服务”叫得震天响吗?但是,他们的行为却完全违背了一个共产党员和政府官员的起码要求,他们是立党为私,执政为己。不仅如此,这些口号也过于一般化,过去这样提,现在也这样提,正确时如此讲,错误时也如此讲,不能恰当地针对当前中国的社会政治现实。

那么,怎么办呢?也许有两句话是恰当的,它既符合共产党的纲领,又适合当前中国的社会政治现实,还可以用来检验党政官员的行为。这两句话就是:还权于民,让利于民。近年来媒体上一直强调改善民生。其实,改善民生不是靠政府的恩赐,只要真正落实“还权于民,让利于民”这八个字就行了。

党和政府的权力不是神授的,也不完全是用枪杆子夺来的,而是老百姓给予的。因为,政权的合法性归根结蒂来自民意,来自老百姓的认可和拥戴。如果民心生变,民意他向,政权的合法性就会出现危机。要知道,过去的一致拥护,既有真心的表示,也有高压的成分。而今天的各种怨言、不满、政治笑话以及对政府的公开批评,是大好事,

它直白或曲折地表达了民心舆情,值得党和政府高度关注。

老百姓给予政府的是公权,而不是私权,包括征税的权力、维持治安和秩序的权力、合法化的权力。公权是保护私权的,而不能侵犯私权。私权侵犯私权,政府应当以法秉公处理;公权侵犯私权,是社会的乱源。在建立传统计划经济时,党和政府通过所谓社会主义改造,侵犯了私人的财产权利;在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除继续侵犯财产权外,强行大办公共食堂,侵犯了私人生活的决策权利;在反右派、文化大革命等历次政治运动中,侵犯了一般人作为人的人格尊严和自由权利,以至生灵涂炭,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灾难。改革开放,我们改弦更张,走上市场化的道路。说到底,所谓经济体制改革,承认民营经济的合法性,不过是把过去政府公权力侵占的一部分私人权利还给个人,从而造成了30多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到今天为止,改革的任务尚未完成,反而出现了反复和倒退,发生了严重的扭曲,国有部门的垄断地位在继续加强,公权无限扩张和侵犯私权的现象大量发生,各级政府强拆、强建酿成的恶性事件不断出现,产权仍然是一个政策变量,是以政府和官员的认定和讲话为准,而不是一个制度变量。因此,还权于民,制止公权侵犯私权,仍然是中国改革的重要任务,是当政者必须面对的现实。

如果说与民争权,还是还权于民,是判断政府行为的一个基本标准,那么,与此密切相关的另一个基本标准就是,与民争利,还是让利于民。这不仅是由于政府收入来自老百姓的交纳,而且因为与民争利是无限的,而让利于民是有限的。政府要与民争利,就会无限扩张,无法约束和制止,官员也会贪得无厌,腐败成性,以至搞得民不聊生,政府垮台。这在历史上不乏其例。而让利于民则是有限的,不可能让到政府一无所有,官员

守卫我党的政治伦理底线

○ 周瑞金

近来,我深怀忧虑之情,关注着一些地方官民矛盾的此起彼伏,日趋激化。基层政府一些官员滥用公权力,屡屡侵犯老百姓的人权、生命权、财产权等基本权益。当事人试图通过上访、接触媒体、上网爆料、司法诉讼等手段,来维护宪法赋予自己的正当权益时,却发现这些利益表达通道发生了阻滞。更有甚者,基层政府以“诽谤”、“敲诈政府”等理由,对他们“跨省抓捕”,或者干脆以“精神病”为由关进精神病院。前不久,武汉访民徐武就是在“被精神病”四年后侥幸逃脱,又在南方电视台大院内被武汉警察公然掳去,再次投入精神病院。全国舆论大哗,而湖北方面却理直气壮地打压媒体报道。

这种蛮横不讲理的做法,击穿了为政者的伦理底线,严重背离了我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宗旨。近来,访民“被精神病”问题,与暴力拆迁血案一样,成为民众的新痛点。某些领导人的优先考量,是在任期内社会表面稳定,不出事,出政绩。为了维护地方政府的脸面和威严,甚至是与利益集团的瓜葛,不惜损害民众利益,还要

设法拉“维稳”大旗作虎皮,以“敌对势力捣乱”和群众“不明真相”为由,裹挟上级政府,为自己公共治理的无能、“伤天害理”的无耻而“背书”。即使以政府公信力的流失和民心的离散为代价,也在所不惜。

从表面看,这些地方依靠公权力的强制,可以成功压下群众的不满和抗议,并暂时屏蔽了媒体和网上的“杂音”,却并没能消除民众内心对政府的怨怼。遇到新的热点事件,民怨还会喷涌而出,连本带息地要求偿还。问题是,到时候谁来偿还这笔累积的民怨?基层官吏不会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但他们会让我们的党,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来为这些社会矛盾的易燃易爆而“埋单”。在一些地方,民怨的“海平面”已经高于“地平面”,只是凭恃一道高压维稳的堤坝,才勉强保一时平安,但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溃坝。这样的做法,不仅殃民,而且祸党、祸国。早在2009年群情激愤的邓玉娇案中,有网友就曾警告说:“任何一次不公正的得逞必将造成民心的进一步丧失,而一次次民愤的积累最后必将酿成大祸。”

无以生存。相反,在现代社会,政府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机构,政府要生存,要提供公共服务,就要掌握一定的财力,它的规模以满足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需要为限,且有一个合理标准,即政府的税收和收入要与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相适应或者相对等。从目前我国的情况来看,政府收入远大于政府提供的服务,政府支出的很大一部分没有用在提供公共服务上,而是用在了其他方面,通过各种途径变成少数既得利益者的财富。至于挥霍浪费,诸如“三公”消费之类,据说去年就高达9000多亿元。

政府占有的资源和收入已经不少,但仍感不足。目前,税收占GDP的20.9%,并不算高,但全口径的政府收入占GDP的32.2%,已经过高。然

而,前不久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著文说,政府收入满足不了提供公共产品的需要,要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增加政府收入。去年政府税收8万多亿元,全国13亿人口人均纳税6200元,明显高于同期5919元的农民人均收入。然而,政府仍在通过各种办法与民争利。能否为政府收入(包括预算收入和预算外收入)规定一个最高界限,严格监督,不许超过。须知,斩断争利之手,增强让利之心,不仅有利于端正政府行为,缓解目前已经相当尖锐的社会矛盾,而且有利于民间社会的教育和自治。这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本文作者为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资深研究员)■

遥想 90 年前,我们共产党人崛起于工人农民之间,在没有印把子也没有枪杆子的情况下,凭借对草根民生的深切同情,对政治民主、社会公平的公开承诺,赢得了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戴。海丰县大地主之子彭湃从日本留学归来,脱下长衣,穿上短褂,放弃锦衣玉食,烧掉自己名下的地契,把土地分给穷人,创办了海陆丰革命根据地。陈独秀的两个儿子,延年 17 岁、乔年 14 岁就独自到上海求学,常常吃大饼、喝自来水,冬无棉衣,夏衣褴褛,与工人和底层市民打成一片,经常帮年老病弱的车夫拉人力车,成为工人运动的早期领袖。

老一辈革命家对待访民的态度,更值得我们警思。据媒体报道,在“大跃进”后的三年饥荒中,1960 年 3 月,红军烈属、四川达县农民何明渊到首都鸣冤,以在天安门广场英雄纪念碑前白日点灯的激进方式,提请中央政府重视老百姓挨饿死人的问题。在那个“阶级斗争”风声鹤唳的年代,北京市委书记彭真非但没有将他投入监狱,而且为了防止他回乡受到迫害,让他到湖北武汉异地安居。国家主席刘少奇听取汇报后,难过得久久说不出话来。老一辈共产党人在治国理政时尽管也曾由于历史局限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他们面对人民疾苦时流露出来的赤子情怀,仍然让人感动不已。

爱民、亲民、敬民的政治伦理,是我们党获得民众拥戴从而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宝贵财富。在老一辈领导人的光辉榜样面前,今天那些视拆迁

户为蝼蚁、视访民为寇仇的基层官员,政治道德境界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一些基层百姓因走投无路、诉求无门,而不惜自残躯体的时候,像职业病患者“开胸验肺”,被“钓鱼执法”的断指明志,拆迁户自焚,我们共产党人的良知是否受到震撼?公民的权利必须得到保护,公权力必须受到法律和制度的约束。公民的利益表达渠道必须畅通,各种社会力量的博弈规则必须公正。倾听民意,化解民怨,关心民瘼,解决民众的实际权益问题,做好以上这些,才能够消除种种不和谐的因素,才能真正维护社会和政治的稳定。

近日,国土资源部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不得强行实施征地拆迁”,防止简单粗暴压制群众,引发恶性和群体性事件。与湖北一省之隔,湖南传出邵阳市基层计生干部涉嫌倒卖超生儿童案后,湖南省委书记周强批示,下令“全面彻查”;纪委干部在镇政府院内搭台,公开接受老百姓对计生工作的举报,告诉受害者家庭:“放心,就看我们的了。”

我诚恳地希望,在当前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能摆正自己和人民的关系,摆正公权力和舆论监督关系,昼乾夕惕,真正做到胡锦涛同志所说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真正做到习近平同志所说的“权为民所赋”,都能给老百姓送上这句温暖心窝的话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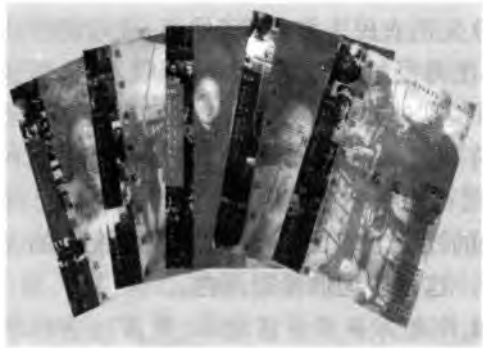
“放心,就看我们的了!”■

(作者为《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

《炎黄春秋》精品书系介绍

1998 年推出的《炎黄春秋》精品书系,是从《炎黄春秋》1991 年创刊至 1995 年计 45 期 650 万字中精心筛选出的重点文章 150 万字,编辑为五卷珍藏本,分别为:《政坛高层动态》、《重大决策幕后》、《历史迷案揭秘》、《名流写真》、《血荐轩辕》。该珍藏本出版后一度脱销。应广大读者强烈要求,精品书系五卷珍藏本再版发行,以弥补本刊早期合订本售罄之不足。

由于数量有限,恕不分卷出售,欲购从速。定价 125 元,另加邮资 12 元。汇款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69 号,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邮编:100045,联系电话:010-68532048,传真:010-68532569。



1959 年对张闻天外交路线的批判

○ 萧 扬

1959 年 9 月 12 日,外交部长陈毅在外事会议上的会议总结发言中说,外交政策上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和做法,另一条是以张闻天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外交政策路线和做法。这里所说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就是毛泽东的以世界革命为宗旨的革命外交路线,所说张闻天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就是张闻天提倡的同一切国家和平共处的外交路线。

1959 年的庐山会议结束后,军队和外事系统立即分别开会,更加猛烈地批斗彭德怀、张闻天。全国外事会议同军委扩大会议同时举行,从 8 月下旬开到 9 月 12 日。接着又在外交部展开揭批运动,从 10 月 24 日大会动员,一直搞到 1960 年 1 月中旬。外交部揭批运动(以及以后长期的专案审查)的重点,是“里通外国”问题,因为毛泽东认为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庐山提意见是苏联支持的颠覆活动。运动中大量时间用于要所谓张闻天反党集团成员揭发交代,也有几天开全部党员大会,集中进行所谓分析批判。大批特批张闻天在外交部的“反党宗派集团”(那时中苏尚未公开破裂,“里通外国”问题不好拿到大会上)。批判的重点之一就是所谓张闻天的右倾机会主义外交路线。

按照惯例,一个人一旦被打倒,也就被全盘否定。对张闻天的否定要涉及外交,本来已属必然,这次不同的是还有具体的最高指示。张闻天挨批期间,我在他身边工作,曾听他说,毛泽东在某次会上问了一句:在国内问题上右倾,在对外问题上怎么样呀?人们感到,这是一个信号,表明他决心要在对外政策上反右。果然这一意向立即落实到了外事会议和外交部的批判上。

在外交部的批判大会上,一些司长分别就外交上的不同问题做专题发言,还有人做综合性的批判。今天想来,批判者除个别人争当积极分子

外,多数也是为运动所裹挟,也许并不相信自己所说。不管怎样,两条路线斗争的阵势已经摆开。我当时正在接受严厉批判,正在强令自己“端正立场”,改变认识,因此对所有批判发言都认真记录。这些记录经过“文革”劫难居然有两本(不是全部)夹在极少数被发还的材料当中,倒成为今天写这一段历史可资援引的资料了。

—

对“张闻天右倾机会主义外交路线”的批判,关键是说张闻天只讲和平共处,不讲世界革命。

张闻天确实主张实行和平共处政策。他认为:“保证持久和平,争取同各国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是我国外交的主要任务。”(《论和平共处》。张闻天文集,第 4 卷,226 页。)自他 1955 年担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以后,推行和平共处政策可以说是贯穿了他全部工作的红线。他不仅在日常外交实践中推行这一政策,而且从理论上多方阐释,力图发展和深化和平共处的进程。1956 年他主持外交部第二次驻外使节会议,着重分析了执行和平外交政策过程中的各种认识问题,尤其是带有“左”的倾向的认识问题。对于我们曾经支持当地武装斗争反对其政权的亚非国家,特别分析了必须同它们实行和平共处的根据。1956 年 8 月,张闻天组织人写了《论和平共处》一文,全面论述和平共处政策的根据、内容和执行中的问题。1957 年他视察驻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缅甸四国使馆,现场了解情况,解决妨碍执行和平共处政策的思想认识问题。

本来,和平共处也曾是中央宣布的政策。周恩来 1953 年 12 月在同印度政府代表团谈判中提出了五项原则,毛泽东在 1954 年 7 月也认同说:“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这是苏联提出来的口号,也是我们的口

号。”(《同一切愿意和平的国家团结合作》。毛泽东文集,第六卷,334页。)但是,自1957年毛泽东访苏归来,情况有了变化。在访苏归来第二天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批评苏共的和平共处对外政策总路线,认为共产党的对外政策还有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支持世界革命等问题。(见吴冷西:《十年论战》。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152页。)大约从此时起,世界革命的旗帜日益鲜明,和平共处开始受到或明或暗的非议。中央领导同志论述中国外交的任务时,开始强调新的世界要推翻旧的世界,代替它,是我们“今天现实的斗争”(周恩来1958年4月15日在全国外事会议上的报告)。“我们不仅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而且要促使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新中国的外交也正是为这个目标服务的。”(陈毅1958年5月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坚决贯彻党的外交路线》。)到了1959年,外交上的“左”倾思想终于挟庐山会议批判彭黄张周之威,以张闻天为靶子,大举批判和平共处了。

张闻天的和平共处思想,确实是同支持世界革命的路线相对立的。第一,从治国理念和方略说,张闻天认为,新中国建立后,应该全力进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办好我们自己的事。“外交战线上的任务,就是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保证最有利的国际条件,例如争取和平的环境,发展同其他国家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张闻天文集,4卷,270页。)而不是支援世界革命。第二,从革命原则说,张闻天认为,“革命决不能输出。革命与否,如何革命,都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情。”(关于执行我国和平外交政策中的一些问题。张闻天选集,1985年,476页。)*“别的国家是否革命那是人家的事,我们用不着管”(在驻印尼使馆党委会议上的发言。1957年6月。张闻天年谱,下卷,1061页。)。第三,落实到外交实践,就要摒弃输出革命或曰支援世界革命的思维和行动,就要反对干涉他国内政,反对四处推销中国革命经验,反对强加于人的革命宣传,对外援助要有节制,就要确认和平共处“不是一时的策略措施”



张闻天(1900-1976)

(关于执行我国和平外交政策中的一些问题。张闻天选集,1985年,474页。),而要确立“长期和平共处的思想”(在驻巴基斯坦使馆全体干部会议上的报告。1957年5月22日。张闻天年谱,下卷,1060页。)*“一切工作都应围绕着争取长期友好相处这一总的目的”(视察驻印度等四国使馆的报告。张闻天文集,第4卷,254页。)*。

批判张闻天的和平共处思想,有其投鼠忌器的为难之处。因为和平共处政策是列宁提出的,形势也还没有发展到后来公开喊

出打倒帝修反口号的那一步,所以批判者不好从理论上公开反对和平共处。他们只能拐弯抹角(其实也已经相当赤裸裸)地做文章。第一,他们说,世界革命是我们外交工作的终极目标,张闻天所说的长期的和平共处,是维持现状,是同这一总的战略目标相反的。一位司长说,“在世界上也要讲不断革命论”,“张闻天外交路线的根本错误是没有世界革命的思想,或将世界革命推到遥远的将来。”第二,还是这位司长说,“和平共处是用以达到世界革命目的的手段、策略”,“革命不能输出是策略,在一定的时期如果拘泥于这个理论必须遵行而不支持外国革命,就不对。”第三,他们说,和平共处只适用于民族主义国家,不能笼统地适用于帝国主义国家。

张闻天确实没有中国外交要在当下推进世界革命的思想,甚至对于是否要在遥远的将来促进世界革命也从未涉及。他说革命不能输出,确实从来没有附加任何时间地点的限制。他主张实行和平共处,也没有将帝国主义国家排除在外。但是,张闻天的这些主张,对于今天正在融入全球化进程的中国人来说,难道不都是无须论证的公理吗?

二

对张闻天的批判,还集中在形势估计问题上,即对世界战争和世界革命形势的估计。本来,要批判和平共处,就不能不涉及形势估计,必须

证明战争已经迫在眉睫,才能得出和平共处不可行;必须描绘一幅干柴遍野的景象,才能说世界革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当时批判的重点是说张闻天只讲缓和,不讲要警惕战争的可能性。实际上,张闻天也说战争有打起来和打不起来的两种可能性。不同的是,他认为两者的比例不是一半一半(在布拉格使节会议上的最后发言。张闻天文集,第4卷,299页。)而是和平的可能性大于战争的可能性,而且“避免战争的可能性愈来愈大”(在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全体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5月22日。张闻天年谱,1060页。)战争愈来愈打不起来。我们对内对外工作的布置,应该从这个基点出发。“争取世界和平,防止突然事变”的方针中,“主要的还是争取世界和平”(战争是可能避免的。张闻天文集,第4卷,258页。)。这显然与主流看法不协调。当时的重点始终放在战争可能打起来上,反复强调要准备帝国主义发动突然袭击,强调在精神和物质上都要有所准备。(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7卷,326页。)
“第三次世界大战准备打上十年吧”(美国可怕,又不可怕。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206页。),即使“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6卷,392页。)这种看法主导党内外舆论,因此1959年6月27日张闻天在外交部务虚会议上提到“大战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但是一天天在减少”,陈毅就对此表示异议。陈毅因病没有参加这次务虚会,后来看了张闻天的发言纪要说,这个发言他看了三遍,他觉得讲得很好,他都同意。唯独对大战可能性在减少这一点,他有不同看法。到了两个月后的批判会上,这便成了张闻天的一条罪状了。

张闻天还有一个看法,就是认为战争有可能完全避免。这就同苏共的看法纠缠在一起了。他先是在1955年8月批评“战争不可避免的看法”是“主观主义的偏向”(在《关于美国外交策略的新变化》一文中加写的一段话。张闻天年谱,993页。)(用语同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所提“战争不是不可避免”几乎完全一样,时间还早半年),继而说,“战争必不可免的论点是需要修改的”(在外交部部务会议上的讲话。张闻天年谱,1013页。),最后说,

“新的世界战争有可能避免”(论和平共处,张闻天文集,第4卷,225页。)。毛泽东说,苏共的观点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只要有资产阶级存在,战争是不可能避免的。(见朱良,无私无畏追求真理的王稼祥。炎黄春秋,2006年第8期,4页。)

至于世界革命,张闻天不认为存在世界革命的形势,认为现在已经不是世界革命的时代。即使人们最为瞩目的东南亚,他也认为那里的民族民主革命并不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不存在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形势。那时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实在谈不上革命形势,1959年的批判者便将批判集中于亚非拉地区。一位主管亚洲地区的司长说,印度土地问题未解决,工业发展速度减缓,工资逐年下降,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越走越窄,对帝国主义依赖日益加深。民族主义国家阶级矛盾尖锐化,统治阶级走向反动,不可避免地对内要反共独裁、对外要反苏反华,放弃和平中立路线,“这使右派、中间派丧失威信,便利共产党上台。”他们批评张闻天看不见那里的革命形势。

事实表明,在上世纪50年代,张闻天已经看出,战争和革命不再是时代的主题(尽管他还没有使用明确的语言点破这一点),国际战略和外交界的主流也已经感觉到了张闻天持有这种看法,而且不能容忍这种看法。他们急切地批判张闻天,战争和革命的理论果然就愈益大行其道:公开提出了要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而且“战争引起革命”,世界革命形势已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我们现在正处于世界革命的一个新的伟大的时代。”(毛泽东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1966年10月25日。)

三

同世界革命形势估计紧密相连的,是对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主义国家应该如何认识、应取何种政策的问题。

张闻天认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情况看,不能再说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大部分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独立后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资产阶级领导的政权实行民族改良主

义与和平中立政策,具有进步性,还有相当的生命力。在短时期内,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还不大可能树立起政治上的领导,还看不到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经过人民革命胜利的道路而进入社会主义。因此,不能搬用中国革命的经验。对这些已经由资产阶级领导取得政治独立的国家,不能搞共产党领导的通过武装斗争推翻现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应该采取有团结有批评、主要是争取和支持的政策,支持它们走中间道路,争取同它们长期和平共处。他告诫一定要严格遵守五项原则,对这些国家的工作不宜要求过高过急,不要勉为其难和强加于人。他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论》中的相应结论需要修改。

1957年张闻天到驻印度尼西亚使馆视察,发现不少人觉得印度尼西亚形势大好,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联合苏加诺,力量强大,乐观情绪弥漫。因此他强调,人民民主革命不是印度尼西亚今天的任务,印度尼西亚民族民主力量还不占压倒优势。政局如何发展,现在就下结论未免太早。苏加诺如果走得太快,会被人推翻。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离参政还早,离领导政府更远,要安心长期做反对派。他特别强调:不要把中国革命方式搬到印度尼西亚使用。印度尼西亚国内革命力量的发展问题,是他们自己的事,我们不要介入,不要受激进华侨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支配。不要在那里搞群众运动,不向驻在国做政治宣传,文化宣传不要过分。我们的计划如偏高了,将来不好收拾。争取让华侨能够长期生存下去,正当的权益得到保护。

1958年和1959年,一些民族主义国家的政策出现了明显的摇摆。印度、印度尼西亚、埃及、伊拉克相继采取了某些反华反共的措施。按照毛泽东“不怕鬼”的方针,中国同尼赫鲁这个“半人半鬼”进行了一场严重斗争。毛泽东说:“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也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动派。”(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毛泽东文集,第八卷,51页。)在此形势下,张闻天多次发言并在外交部务虚会议上集中阐明观点,认为民族主义国家的这种摇摆,正是他们执行的中间路线的特点。尽管摇摆,只要坚持中间路线,就不能影响民族独立运动继续向前发展的总趋势。中间路线还有一个时期的生命力。各国共产党不能

太急,既要反右(不划清界限),又要反“左”(急于搞人民革命)。我们对执行中间路线的国家,仍应承认其两面性,不因其摇摆而动摇。

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对此是怎样批判的呢?一位司长说,应该剥夺民族主义国家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资本,应该强调他们的民族改良主义没有前途,应该加强夺取领导权的斗争。另一位司长说,“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已经日益尖锐”。还有人说,“民族主义国家不仅是摇摆,而是发展了反动性”(不久这些国家就被列为“反动派”)。张闻天关于印度尼西亚形势的讲话被说成不许人民革命,关于华侨工作的讲话则是提倡卖国主义。随后一大批民族主义国家就被公开戴上“反动派”的帽子而同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一同划入应予打倒之列。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任何被称为“反动派”的国家发生过人民革命而被打倒。相反,张闻天被批判之后仅仅过了六年,就出现了血腥的“九三〇”事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几乎被斩尽杀绝,千万左翼人士人头落地,苏加诺被逼下台,华人华侨横遭池鱼之灾,印度尼西亚同中国的关系急剧恶化,外交关系中断长达23年。张闻天不幸而言中。

四

张闻天主张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主张对外保持缓和的理性的姿态,反对一味高调斗争。对于西方世界,他主张接触,争取国际合作,不赞成自我封闭。这些也被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外交路线的表现。外事会议的总结发言就把张闻天“偏重于缓和、和平共处、联合、让步”当做批判对象。

从1958年起,中国曾经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例如批判南共纲领,中断同日本的一切来往,同赫鲁晓夫争论共同舰队和长波电台问题,金门打炮,同印度“大闹一场”,等等。这些行动都有各自起因,但是结果都使局势更加紧张和动荡。毛泽东认为,“紧张局势比较对于西方国家不利,对于美国不利”,反而对于反对帝国主义的人民有利。(关于国际形势问题。毛泽东文集,第七卷,416、409页。)张闻天则主张缓和局势,而且认为我们争取缓和的态度事关重大。“世界局势并不决定于美国一国。它紧张,我们不紧张,也就紧张不起来。”(在

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全体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5月22日。张闻天年谱,1059~1060页。)对美国,他也认为“并不是一点妥协可能也没有”(在布拉格使节会议上的最后发言。张闻天文集,第4卷,301页。)。因此,对于所有导致紧张局势加剧的行动,张闻天都是消极的。他的一些未被接受的建议,都是倾向于对外表现缓和一些的。例如,对于涉台事件不必事事抗议,对于中印边界采取较为易为印方接受的解决方案,在批判南共纲领以后也尽量同南斯拉夫维持国家关系,等等。

有一个释放美犯问题。1956年底周恩来访问印度,印度总理尼赫鲁提出建议并转告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的意见,希望中国政府提前释放正在服刑的10名美国罪犯。周恩来觉得可以同意,让驻印度使馆电告国内,要外交部提出意见报中央审批。张闻天和外交部其他副部长也都同意。不料毛泽东大为震怒。他说,美国人一个也不能放,关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愈是印度讲情就愈不放。他还严词质问,你们外交部究竟是北京的外交部还是华盛顿的外交部。在1959年的运动中,张闻天释放美犯的这一主张被提到了崇美、恐美、亲美、讨好美国、对美国有幻想的高度,当做右倾机会主义的例证而大加批判(其实也就批判了周恩来和外交部其他副部长)。

张闻天认为,在当今世界上,“每个国家要发展和进步(甚至要生存)都必须同其他国家和人民进行合作”,“完全的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张闻天文集,第4卷,280页。)他1950年就向中央建议早日同英国一类国家建交,1954年又建议同英国不搞半建交而直接互派大使。对进入联合国问题,他主张采取积极态度,在驱蒋问题上采取灵活做法。对待西方经济、科学、文化成果,他持积极开放态度,1948年就曾将外资经济规划为新中国六种经济成分之一,1958年又建议举办国际博览会以引进国外设备技术。他还建议加强翻译出版西方国际问题著作。他认为,外交不单纯是国际斗争,而且还是国际合作。

张闻天的这一整套主张,显然同“关起门来,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以及此前的“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等方针背道而驰,在1959年的运动中都成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罪证。

五

1959年运动另一个批判重点,是张闻天对所谓现代修正主义的态度。

1958年5月中共发动对南共纲领的批判,中南关系骤冷。张闻天努力设法避免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在中央外事小组的会上,他反对在国际会议场合采取同南斯拉夫对抗的方针,主张兄弟党和兄弟国家之间的会议和活动可以让南斯拉夫参加。1959年运动中批判说,这是混淆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原则区别。

1958年随着“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口号的提出和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兴起,自以为中国在革命建设理论和实践上均已领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绪滋长弥漫,毛泽东甚至说,我们即使准备好了也不进入共产主义,以免苏联脸上无光。张闻天认为这是骄傲情绪和大国主义思想,再三给以抵制和批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一书出版后,国际书店积极向国外发行,在不少地方受到抵制。张闻天批评说,发多了。他要求收缩,严格控制。对于所谓“吹风”,即向外推销总路线,张闻天强调不要“王婆卖瓜”,强调“吹风”不能了解为单方面的,我们也应该虚心听取人家的意见,承认自己的错误和缺点。针对世界革命中心已转移到中国之说,张闻天在布拉格使节会议上郑重地说,全世界还没有哪个国家认为政治思想中心已移到北京,“为首不是自封的”,“我们也不应当、不需要去争取”。(在布拉格使节会议上的最后发言。张闻天文集,第4卷,304页。)

1959年对“张闻天右倾机会主义外交路线”的批判,在正式的党史、国史、外交史著作中都没有记载。其实,这次批判是件大事。其意义主要不在于给张闻天个人添加了又一项莫须有的罪名,把他的外交路线说成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在于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对和平外交路线的首次大规模系统挞伐。它高调树立世界革命战略的旗帜,在理论政策上为“左”倾外交扫清道路,使支援世界革命的外交路线在实践中进一步压倒和平共处路线。在这次批判以后,外交部内外气氛紧张。起草外宾(例如古巴格瓦拉)访华公报

高学兰养鸡对不对？

——省委书记宋平倡导的一次改革讨论

○ 秦卫东

1980年6月5日,《甘肃日报》头版发表了《高学兰养鸡对不对?》的文章,报道了兰州市西固区陈坪公社东湾大队妇女高学兰养鸡的事。这篇文章一经刊发,在社会上立即引起了广泛关注,成了当时舆论的焦点,围绕着农民养鸡对不对的问题,报纸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时任甘肃省委书记的宋平也亲自撰写文章参加讨论。一个农村妇女养鸡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为何在那个年代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这场讨论的意义是什么?它给甘肃省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民生带来了哪些深刻的变化?

事情的缘起

据当时任西固区委新闻专干刘英麟回忆,1979年夏天,西固区委的干部到孟家山村拔麦子,下乡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歇晌时分,陪同劳动的陈坪公社书记给区领导汇报工作说:“我们的东湾村出现了一个‘资本主义土围子’,女社员高学兰给队里说有病,不能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却在家里养了百十来只鸡!”“饲料呢?”区领导问。“她男人是市运输公司的司机,开货车跑外地,常弄些包谷糜豆回来!”“这怎么行?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蹲在家里搞私有化,已经走到资本主义的路上去了,居然又让公家的车帮她搞单干,不是‘土围子’是什么?”区领导说着,对区新闻专干

刘英麟安排道:这是个典型!你先调查,写出批判稿,要把滑到邪路上的阶级兄弟拉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

陈坪公社书记和西固区领导之所以把高学兰养鸡叫做“资本主义土围子”,而不叫“资本主义尾巴”,是因为她不仅偷偷养鸡,而且养了上百只鸡,鸡蛋不仅自己吃还居然到市场上去卖,这在当时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性质比“资本主义尾巴”严重得多!

接受任务的刘英麟开始了采访调查。在调查中,他遇到了问题。首先,高学兰所在的东湾大队人均可耕地只有2分4厘,人多地少,平时男人们都闲着,妇女根本无事可做。不养鸡干什么?二是当时生活必需品实行国家统购统销,私人不准经营。兰州市场上根本没有鸡蛋可卖。比如西固区18万城镇居民每年需要鸡蛋150万斤,但能派购到7万农民身上的鸡蛋仅有2万斤,远远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就是这2万斤征购任务,10多年来只完成了一次:1977年收购部门想了个办法,每户农民完不成鸡蛋交售任务不但要扣口粮(少交一斤鸡蛋扣三斤口粮),还不供应碱面、兰州烟等商品作为惩罚,农民对此早已怨声载道。高学兰把1979年生产的1100斤鲜蛋,按收购价卖给国家指定的收购部门,完成生产队的上交任务,又给家里挣来零花钱,是两全其美的事,到底有什么错?怎么就成了“资本主义土围

稿时连“和平共处”这样的字眼都不敢写。(见《外交纪实(一)》,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121页。)当时内部发行的《辞海》未定稿,也是连“缓和”这样的词条也没敢收。在这次批判三年以后的1962年,又开展了对“三和一少”的批判。从此中国外交加速

度地“左”倾,打倒帝修反的口号公开提出,推动世界革命终于堂而皇之地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现实目标。■

(作者曾任张闻天秘书)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子”了呢？

刘英麟感到很困惑，批评的稿子不好写，可领导交给的任务不写又不行。他把调查情况向区领导汇报时，领导让他听听报社的意见。稿子拿到甘肃日报社，报社的同志也吃不准，在商量过程中他们认为，农民完不成任务是有原因的，除了缺乏养鸡饲料等客观原因外，把养鸡作为“资本主义土围子”批判是导致农民不敢养鸡的根本原因。养鸡和“资本主义土围子”是一回事吗？这个问题的是非对错不搞清楚，批评高学兰养鸡，就缺乏批判的武器，还失去了调查这个反面典型的政治意义。

当时，“文革”结束不久，由于长期以来极“左”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占主导地位，在农村搞“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割私有制的尾巴，甚至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荒唐口号，导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广大农民吃尽了苦头。1980年3月，新华社傅上伦、胡国华和冯东书三位资深记者奉命到山西、陕西和甘肃农村调查民生问题，调查结果是，1979年全年的农民人均收入，甘肃庆阳地区为64.86元，平凉地区为47.60元，定西为36.80元。人均年口粮不足300斤的生产大队占总数的比例，庆阳地区为16%，平凉地区为45.6%，定西地区为87%以上。他们在调查报告中说：“这表明，无论是丰年、平年、灾年，这里的农民绝大多数不能养活自己。每天能吃到的粮食多时八两，少至四两，不靠救济，怎么能活下去？就是加上救济，也只是能勉强维持生命而已。”

这就是1979年甘肃农民的生存状况。

粉碎“四人帮”以后，百废待兴。在意识形态领域“姓社姓资”的思想禁锢还没有得到认真清理。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上层对解放思想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没有联系工作和生活实际，基层干部还是心有余悸。能不能从常识出发报道高学兰养鸡的是非对错呢？作者和甘肃日报社农村部的同志决定大胆地试一试。

1980年4月上旬的一天，刘英麟把写好的稿件送到了报社，但不见动静。后来他得知稿件需要送审，因为事关重大，送审稿最后一直到了省委书记宋平同志手里。

宋平支持和倡导下的大讨论

6月5日，《甘肃日报》头版头条登出了“高学兰养鸡对不对”的稿件。同时加了社论、开辟了大讨论栏目，文章一经刊出，立即引起极大反响。一时来稿如云，人们纷纷踊跃参加大讨论，批判者有之，赞成者有之，围绕“高学兰养鸡对不对”形成了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原本是一篇新闻事实的报道，变成了引导思想解放的大规模讨论。省委书记宋平亲自到实地调查，亲自撰写文章参加讨论，更像一石激起千层浪，推动讨论深入展开。

宋平在写文章前，为了取得第一手资料，先到西固做了一次实地调查。

6月中旬的一天，他走进高学兰家，仔细看了她的家和鸡舍，翻看高学兰买的各类养鸡的书，询问她养鸡的过程和遇到的问题。高学兰过去是偷偷摸摸养鸡，害怕上面知道。省委书记来了，第一次见这么大的官，心里更加忐忑不安。宋平对高学兰养鸡给予充分肯定，他对高学兰说：“你不要害怕，养鸡没有错。胆子再大一点，步子迈得要再快一点。”接着，他又问雏鸡怎么喂，蛋鸡怎么养，还问鸡容易得什么病。高学兰一面回答，一面把治各种病的药瓶拿给书记看。在剥青饲料的地方，宋书记问她鸡养到300多只一个人忙不过来怎么办？高学兰不假思索地回答：“买一台切菜机！添几个帮手！”话一出口，她立刻觉得不妥。雇人帮忙养鸡，这在当时是个想都不敢想的禁区呀。谁知宋平当场就称赞她这个想法没错。对她说：“希望你今后继续发展养鸡事业，把全队、全公社带动起来，让社员们都尽快富起来”。回去之后，宋平书记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甘肃日报》上发表的文章里，对高学兰的回答是这样分析的：“这说明，她的鸡场已经提出了机械化的要求，而这种要求是从实际出发提出来的，是从真正的需要提出来的，这种‘化’法，既能做到经济有效，也符合当前农民的实际条件所能承担的……随着养鸡水平的提高，就可能突破单家独户的界限而自愿联合。”

宋平在西固还深入到社队和部门调查，从饲料、防疫、机械、贷款、孵雏、养鸡经验六方面了解农民养鸡遇到的具体问题和困难，掌握了第一手

的资料。他认为,西固农村有三大困境:一、当时实行以粮为纲政策,一切为粮食生产让路,严格限制农民养鸡种菜等家庭副业,于是就出现了一边是市场供应短缺,市民没有鸡蛋吃,一边又不准农民养鸡,农民没有收入的矛盾困境。二、根据统购统派制度,规定农户每月交鲜蛋三斤,却无养鸡饲料。一些无条件养鸡户只能到市场高价买来鸡蛋再交给队里完成任务,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农民平时手里没钱,柴米油盐等生活必需品只能用鸡蛋换。这就造成了“一见队长来得急,家家户户藏母鸡”的尴尬和无奈。三、当时还实行“必须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规定,但地少人多,“副业不准搞,种地又无田”。大量剩余劳动力没有出路。

宋平分析说,三大困境的要害是城市居民缺蛋、农民没钱、农村剩余劳力无事做。过去由于不敢触及既定政策的“雷区”,束缚了农民手脚,城乡人民的吃饭问题长期解决不了,成了一条走不出去的死胡同。只有大胆解放思想,敢于突破禁区,主动调整政策,给农民松绑,才能解放生产力,走出自我禁锢的困境。为了说服大家,他给陪同的西固区、社和生产队的干部算了一笔账。他说,西固18万城市居民,年需供应鸡蛋150万斤。派购到本区农民户2万斤,多年完不成。国家每年拿出30万元从外省买蛋供应西固居民,缺口大、断货多;西固有生产队220个,如果每一个队产生5个高学兰鸡场,都像高家一样年产鲜蛋1500斤,还带动一批劳力养鸡,一年生产的鲜蛋就会大大超过150万斤。如果兰州都这样搞起来,保证各大饭店和全市饮食业的鲜蛋供应是不可能的。推而广之,蔬菜、瓜果、奶品等等,也都采取这个办法解决,将是一个怎样的前景?宋平的一番话和一笔账,把西固干部的思想点亮了,把偷偷养鸡的农家算笑了,把剩余劳力转移的路子指明了!解决三大困境有办法有信心了。

宋平还专门约见了写报道的作者,对他说:“你给我们党做了一件好事!”还指出,几亿农民,一人一张嘴,一天三顿饭,不实事求是地正视不行,不能再打肿脸充胖子了!

1980年7月5日,宋平根据自己调查和思考的问题,撰写了《农业现代化的一个新的探索——从高学兰养鸡谈起》一文,并于7月9

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甘肃日报》发表。这篇文章从理论到实践的结合上回答了如何看待农村专业户这一新生事物,阐明了农村专业户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对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意义。

宋平在这篇文章中介绍了高学兰养鸡的情况和成绩后写道:“这样一个专业户,对国家、对集体都做出了贡献,本人收入也有较大的增长。这件事,对于探索我省农业现代化的道路,给人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我们是把大家捆绑在土地上去平均分配那点有限的收入好呢,还是把剩余的劳动力包括辅助劳动力都组织起来,放开手脚,大胆地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使更多的社员尽快地富裕起来好呢?这并不是难以回答的问题。看来,这种专业户、专业组的形式,不仅适用于养鸡,养羊、果树、采集、编织以及一切技术性比较强的生产门路,都可以推广这种形式。实行这样的专业化生产,能够更好地采用科学技术方法,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商品经济,使社员更快地富裕起来,使农村的贫困落后面貌更快地得到改变,这就是我们的努力方向。”

大讨论的效果

特约评论员文章的发表,为大讨论指明了方向,原本众说纷纭的争论统一了认识。大讨论带动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推动了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开展,各种形式的个体户、专业户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甘肃农村呈现出多年未见的生机勃勃景象。

兰州市西固区有一些国营大厂,历来副食供应困难。这个区领导联系实际,召开了驻区大厂联席会,制定了“服务驻区大厂,依托驻区大厂,联合驻区大厂”的发展战略,实施大范围的城乡结合、工农联合,推动西固区农村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化。既增加了农民的收入,驻区大厂10多万职工的副食品供应也有了很大改善。1988年,西固区被列入全国星火技术密集区行列,在科技带动下,这个区的各类专业户及乡镇企业发展进入了全省前列。1990年,甘肃省委在西固召开了“双文明建设”现场会,介绍和推广他们围绕破除二元结构、推进城乡一体化方面取得的经验。

接下页

1966 年四见陈丕显

○ 张文豹 口述 黄谦 整理

1966 年的中国 ,云诡波谲 ,我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曾四次前往陈丕显书记养病处 ,接受他的直接指示 ,做了一些工作。多年往事 ,历历在目。

2 月份 ,江青在林彪支持下在沪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与此同时 ,《二月提纲》传达到上海市党政机关 ,山雨欲来风满楼。5 月 10 日 ,陈丕显秘书余永年通知我去华东医院见正在养病的陈丕显书记 ,我即赶去 ,在华东医院病房 ,陈吩咐 :“我要你亲自去趟北京” ,我问“什么事?”陈说 :“去中央组织部找安部长 ,调取 30 年代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历史档案。这两天你安排一下 ,快去快回。”11 日 ,我将此事告知杨士法部长 ,杨似已知道 ,听后也不说什么。12 日上午 ,在虹桥机场乘坐伊尔 24 型的小飞机飞往北京。途中 ,女乘务员小王告诉我 ,飞机要在济南降下 ,加油 ,吃午

饭。下午 2 点 ,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 ,我打电话通知了中央组织部办公厅 ,他们派小车将我送到翠明庄招待所 ,安顿后 ,即打电话向安子文部长报到 ,安说 :“你来了就好 ,明天上午来找我吧。”13 日上午 ,到西单组织部 4 楼见安 ,把来意说了 ,安说 :“好 ,我替你准备一下 ,不要着急走 ,有事跟你谈。”接着 ,安子文部长急切地询问上海的“四清”运动的情况和干部的思想状况 ,我作了简要的汇报 ,说 :“大家询问 :姚文元的文章直接针对北京市副市长吴晗 ,把历史上的罢官、翻案和当前的现实联系起来 ,到底有什么含义?当前为何要发表这样的文章呢?很不理解 ,对姚文的背景也不敢多加揣测 ,普遍感到困惑。”安说 :“北京市委认为这是个学术问题 ,你看过《二月提纲》吗?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提纲》的意见是对的。”我接着反映 :“对《二十三条》中提出要重点整党内那些

接上页

这一积极的变化在 1980 年 10 月的《兰州市城郊如何改变农业内部结构搞畜牧业现代化》一文中得到了证实 :“在高学兰的带动下 ,西固区养鸡专业户发展到 600 多户 ,养鸡 6 万多只 ,比去年增长了 20 倍。永登县养羊 30 只以上的农户已经发展到 900 多户 ,养羊近 3 万只。再加上当时在二阴地区推广的肉牛养殖、在红古花庄推行的奶牛养殖、在干旱地区的站羊养殖以及水川地区的生猪养殖 ,这些规模算起来 ,兰州市的农业专业户规模已经达到了相当大的数量。”

1982 年的《兰州市农业情况总结》指出 :“全市养鸡专业户已发展到 4185 户 ,养鸡 54.6 万只 ,创历史最高水平 ;奶牛年底存栏 3700 头 ;永登县玫瑰专业户发展到 2230 户 ,共栽植玫瑰 40 多万丛 ,带动了玫瑰生产的大发展……”成果是辉煌

的 ,数字是喜人的 ,专业户们也从中获得了许多收益。据兰州市农林局 1982 年 12 月 22 日的《关于开创农业新局面的意见》中记载 :“全市已经形成了以养殖专业户为主 ,花卉、蔬菜种植等专业户为辅的专业户队伍 ,充分发挥了我市蔬菜瓜果、肉食生产和百合、玫瑰、烟叶等传统产品的优势 ,既供应了城市人民需要 ,又增加了社员收入。”

1981 年 ,中共中央 31 号文件首次肯定了专业户的形式 ,并将甘肃的做法向全国作了推广。中央文件中认为农村专业户“是农村发展中的新生事物” ,主张“珍惜爱护 ,积极扶持”。

省委书记的支持和鼓励 ,给高学兰吃了定心丸 ,也使她成了名人。她后来继续养鸡 ,成了脱贫致富的带头人。上世纪 80 年代初 ,高学兰成了全国闻名的“三兰”专业户中的其中之一。■

(责任编辑 杨继绳)



陈丕显(1916~1995)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家不能理解。在运动中到底解决什么问题?中央有明显不同的两种意见,毛主席和刘主席对问题的不同看法,为何还要往下传达?这是怎么回事?上海的干部们都很困惑。”安听了,神情凝重,没有回答。我又说:“党内什么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家都有一种预感,似乎又会有一场大的政治风暴到来。”安也没正面回答,只是说“按中央指示办,可能又有新的指示。”当晚,安部长邀组织部副部长李楚离、帅孟奇、李步新、陈野苹,秘书长赵汉,办公厅主任王雨亭,和我共8人在会计司胡同安宅吃晚饭,安部长说“就吃点家常菜哦”,厨师老王烹制了面食猫耳朵,有藕片,木樨炒虾仁,红烧肉,鱼香肉丝等七八个菜,喝了点西凤酒;我自1957年到上海工作后,还是第一次回北京,和老领导、同事们相聚叙旧,言谈甚欢。14日,依安的安排,到档案科长刘冀鲁处签收档案材料。15日回到上海,16日通知余永年事已办好,余告诉我不必再去华东医院见陈,将材料交给市委办公厅副主任苏超即可,我略略扫了档案目录一眼,是夏衍、于伶、陈鲤庭等人的历史材料,立刻到康平

路市委办公厅将档案材料当面交给苏超了。17日,中央发出“5·16通知”,全国范围的文革开始了。

8月12日,陈丕显在华山路一幢洋房内,找我单独谈话,陈说:“市委决定成立上海市红卫兵联络站,你担任主任。”我表示“自己一直从事组织工作,对上海的学生情况不熟悉,难以胜任,建议由团市委书记张浩波兼任。”陈不同意,说“这是市委的决定,要服从,”并说“你是从中央机关调来上海的,你的条件比较合适;再从市委宣传部、团市委调两个副手,你们一起赶快把这个摊子办起来,有事及时向市委报告。”14日,我领衔受命,在陕西北路500号市团校大院挂出“上海市红卫兵联络站”的牌子,在二楼朝南一间大屋内,召集担任副主任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蓝瑛、团市委副书记郑均培和另外三位干部,共六人开了碰头会,作了简单分工,我主要负责接待,蓝负责宣传方面的事务,郑负责联系各大专院校,其他三人负责安排住宿,提供各种物资材料等具体事务;大家都感到责任重大,表示要认真诚恳地做好工作,但如何接待,心里都没数。8月20日,第一批北京红卫兵到上海后,便来联络站,经其自我介绍,知道带队的是谭怀远(谭震林之子),叶子枫(叶飞之女),此行主要是向上海市委通报北京红卫兵运动的情况,提出要看望陈叔叔。我即向苏超汇报,经安排,21日下午,我带领谭、叶去华山路洋房见陈丕显,见到陈,他们便自报家门,说“爸爸问你好!”陈也请他们代向其父问好,接着,谭介绍了北京的情况,他们赞成“十六条”、反对“打砸抢”、不赞成宣扬“红色恐怖”、不赞成“随意批斗”;并且建议上海也应及早成立红卫兵组织。陈听了很高兴,表示赞同,当即对我说:“这事你去负责办一下。”这批红卫兵到主要的几所大学串联了一两天就去杭州了。

先前的几天,市委已着手筹备上海市红卫兵成立大会。8月19日,苏超打电话给我:“曹市长叫我告诉你,23日召开上海市红卫兵成立大会,你们迅速去联络各红卫兵组织,协助做好会议组织工作。”当时,华师大“心向党”红卫兵组织成立最早,人数最多,经华师大党委推荐,拟定该组织的领队人女大学生李本荣代表红卫兵发言。我觉得她各方面条件都不错,请示市委获得同意后,

22日上午,找李谈话,问了她一些问题,她一一作了回答,是山东省荣成县人,22岁,贫农出身,在教育系就读,共产党员,他们一致表示拥护党的领导,保护校党委,坚持学习。我看了发言稿,要求加上一条:“倡议全市红卫兵组织起来。”并表示“市委会表态支持。”23日上午,在人民广场召开了上海市红卫兵成立大会,有三万多人参加。市委副书记、市长曹荻秋,市委副书记梁国斌,上海警备区政委刘文学,副政委张宜爱、李彬山,空四军和东海舰队的代表,劳模杨富珍、杨怀远、蔡祖泉等参加了会议。曹荻秋代表市委讲话,表示支持上海市的红卫兵运动,刘文学代表警备区讲话,李本荣代表红卫兵发言,选出了廖年(廖政国之子)、李健(韩哲一之子)、陶小勇(陶勇之子)等四人为红卫兵总部负责人。会议期间,我一直在会场安排、协调各组织的排列、站队、进出,巡视会场情况,也遇见了我大儿子和他所在的61中学的红卫兵们,打了招呼。此后,随着形势的发展,这些“保皇派”的红卫兵们纷纷去各地串联,没有形成为一支队伍。

8月24日,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清华“井冈山”红卫兵是9月24日成立的,8月24日到上海的可能是中学红卫兵或清华大学红卫兵——编者)两大红卫兵组织的一批有80多人到上海,30多人来联络站,他们身穿旧军装,手持“红宝书”,要求提供宣传工具、各种物资材料,要求提供市委机关地址。一位梳着羊角辫、自称“鬼见愁”的胖墩墩的北航女大学生,反复向我们宣讲“红色恐怖万岁”、“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还说:“你们不支持我们,就要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你们永世不得翻身。”我瞥见她的一个笔记本上写着一个名字:“刘春娥”。经报告、请示市委后,向他们提供了索要的做宣传用的一些物资材料。29日前后,北京红卫兵大批到来,聂元梓系“首都红三司”的也到了上海。他们不来联络站,直接去各大专院校串联、动员“造反”,并集聚在延安西路33号市委机关门前、静安公园等处,鼓动市民支持他们起来造反,冲击市委机关的意图愈来愈明显。许多市民与他们展开辩论,杨富珍带领着一些工人赶来劝说他们离开、不要妨碍办公。29日上午9时许,苏超通知我和联络站的同事赶快前去做劝说工作,在33号门前,我向红卫兵们自我

介绍:“我叫张文豹,是市红卫兵联络站的负责人。同学们,不要冲击市委机关,这样影响工作,希望大家离开。”下午,又到静安公园继续做红卫兵们的工作,还和他们及部分持“造反有理”、“红色恐怖”观点者展开辩论,我谈自己的观点:“解放以前,敌人对我们实行白色恐怖,我们革蒋介石反动派的命,造旧社会的反,那是有理的,现在新社会,不能革自己人的命,造人民政府的反,这是无理的,我认为:没有也不能实行什么红色恐怖。”好多年以后,我所住花园公寓的邻居老蔡见到我说:“老张,那时我也去静安公园了,看到你和北京的红卫兵们辩论,我看他们辩不过你啊。”

但是,劝阻无效。上海的许多工人们神情严肃、庄重,手挽手组成人墙围绕在33号周围保卫上海市委机关,北京红卫兵们不断力图冲击进入33号,很难抵挡。30日我向苏超报告:“看样子顶不住了。”苏告诉我:“已通知,所在机关决定31日放假,文件等全部转移,把门窗关好,做好受冲击的准备”,并让我尽可能进行劝阻。31日中午12点30分左右,部分红卫兵找来梯子等工具,从东侧爬墙通过楼梯进入了33号大楼内,从里面打开门锁,人墙再也无法抵挡,大批北京红卫兵瞬间一拥而入,我看到了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红卫兵们的一张张兴奋的脸在晃动。有一位红卫兵爬上楼顶,想扯下国旗,见状,我和许多工人、市民们痛心疾首、齐声高喊:“不准降国旗!不准降国旗!”我冲着他喊:“这是国家的标志……”结果,愤怒的吼声震慑了那位冲动的红卫兵小将,他住手了,五星红旗仍在飘扬。我午饭也没吃,进入33号继续劝说,看到因事先已做好了准备,红卫兵们一无所获,稍感宽慰。晚上6点左右,红卫兵们才逐渐散去,回所住学校了。但市民们依然三五成群,议论纷纷,忧虑、迷惘、不安。晚上走回联络站,向苏超通报了情况。当时,我和蓝瑛、郑均培都步行往返各处,另三位同事骑自行车四处联系工作,非常辛苦。

11月5日,马天水的秘书打电话给我,说交大“反到底”红卫兵组织要查抄烧毁档案,校党委希望我去做劝阻工作。交大派车将我接去,和党委书记余仁、校长张华等略作交谈后,就在校部会客室直接和该组织负责人之一的严步东等见面。不多时,严等要求我到该组织的司令部和他

们谈,说:“你来了,我们欢迎,你就在我们这儿住下来!”我也想和他们多接触,了解他们的思想,看看他们是如何组织、活动的,就答应住下来。于是,和严等在学生宿舍同住一屋,睡在下铺,买饭菜票和他们一起在食堂吃饭,排队时还相互让先,他们客气的称呼我“老张”。这样,和他们同住同吃,并四处走走、看看,在宿舍和他们聊天;了解到,他们不信任校党委,怀疑档案里记载了一些不利于他们的东西,因此想烧毁,认为这是“扫四旧”的革命行动。我对他们说,这不是“四旧”;档案每个人都有,和户口一样,我也有档案,没有档案,怎么证明你是谁?怎么毕业?怎样接受工作分配?这是关系到你们今后一生的事情,怎么能烧毁呢!你们要相信校党委,建立学生档案是国家的统一规定,是对你们的爱护。我每天到校党委通报情况,也要求他们一起做工作,校党委的组织部岳部长和其他干部、教师们一起向他们解释,进行劝说、疏导,终于缓解了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以后,未见“反到底”组织的红卫兵们继续进行查抄烧毁档案的行动。

11月9日晚七点,严步东等突然不由分说地把我拽到一辆吉普车上,说:“一起到文化广场所开会去”,问开什么会,严说“不要问了,去了就知道。”我和严及另两个人到了文化广场后台,严说:“我把你介绍给王洪文”,接着对王洪文说:“这是张文豹,市委红卫兵联络站主任。”王对我说:“我是工总司负责人,叫王洪文,我们在这里召开工总司成立大会,希望你代表市委讲几句话,支持我们起来造反。”这是第一次见到王洪文,在场我所认识的有潘国平,潘见到我便说:“我见过你,你就讲几句,代表市委支持我们。”我无任何思想准备,感到问题严重,面对突如其来的要挟,我镇静下来,停顿片刻后,对王、潘等说:“你们工人师傅要起来参加文化大革命,是允许的,但是,要按《十六条》办事,抓革命、促生产,不能停产闹革命。第二,我是市委机关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我无权代表市委。”王洪文等人说:“不行,其他人没找到,就找到了你,你是联络站主任,你可以代表市委。”潘国平一边把我往主席台推一边帮腔说“你可以代表……”,我再次解释“我是和学生打交道的,你们工人师傅要起来造反,这不是我的工作范围”,王、潘等说:“不行,既

然来了,就到前面去和大家见个面”,我摆脱推搡,自己走到主席台前,看到昏暗的灯光下全场坐满了人,王洪文用麦克风介绍:“张文豹是上海红卫兵联络站主任,欢迎他代表上海市委支持我们起来造反,欢迎张文豹讲话。”下面高喊:“你代表市委讲话,你代表市委讲话……”,等喊叫声停了以后,我就向台下的人们说:“工人师傅们,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号召的、中央领导的革命运动,你们起来参加是可以的,但《十六条》的规定是抓革命促生产,不能停止生产,起来革命、造反,这样违背《十六条》,不应该。我是市红卫兵联络站主任,但只是市委机关的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无权代表市委,我劝你们还是按《十六条》规定办。”台下面“不许你胡说,不许推卸责任……”的叫喊、嘘声乱成一片,我站在台上,局面僵持着,王洪文见状便朝台下的人群说:“师傅们,他既然不支持我们造反,就把他轰走好了。我们另想办法。”旁边的潘国平等恼羞成怒,狠狠斥责我,叫严步东把我带回去,混乱中有人打了我两个耳光。回交大的路上,在吉普车里严埋怨我“你为什么不代表市委讲话?”我说“他们不应该停产闹革命!我也无权代表市委讲话。”严说:“你真是,如果你说了支持他们,以后日子就好过了。”我说:“我不能那样做。”回到交大学生宿舍,我一夜没睡好。

第二天一早,我向苏超通报,苏说“昨晚还有这事?……”我说“可能还会有其他的行动”。中午,校党委派人找到我,说“梁国斌副书记叫你赶快回去”,即派车将我直接送到康平路市委,梁国斌已站在机关大院小车旁等着,看到我便说:“跟我去安亭车站,他们已经卧轨了!”下午2点左右,我随梁国斌、李庸夫直达安亭车站。车站内,许多人散乱地坐在铁轨上,有的在站内四处游荡,火车全部停运了。车站的工作人员把我们引到值班室,王洪文不在,便把一个约30岁、穿工作服、听闻是一纺织厂的机修工的小头头找来了。梁严肃地批评他说:“你们这样做是完全错误的!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不应采取卧轨这样的行动,阻断交通,火车不能运行,影响国家建设,要赶快撤回去!”小头头说:“我们起来造反闹革命,你们市委不支持,找你们领导又找不到,没办法,只好在这里,你们不管,中央文革会管我

们。”李庸夫插话：“你们这样做是违法的，国家宪法、法律没有规定用阻碍交通的办法来实现自己的要求，赶快撤走，让铁路恢复运行。”在场的造反派们轰起来：“你算老几？你们说话不算数。”梁表示：“告诉你们的司令，还是要按《十六条》办，赶快撤走！”小头头说“我汇报过了，我们的行动听王司令指挥。”谈话不足半小时，劝说无效，我没插话。回来路上，都沉默不语，到康平路时我说：“梁书记，看来事情闹大了，要研究怎么应对。”梁回答：“那好吧。”梁又用小车把我送回陕西北路联络站。见到蓝瑛、郑均培后，我对他们说“事情愈闹愈大，看样子，大的风暴还要来，要做好准备。”

11月14日，苏超通知我下午1点30分去康平路市委2楼会议室列席常委会。会议主要是听张春桥的意见，陈丕显没有出席，曹荻秋主持会议。曹说：“张春桥同志从北京来，代表中央文革和我们商量怎样妥善处理安亭事件的问题。”接着，张春桥站了起来，面露愠色，用手指着曹：“你们完全错误！为什么不支持他们起来造反，上海是工人阶级的大本营，有优良革命传统，他们响应毛主席号召参加文化大革命，你们一个领导也不跟他们见面，为什么！”常委们静静地听着他批评，张接着又说：“毛主席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是从上海发起的，你们跟不上形势，违背毛主席的指示，要尽快改正。”曹荻秋说：“丕显同志一直在养病，市委的日常工作是我主持的，我们这些老革命碰到了新问题，对毛主席的指示没有充分理解，对工人起来造反没有加以支持，这是我们的失误，愿意接受春桥同志的批评，研究怎么改正。”张提出：“有错就改嘛。我带来中央文革小组的5点意见，请你们考虑。”所谓5点意见，内容即为张春桥签字同意的工总司的5项要求。曹说：“春桥同志代表中央文革谈了5点意见，大家看看有什么意见？”沉默了几分钟，马天水首先发言：“我赞同春桥传达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上海工人师傅起来闹革命是正当行为，上海工人有革命精神，我们应该支持，我同意5点意见。”接着王少庸发言：“我觉得春桥同志对我们的批评应该接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争取主动，陷于被动，现在应抓紧时间把这局面改正过来。”曹问：“其他同志有什么意见？”又沉默了几分钟，没

人讲话。曹最后说：“按春桥同志的5点意见、我们照办好了。”

11月20日，苏超派车把我从陕西北路接到华山路陈丕显养病处，市经委副主任熊中节已在坐，陈丕显对我俩说：“这几天的形势你们都了解，工总司成立了，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市委今后的工作有很大的困难。”说着，他双手一摊：“看来大势已去。”嘱咐：“你们两个，现在要注意，老熊哦，你要想办法把工业生产抓好，尽量减少损失。你呢，”指了指我，“在联络站要注意掌握各方面的情况，及时向市委汇报，并且要想办法帮助解决问题。”我们问：“陈书记，你身体怎样？要多保重！”陈回答：“最近身体还好，希望能挺过这一关。”谈了半个小时左右。一起出来，我和熊中节互道：“再见，多保重！”

我和联络站的同事们，按照陈丕显书记和上海市委的指示精神，恪尽职守。11月30日，“红革会”占领《解放日报》社，阻止了报纸的出版，我和蓝瑛等奉命三次进入报社内了解情况并做劝说工作，但无效果。秋末，寒意渐深，安子文部长的儿子安民来到我家，告诉我，北京的造反派红卫兵冲击了中央组织部，他父亲已受到批判，提醒我要注意了。12月30日凌晨，工总司和各路造反派冲进康平路市委机关大院，围殴赤卫队员，扫荡了市委办公大楼，我们闻讯赶去，只见楼内已空无一人，一片狼藉。

回到联络站，我对蓝瑛、郑均培和其他三位同事说：“联络站解散吧。各回原单位。”至此，上海市红卫兵联络站的任务也就结束了。■

（张文豹，曾用名：张旭东，历任东北人民政府秘书长、中央组织部办公厅副主任、上海市新成区委书记、静安区委书记、上海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安徽省委副秘书长兼淮南市委书记。）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本刊公告

2009年简装合订本(上、下册)105元

2010年简装合订本(上、下册)105元

免费挂号邮寄，汇款地址见本刊目录页

一个沉冤几十年的大案

。 童梓平

一、迟到的春天

1984年7月24日《四川日报》刊登出一篇中共四川省委为四川民盟平反一起特大错案的评论文章。这起特大错案沉冤之深，涉面之广，株连之多，在解放以后全国统战工作中极为罕见。

这个错案的严重后果是：1950年“镇压反革命”时，在西康省荣经县错杀掉109个民盟领导的起义有功人员；另有36人于服刑中死亡，共计145人冤死，连当时的西康省民盟筹备委员会宣传部长黄汝杰也被镇压，数百人受株连，遭管制，所有这些被关、管、杀人员两代家属子女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

三十四年后的荣发(1984)25号文件称：“经复查，解放前夕民盟地下组织，为配合迎接西康解放，在中共地下党支持参与下，派张志和、彭迪先等盟员负责争取国民党西康保安司令部，雅、荣、汉联防总队队长朱世正率部起义。并在起义后对人民做了有益工作。但解放后，对他们没有被按照党的政策作起义人员对待，更为严重的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中又把这支部队错误地定性为‘以张志和为首来荣经勾结地主、土匪组织的，暴乱性质的武装组织’”。

解放后在历次运动中，除这支队伍的军事人员外，其他参加策反起义的政治工作人员均因株连而被残酷处理，有文书档案可查的有51位。我在成都参加中共省委统战部“落实省委51号文件会议”时，统战部长但汉然在会上讲道：“这个错案发生在荣经，但影响远超出这个范围。在省内有几个地区、省级机关、甘孜州、自贡市，还涉及北京、上海、河南和安徽，不仅涉及民盟的一大批同志，还涉及不少中共党员。”

比如，在紧跟镇反之后的“三反运动”中，负责朱世正起义部队军需的秘书李毓昆（盟员）被

诬蔑为“贪污粮食”送入监狱；当时担任荣经县人民政府财政科副科长的秦朝钟（盟员），被诬蔑为“账目不清”，打成贪污分子收监；第三小学校长陈应硕（盟员）因参与组训武装队伍，被诬蔑为“贪污”，遭轮番批斗、罚跪，气愤之下含冤上吊而死；民政科科员郑树贤（团盟交叉），被诬蔑为“克扣教养院人员伙食费”，遭批斗管制留用改造。

在当时“左祸”肆虐的“红色恐怖”下，全西康省几百盟员受株连。比如，来荣参加地下策反活动的川大学生吴国治（盟员），在他的档案袋里，1958年8月4日的结论是：“关于参加以张志和为首的组织暴乱土匪武装问题审查结论：1949年10月被中国民主同盟组织派到西康省荣经县参加以张志和为首组织暴乱土匪武装组织的活动。到荣经后先在民生小学搞所谓民盟的外围组织‘校友会’工作。后又参加彭迪先组织的直属土匪部队政治部领导的随军文工团，在荣经四周向土匪部队进行慰问演出活动。”

1957年反右时，凡与此事有关联的川盟领导人潘大逵、张志和、彭迪先、范朴斋、张松涛统统被打成右派，李伯平被划为反革命右派送劳教；罗西玲和杨汇川被打成反革命右派，跳水自杀。荣经公安局预审股股长党玉田（川大学生盟员）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在押送劳教途中从桥上跳江自杀；“黑线”下连荣经，地下时期盟员经“镇反”之后本已寥寥无几，又把孙华榕、郑树贤、吴家声、孙光西、尧俊成、石明玉、张正樑、童梓平、石章询九人划成右派分子。除个别而外，几乎都成右派。当时民盟主委孙华榕被定为“章罗联盟在荣经的代理人”，打成反革命右派送劳教，放回后家破人亡，孤单无依，生活无着，抱病以拉架架车为生，后因劳累过度吐血而亡。更为可恶的是，他死后，城厢镇不知道人已死，还通知他去接受大会批判。

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大军还将五宪乡大院子生产队的李少均五花大绑到荣经东方公园批

斗，只因他在朱世正起义部队担任过分队副，属于“土匪小头目”。

说到这些人的家属子女受株连后的苦难就更让人辛酸。如高永富（盟员）被错杀后，妻子几次寻死，儿子高玉均读书就业被阻，女儿高玉芬考取体校、卫校都由于政审过不了关而失学，1962年在印刷厂被无故压缩回家。小女高玉锦无力供养，忍痛送人。又如亲自到黄泥堡逮捕中统少将特务余仲篪的神枪手肖锦（盟员），说他是朱世正的土匪漏网头目，要逮捕他。他得到消息连夜逃跑在外，二十多年没有音讯。他妻子经常来找我，要人，说“肖锦为你放哨站岗，保护你安全，半夜出发送你到雅安迎接解放军。现在我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她满面流泪，要我送她的丈夫。

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想着与我生死与共的一个个战友落到这种地步，我的心在滴血！

时隔三十六年，作为战犯关押了25年的朱世正回到荣经来我家，他感慨万端地说：“梓平老弟，我朱世正倾全部武装、全部经济、全家、全族生命和全部精力靠拢民盟，靠拢共产党，积极争取，舍命争取，结果争取到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过了二十五年铁窗生活！特别想起我的贤内助石文玉，她深明大义，无私奉献，为革命和我朱世正付出的太多，太多！你看见的，解放前夕，由重庆、成都先后转移到天宝乡我家中避难的数十位中共地下党员，民盟盟员，加上警卫人员，每日三餐，多则十桌八桌，少则三桌四桌，长年累月都由石文玉精心安排，惟恐口味不合，住宿受冻。有谁知道这位默默无闻，无私奉献自己一切的石文玉，是如何被逼迫致死，谁知道她的尸骨至今抛在何方？她既非地下党员，又非民盟盟员，谁人来为她落实政策？她只有徘徊于奈何桥畔，铁围山前观看那凄清的寒月……”听着他啼血的哭诉，我也情不自禁老泪纵横。

错案虽已平反昭雪，可是世人大多至今对是非功过仍然认识不清，特别对刘、邓、潘起义的重大意义，对西康民盟“联刘反蒋拥共”路线、解除刘文辉起义后顾之忧认识不清，对朱世正率部起义抗击胡宗南、王陵基残余，保境安民的深远意义认识不清，对张志和、朱世正的丰功伟绩不但认识模糊，甚至现在还有人在说“张是军阀，朱是土匪”。现在，这一事件的知情者杀的杀了，死的

死了，我是直接参与、领导这个事件的幸存者。涉及的人和事我一清二楚，我不说谁说！我不写谁写！不然，我怎么对得起被冤杀的同志和并肩战斗反遭折磨的战友！更无法向受株连的百户千家的后人交代，所以我要大喊大叫，我要为他们鸣冤！鸣冤！鸣冤！

二、张志和与刘、邓、潘起义

早在1927年张志和将军经洪沛然（洪仿予）的介绍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党派李鸣珂同志与他联系。1937年张志和接韩伯诚通知，在韩家与李一氓同志见面，得知中共中央要张志和赴延安见毛泽东，即与李一氓先到西安，在八路军办事处会见林伯渠。后与美国记者一道搭办事处汽车到达延安，住在外交部。之后，分别拜见各首长，参观各机关、党校、陕北公学，其间毛泽东送了他一本用连史纸石印的书，讲的是江西几次反围剿的胜利战史。他也送了两本书给毛，一本是他著的《现代战争论》，一本是他们“辛恩书店”翻译出版的克劳塞维兹大将的《战争论》。

一天夜里，毛再次约见他，张志和把他从1927年入党以来的情况一一汇报：邛崃办团干校，川军中培养党的军干，重庆办《新社会日报》，白色恐怖中办革命旅馆，江津起义暴动后，被开除党籍，出国考察，回国救亡……谈了几个小时。当毛听到上海辛恩书店李凡夫就是张志和时，很高兴。马上去书架上取了《研究与批判》各期，诚恳地作了评价和鼓励，就在这样亲密的气氛中谈了一个通宵。事后毛又安排他与张闻天专谈了一次，10月10日在二、四方面军会师纪念大会上，在陕北公学开学典礼上，他都应邀讲了话。

临行前，毛亲自给他分配任务，叫他回四川做统战工作。毛说：“你与四川军阀历史关系深厚，可以去策动他们。第一步不要做蒋介石的忠实走狗，不要与我们认真作对；第二步使他们在国共战争中守中立；第三步最好把他们拉到我们这边来，共同革命。这任务是非常重要的，你要认真努力去干。”毛又送了一张照片给他，背面亲笔题字“志和同志留念”。从此，这一使命制造了张志和同志坎坷跌宕的一生。

张志和回四川后根据毛的指示做刘文辉（西

康省主席兼二十四军军长)、邓锡侯(四川省主席兼九十五军军长)、潘文华(驻重庆军方负责人)等人的统战工作。

1942年经张志和安排,引刘文辉与周恩来在重庆机房街吴晋航家见面,并建议在西康雅安设立秘密电台。事后,周恩来派王少春等三人在刘文辉公馆建立电台负责与延安直接联系,直到解放。

1943年由张志和介绍,民盟主席张澜吸收刘文辉、潘文华入盟。

1948年11月,四川民盟省支部主要负责人张志和、张松涛、吴汉家在槐树街39号兰绍谦同志家中研究部署如何配合地下党迎接四川解放的总方针时,知道刘文辉最大的后顾之忧是与雅属民间武力的深仇大恨。因刘文辉1946年派保安大队司令张禄宾率1000多士兵到荣经禁烟,被反刘总指挥朱世正一举歼灭(当时朱刚从中央军校毕业不久)。1947年朱世正又纠集天全、芦山、宝兴等袍哥队伍5000多人向刘文辉地方政权发起大规模的武装攻击,一度攻陷天全、芦山,逼近雅安,此事即为有名的“雅属事件”。

省支部认为必须把雅属民间武力争取过来,纳入“联刘反蒋拥共”的武装系列,于是决定把工作重心由成都近郊的邛崃、大邑转移到西康雅安。重点是做好朱世正的转变工作,以彻底解除刘文辉起义的后顾之忧,并决定派人到西康与雅属袍哥总头领陈仲光先生(陈仲光,二十四军副官长,荣经人,雅属袍哥组织新康社社长、朱世正是副社长)联系,通过他了解民间武力状况和协助做工作。另一方面输送成渝等地的盟员骨干和大专院校革命学生到西康深入农村工作,培训骨干。

1948年国民党“戡乱特种刑庭”传讯川大学生赵锡骅(荣经人),盟省支部通知赵转移回老家,首先对朱世正和赵锡骅的老师黄汝杰展开工作。黄赓即入盟,又经赵、黄多次反复启发教导,朱世正也认识到大势所趋:只有联刘反蒋拥共才有出路,赓即提出申请入盟的要求。1949年2月经四川省民盟省支部反复研究决定吸收朱世正同志入盟。

1949年8月,民盟西南总支委员张志和代行西南总支主任委员潘大逵的名义通知,在荣经天宝乡朱氏宗祠举行成立中国民主同盟西康省支

部筹备委员会,彭迪先为主任,张松涛为秘书,赵锡骅为组织部长,朱世正为军事动员委员会主任,黄汝杰为宣传部长,李伯平为财务委员,工作人员有杨汇川,任组织部秘书,冯泽生任秘书干事,杨正南(雅安地下党领导)任宣传部主任干事,后增加罗西玲为筹备委员兼文化委员会主任。

1949年11月30日西南重镇重庆解放,刘、邓、潘三人聚首成都,联合起义参谋部内紧锣密鼓筹划布置,民盟西南总支负责人潘大逵也前来参与策划,加强领导。

1949年12月5日周恩来终于给雅安电台发来指示:“时机已至,不必再作等待”,张志和立即将电文转给刘、邓、潘。12月7日,蒋介石以在成都北校场召开会议为名,企图把川康高级军政人员(包括刘、邓、潘)劫往台湾做人质,以此阻止川康两省起义,这时,潘文华已在彭县翘首以待。刘、邓二人接到蒋介石会议通知后,即于当日下午携带少数随从,避开特务耳目,赶到彭县邓锡侯九十五军防地,紧急商定于12月9日签署发出起义通电,并于11日将此通电发给毛泽东和朱德。

通电发出的当天,蒋介石气急败坏,立即命令成都城防司令盛文用坦克、大炮向刘文辉的住宅和武侯祠二十四军驻地发起猛攻。刘、邓、潘一面指挥部队反击胡宗南部队的进攻,一面派员四出,对徘徊歧路的其他国民党部队进行策反。在三位将军的推动下,川鄂绥靖副主任宋珩于12月21日在金堂、广汉起义,十五兵团司令罗广文12月24日在彭县起义,二十兵团司令陈克菲、杨森部属喻孟群军长、四川保安处长刘兆黎等部也先后纷纷倒戈,驻扎成都的40多万大军土崩瓦解,成都宣告和平解放。

贺龙评价道:“川康将领的起义,政治上的影响大于军事上的影响。”刘、邓、潘三位将领在蒋介石“决战成都”的关键时刻率部起义,促使40万蒋军土崩瓦解,使西南历史名城未免于战火,是党长期以来推行统战政策的胜利。这胜利中包含着张志和同志的血和汗水,志和同志功不可灭。

三、朱世正贯彻联刘反蒋拥共的决策

刘、邓、潘起义前,朱世正入盟。入盟后,被选

为民盟西康省支部筹委会军事行动委员会主任，从此朱世正一心一意为“联刘反蒋拥共”的决策奉献出自己的一切。现将朱世正为革命作出的功绩列举如下：

1. 为了配合刘文辉起义，朱世正召集雅安联防总队 18 个大队，21 个直属中队和参谋部、秘书处最贴心的有关人物 400 多人，由张志和同志给他们讲联刘反蒋拥共的道理，以及如何防止胡宗南、王陵基溃军经西康南逃滇缅，讲《论人民战争》、《人民军队》、《阻击战》、《森林战》、《袭击战》历时三天。张志和同志通俗易懂的讲解，使与会者深受启发和鼓舞。

2. 朱世正为团结各方人士，安定社会，为西康和平起义解除刘文辉后顾之忧。他以雅属联防总队长和“新康社”袍哥组织头领的名义，在峡口坝（天、芦、荥三县交界处）召开“雅属事件”中反刘的大小头目 40 余人，人枪千余。在会上朱世正首先发言，着重说明张志和、陈仲光两人提出的“联刘拥共反蒋”的政治纲领很得民心，很符合当前实际。他说：“过去我们反刘，是迫于自身的生存，今天是大势所趋，因为刘文辉已向共产党靠拢，川、滇、黔的军事将领纷纷准备起义，我们现在有地下党、地下民盟的支持帮助，也应向共产党靠拢才有出路。我们应该主动捐弃前嫌，应该与刘文辉携起手来，不要再互相仇杀、糜烂地方，要使我们的父老兄弟姐妹安居乐业，否则我们会成为千古罪人。从现在起我们要团结一致，配合二十四军阻敌于川康之外，解除刘文辉率部起义之后顾之忧。”大家听后表示：“听朱大哥的，跟朱大哥走！”刘文辉得知此事，心中石头落地，送给朱世正机枪 24 挺，步枪 200 支、子弹三万发，手榴弹 150 箱。

3. 保护革命党人。1949 年 9 月朱世正得知荥经国民党的孙雨膏、孙悦岩、田芳先、黄石书，民社党的孙超，青年党的孙昭和孙培先联合组织了个“7 人暗杀团”，准备在东区的天宝乡到荥经路上和荥经城内潜伏，相机杀害地下党员、盟员和进步人士。朱世正及时公布了对“暗杀革命进步人士者斩”的布告。暗杀团知道斗不过朱世正，不得已罢手。

张松涛同志在雅安得知特务头子朱子江将率武装特务到荥经暗杀彭迪先等同志，松涛不顾

个人安危，立即从雅安冒着大雨，踏着泥泞夜行 90 华里赶往荥经。到荥经城时，彭迪先尚在梦中，张向彭说明情况后，彭立即于当晚摸黑走 30 里夜路到朱世正家躲避。朱立即向秦启明大队下令，“凡见朱子江和所带人员就地击毙”。

1949 年 10 月，童梓平在东街秦朝忠（党员）家召开东街盟友会，讲革命形势和迎接解放。杀人不眨眼的孙超携着上了膛的手枪追到秦家，放哨的同志高叫：“孙大爷来了！”与会人员上前团团围住孙，童得以脱身从后门走脱。事后朱世正亲到孙超家警告孙超：“童先生是我的好朋友，你娃娃伤害了他，我饶不了你。”

由于朱世正对荥经盟员的保护和支持，自 1948 年到 1949 年，成、渝转移来荥经的骨干盟员有 28 人（其中 7 人党盟交叉）。这批精干力量在荥经发动群众、培训骨干，壮大民盟组织，成立盟友会、农友会、学友会、妇女会、少先队、儿童团，办民生小学，社会大学、成立流动剧团，公演歌剧《白毛女》、《活捉蒋介石》，高唱革命歌曲……故当时荥经有“西康民盟的摇篮，雅安的延安”之称。

4. 活捉国民党中央调统局西康调查处少将处长余仲篪。1949 年 11 月接雅安通知，特务余仲篪收拾电台、焚烧档案后，率特务林懋及两个女儿往西昌转移。朱世正派神枪手肖锦和川大学生范炬明率领柴国嘉部队连夜赶到黄泥堡捉拿。经全场搜查，在一家旅馆将余仲篪、林懋、余中、余平抓获。经彭迪先和童梓平审讯，获悉其在雅安地区布置潜伏特务的情况，为后来的肃特工作提供了重要线索。1951 年重庆《新华日报》刊出：“中统西康调查处长余仲篪，在荥经被我军俘获，查该犯一贯杀害进步人士，血债累累，民愤极大，判处死刑，绑赴磁器口刑场执行枪决。”

5. 整训部队，枕戈待命。1949 年 11 月，胡宗南兵败向川康溃逃，蒋介石亲临成都企图负隅顽抗，王陵基组织反共救国军和保安队作最后挣扎。

在上述紧迫形势下，西康地下党和民盟组织在雅安刘文辉军部苍坪山召开了应急会议。参加人员有张志和、杨正南（雅安地下党负责人）、彭迪先、张声明、童梓平共 5 人。会上研究，为促使刘、邓、潘早日起义，必须把地方武力集中起来与起义部队配合，协助解放军更有效彻底消灭胡、

王匪部,决定以王德全保安第三团为基础,加上雅安地方武装,编为“川康人民革命军第一纵队”。以朱世正为首的自卫总队为主,编为“川康人民革命军第一师”。会后,彭迪先、童梓平立即回荣向赵锡骅和朱世正传达决定,命令荣经武装集中整训待命。由朱世正签发命令,召集地方武装头领在总部开会,研究建制,集中地点,组织编队,通讯联络和后勤供给等问题。预先培训的40多位政工人员准备政治教材和宣传鼓动材料及标语口号,印发“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宣传材料。制作布质徽章,准备出征时佩用。将3000多地方武装人员分西、南、北区三个点集中,由刘光烈、任康执、秦朝忠(3人均系党盟交叉)分别带领政治工作人员到各部队整训,并亲自带领每天出操、上课、整训。彭迪先带领“流动剧团”到集结点慰问演出《白毛女》《朱大嫂送鸡蛋》《送子参军》等剧目。朱世正将这支部队5个大队分别部署在荣经的复顺乡,雅安的观化、紫石、对岩的大路,沿线防守。将7个大队分别布置在荣经六合、花滩、荣河、泗坪和大相岭。将4个大队布置在芦山飞仙关起到两河口。其他大队与直属中队作预备队,机动使用,全体武装人员枕戈待命,时刻准备消灭来犯的胡、王军队。

6.精心保护周恩来设置的电台。1949年12月下旬四川省保安司令王陵基派保安三团、五团从雅安上里乡甲口进攻雅安,雅安震动。雅安军政人员打算,如情况严重,准备暂时放弃雅安。在这关键时刻,张志和与二十四军代军长刘元煊研究,再同陈仲光商量,决定将周恩来设的电台及王少春等人员一并撤到荣经天宝乡朱世正家,以便让朱世正保护。朱世正立刻派身边警卫中队长朱世炳带领人枪到雅安护送,为防止意外,朱又派第一大队长秦顾明率领人枪到观化、紫石接应。电台组下榻朱氏祠堂后,朱又从九大队、十一大队中挑选警惕性高、能征善战的两个中队来站岗放哨。当雅安处于四面包围十万火急时,张志和就用这部电台向周恩来告急,请求中国人民解放军尽早进军西康。12月17日周恩来回电如下:

“张志和并转刘、邓、潘三位先生:第二野战军刘、邓来电,转如下:恩来巧亥(按:18日24时)。“军委:我先头十七军已于铣日(按:16日)攻占乐山、青神,正向西进发中,战果待报。十一

军,十二军今(夜)日(按:17日)可达新津、彭山、岷江之东岸地带,特此转告。”

电文到来,对二十四军官兵起了鼓舞的作用,人心安定。并组织地方武装三次击退来犯之敌,解除了雅安之围。

7.1949年12月朱世正发出起义通令如下:

通 令

本部起义,仅贯彻拥共反蒋之政治纲领,迎接解放,为解除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查近来社会谣传,胡宗南、王陵基残部阴谋窜康南逃,胡长春勾结羊仁安企图扼大渡河而守,唐式遵窜入芦山成立反共救国军,三三五师王伯骅残部又窜入汉源,加以部分潜伏之军统、中统分子勾结恶霸土匪,四处造谣惑众。上述反动派不自量力,均属螳臂当车,蚍蜉撼树,本部为维护雅荣汉一带社会治安,严惩一切反动分子破坏捣乱,特此公告八斩令于下,望各周知:

- 一、造谣惑众,破坏起义者斩;
- 二、袭击友军者斩;
- 三、阴谋暗杀,残害革命进步人士者斩;
- 四、烧、杀、抢、劫者斩;
- 五、破坏治安,假公济私者斩;
- 六、勾结敌特,聚众暴乱者斩;
- 七、焚烧档案,盗窃人民资财者斩;
- 八、奸淫妇女者斩。

切切此令

川康人民革命军暂编第一师师长

朱世正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五日

配合解放军支前。1950年2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二军和平进入雅安。2月7日六十二军司令员刘忠、政委廖志高电召朱世正到雅安,任命其为西康支前委员。2月8日叫朱世正与童梓平随553团团长王登贵由雅安出发挺进荣经,沿途遭多股土匪袭击。朱世正不断向土匪喊话“向解放军缴枪不杀!”等,边打边走,当天夜宿观化。9日,解放军到荣经后,朱世正担任支前委员会主任,为解放军筹集粮食。1950年2月廖志高(西康省主席)指示朱世正护送特使余体仁去富林规劝羊仁安。余体仁身揣廖志高、陈仲光、刘元煊三人的亲笔信件,叫羊仁安、曹伯论、岑光电三人再不能跟着国民党跑了,应即早回头。朱派得

应正式重新评价陈独秀

○ 徐学江

在迎接建党 90 周年之际，中国共产党人不应忘记在血雨腥风的年代敢于第一个站出来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人，更不应该忘记这个有大功于党、于人民、于人类进步和解放事业的历史巨人长期以来被作为“反面人物”大加挞伐，至今仍未获得应有的公正。

笔者通过本文强烈呼吁，希望我们党利用建党 90 周年的机会，重新审视和评价陈独秀的历史功过，纠正长期以来在苏共中央、共产国际以及极“左”思想影响下在对待陈独秀问题上“过严过苛”的政治偏向，还他以公正和公道。

近几年我阅读了一些有关陈独秀的文章和资料。出于对陈独秀不幸遭遇的不平，更出于对党的利益的考虑，我曾多次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声音。2007 年 5 月 25 日，在陈独秀逝世纪念日前夕，我在新华网上发表了长文《历史不会忘记陈独秀》。2008 年 5 月 30 日，同财政部、二炮、国家工商总局、新华社几位退休党员以及两位年轻党员联名给党中央写信（通过中组部转），建议“借明年‘五四运动’90 周年或陈独秀诞辰 130 周年的机会，或大后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的机会，重新评价陈独秀的历史功过，纠正长期对其不公正的对待”。2009 年 6 月 22 日，在五四运动 90 周年之际，我又在新华网上发表文章《重新评价陈独秀必须突破几点认识迷思》。今年 1 月 20 日我在新华网个人博客上发表《应正式公开重新评价陈独秀历史功过》。这次给《炎

黄春秋》杂志传去此文，算是我个人做的第五次努力。

我以及赞同我看法的党员同志认为，重新评价陈独秀，纠正长期对他的不公正对待，是必要的，对党有利。因为：一、陈独秀建立了举国、举世公认的三大不朽历史功勋，这就是：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发起者和主要旗手，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和党的早期主要领导人。一个能同时立下三块历史丰碑的人是当之无愧的历史巨人，一千年后讲历史仍然要讲这三件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当然也绕不过这三件大事的主角陈独秀。二、综观陈独秀的一生，他始终保持了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铮铮铁骨和真正共产党人的英雄本色。他是个对封建制度和反动派充满恨、对劳苦大众充满爱的人；是个忧国忧民，有强烈使命感的人；是个勇于冲破黑暗、追求光明的人；是个性格鲜明、意志坚强、宁折不弯的人；是个能站在革命前列，振臂高呼，冲锋陷阵的人；是个正直的人，有骨气的人。他一生五次被捕入狱，从清朝政府到北洋军阀、到法租界、到国民党政府，面对反动派的软硬兼施，他视死如归，从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屈服妥协。三、他在感情上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亲手缔造的党，他虽然被开除出党，但没有说过共产党不好，对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的污蔑，他总是义正词严地予以驳斥；从国民党监狱释放出来后，他断然拒绝国民党封官许愿的利诱，也谢绝朋友

力心腹高永富、石章帆两人执行了护送任务。

结束语

通过以上简述，我们可以看出“以张志和为首来荣经勾结地主、土匪组织的暴乱性质的武装组织”是多么荒谬！那些被杀的武装起义基层领

导是多么冤枉！那些被历次运动折磨得九死一生的党员、盟员是多么悲哀！那些被两代株连的家属子女是多么的无辜！那些至今仍然不明真相，抱有成见，甚至压制真相的人是多么的迟钝、狭隘和不明智。

（作者为原民盟荣经县总支主委、离休盟员）

（责任编辑 杨继绳）

要他到国外讲学的建议,他一心想到延安,回到党和革命队伍中去,只是由于王明、康生秉承苏共和共产国际的旨意极力阻挠而未能如愿。四、为了革命,陈独秀无私地奉献了一切,两个儿子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家破人亡,自己虽壮志凌云,满腹经纶,最后竟在贫病交加中悲惨死去。

至于陈独秀的错误,要历史地、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看待。如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陈独秀的责任,所谓“托派”问题,开除陈独秀党籍的根据等问题,都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鉴于陈独秀的巨大功绩和影响,也鉴于他的错误以及在当时复杂国际背景下对他的不公正处置,在大量内部材料公开、苏共有关档案解密的今天,难道不应该在更大的格局下、以更宽广的视野和胸怀对他的问题重新审视和加以廓清吗?

对陈独秀的处理,党内一直有不少人公开地或背地里为之鸣不平,王若飞就是有代表性的一位。毛泽东虽然后来对陈独秀有批评甚至某些情绪化的说法,但总体而言,他对陈独秀持比较公正的态度,在多个场合的谈话流露了对陈独秀的敬意和对陈功绩的肯定。其中以1936年同埃德加·斯诺的谈话和1942年在中央一次学习会上的发言、1945年在“七大”预备会上的讲话谈得最完整、最客观,并表示将来修党史和中国历史时,要讲一讲陈的功劳。可惜,建国后毛泽东的诺言没有兑现。胡耀邦同志1984年在修改一篇关于陈独秀的文章时说:“第一次大革命,在那种条件下,陈独秀是很难不犯错误的”,“写陈独秀这种对革命有过很大贡献的历史人物,要像鲁迅写章太炎那样,有一种深邃的历史眼光,采取厚道公正的写法,这样才能正确评价前贤,深刻吸取历史教训,使后人受到教益”。这些年来,对陈独秀的评价虽然在发生某种悄悄的变化,但尚不能使人们感到“厚道公正”。但我们应该沿着毛泽东几次完整客观评价陈独秀的谈话和胡耀邦谈话的思路,把重新评价陈独秀功过的工作做到底。

我认为,重新评价陈独秀历史功过和重新审



陈独秀(1879~1942)

视对他的历史结论和处理,已远远超越了陈独秀本人和他问题的本身,它实际上考验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正义和良心,考验着我们是否真正做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对陈独秀问题,基调不能止于“微调”,而应作“大幅度调整”。所谓“大幅度调整”应表现为几点:一、对陈独秀功过有明确结论,肯定功劳是第一位的,对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犯的错误作实事求是的分析;二、还陈独秀以政治清白,洗雪王明、康生秉承苏共和

共产国际旨意加在陈独秀头上“汉奸”、“间谍”、“特务”、“叛徒”等莫须有罪名;三、恢复陈独秀党籍,党内称“同志”。陈独秀的一生表现无愧于共产党员称号。“中东路事件”作为开除陈独秀党籍的直接借口,是颠倒黑白的,站不住脚的,也违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的。四、承认陈独秀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的历史地位;五、以上诸点要通过党的正式决议和文件公告全党和全国人民,因为对陈独秀的处理、强加在他头上的种种罪名,都是或经过正式会议、做出正式决定,或写进几十年来的政治、历史教科书,或出于党的领袖人物的讲话,不做出正式、公开的重新评价,不足以澄清事实、消除长期的错误影响。

要重新评价陈独秀功过,纠正对陈独秀过“左”、过严的历史结论和处理,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突破一些思想障碍和认识窠臼。

一、认为陈独秀的问题已成为历史,距今久远,当事人都已作古,我们后人何必找那样的麻烦呢。

陈独秀的问题确实距今超过80年了,但他的问题既是历史,又不完全是历史,它仍影响现实和未来,他的问题是绕不过去的,对他不公正的处理和评价不做纠正,党内和学术界永远不会服气和平静,多数共产党员在感情上难以接受。

纠正历史冤案、错案或政治偏差,无论中国历史和外国历史上都不罕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按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的精

神，不仅纠正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大量冤假错案，还纠正了建国后几十年中的冤假错案，甚至纠正了上世纪二三十年路线斗争中造成的冤假错案。有错必纠，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时间久远不应成为问题。

二、大革命失败的主要责任究竟应该由谁来负？

过去历次正式文件、党的领导人讲话、著作和党史教科书，都把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说成是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放弃了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特别是党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全面，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调子说话，有悖历史真实。

从根本上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我力量悬殊，失败带有不可避免性。哪有革命一次就成功的？陈独秀之后还不是失败了许多次？

从党的领导角度来说，大革命失败了，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当然难辞其咎。但问题是陈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来自哪里？大量的历史资料表明，错误正是来自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中央的错误路线。如让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陈独秀从一开始就反对，认为只能搞“外部合作”，不能搞“内部合作”，搞“内部合作”，在国民党强、共产党弱的情况下只能束缚共产党手脚。而且在“中山舰事件”后，陈独秀本人不顾违犯“组织原则”，毅然单独退出了国民党。但苏共出于国家利益考虑，为了与执政的国民党搞好关系，硬是要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当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对共产党人举起屠刀时，苏共为了维系与国民党的关系，通过共产国际一再让中共忍让。陈独秀不过是执行共产国际的错误路线而已。

过去的文件和领导人讲话、著作，总是以内因外因论来解释，认为陈独秀必须对大革命失败负主要责任。其实中国共产党当时不过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必须服从和听命于苏共和共产国际，谁敢有不同意见谁就会遭殃。而且共产国际代表是参加中共高层会议的，一切重要决定都必须得到他们的点头。从这种关系看，大革命失败，共产国际不止是外因，同时也是内因。

尽管中共领导高层对大革命失败原因心知肚明，但过去公开的文件、领导人的讲话、著作，

都不敢捅破这一层，决不敢提苏共、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有错误、有责任，更不用说要负主要责任了，尤其在共产国际解散和苏共 20 大以前。陈独秀只能长期充当苏共和共产国际的替罪羊。

三、是开除陈独秀出党？主要是中国共产党，还是苏共和共产国际？

不错，开除陈独秀出党的决议是中共中央做的。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决议只不过是按照苏共中央、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旨意、由苏共在中共的代理人“国际派”们的推动而作出的。开除陈独秀的原因主要有三条，没有一条不和苏共、斯大林、共产国际相关。

一是大革命失败主要应由谁来负责。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是陈独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一点陈独秀承认，但同时陈独秀对把全部责任推到他身上不服气，认为苏共中央（特别是斯大林和布哈林）和共产国际也有重大责任。这一点苏共和斯大林决不能容忍。当时的中共中央也不敢正视。把陈独秀开除出中国共产党，做永远的替罪羊，是苏共、斯大林洗刷他们在中国大革命失败问题上的责任的最好办法。

二是开除陈独秀是苏共党内斯大林反托洛茨基斗争的需要。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斗争的焦点之一，是对中国大革命失败责任的看法上。托洛茨基指责斯大林和布哈林要对中国大革命失败负责。陈独秀得知托洛茨基的观点后受到了鼓舞，于是更坚信了他自己的看法。苏共和斯大林不愿受到托洛茨基和陈独秀两面夹击，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苏共的党内斗争之火引燃到中共内部，苏共把托洛茨基开除出党，中共把陈独秀开除出党。

三是陈独秀在“中东路事件”问题上的立场触犯了苏联的国家利益，从而为执行苏共旨意的国际派们开除陈独秀找到了直接借口。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曾宣布沙俄对华的一切条约和特权废除，明确表示中东铁路归还中国。但 1924 年签定“中苏协定”时，苏联提出该铁路暂时“中苏共管”。1926 年苏联又决定，为了中东铁路不为帝国主义所夺，“必须将铁路的管理权保留在苏维埃政权之手”。大革命失败后，中苏关系破裂，蒋介石 1929 年指示张学良包围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几个西方国家提出“国际共管中东铁路”方案。共产国际此时做出决定，指示中

国共产党组织群众“保卫苏联”。为了响应共产国际号召,中共中央在机关报上发表一系列宣言、决议以及包括主要领导人李立三等撰写的文章,提出“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以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暴动,来消灭帝国主义国民党强盗进攻苏联的战争”。

当时已没有任何领导职务的陈独秀发现这种情况后,于1929年7月8日致函党中央,指出中东路问题的宣传要考虑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应该把矛头对准国民党的害国政策,说明若中东路引起战争,战场都在中国,战争中受直接蹂躏的自然是中国人民。他批评中央拿“拥护苏联”、“保卫苏联”、“反对进攻苏联”作为动员群众的中心口号“太教条了,太超群众了”,“只有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而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认为这样的宣传“于我们不利”。

应该说陈独秀的意见是难能可贵的。他在国家民族利益与信仰发生矛盾的时候该如何对待头脑是清醒的。他意见的出发点,是为党着想,提醒中央注意宣传策略,而且是党内写信,完全合乎组织原则。

但当时的中央却不能容忍陈独秀的意见,复信指出,陈独秀与中央的分歧“不会只是部分策略问题的讨论,而是包含了很严重的原则问题”,指责陈提“反对国民党政府对于中东路的错误政策的口号,是资产阶级左派(如改组派、第三党)的口号,走上了资产阶级观点,忘记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国际派”的代表人物王明更是发表文章指出陈的信的七大错误,上纲为“反共产国际”、“反苏”、“是‘机会主义’”。

陈独秀同中央关于中东路问题的分歧,加剧了陈独秀及拥护他的一批人与中央的对抗。这时共产国际执委发来指示,要中国共产党“应当实行无情的斗争,来反对陈独秀取消主义的主张”,“党应当铲除自己队伍内暗藏的托洛茨基派和暗藏的取消派”。这样在苏共和共产国际的严令之下,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开除陈独秀出党。

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开除陈独秀在很大程度上是奉命行事。从此以后,陈独秀就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死敌”了,“叛徒”、“汉奸”、“日本间谍”、“杀人犯”等廉价政治帽子竟可以随

便往陈独秀头上扣,只要能博得苏共和共产国际高兴。甚至1932年陈独秀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和投入监狱时,我们党的根据地机关报也幸灾乐祸地欢呼叫好。

四、怎样看待中国的托派组织?怎样看陈独秀与托派组织关系?

斯大林把托洛茨基定性为十恶不赦的敌人,开除出党并驱逐出苏联。这是苏联共产党内的事情,对错我们不必评论。但与托洛茨基观点有共鸣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反对派,被定性为“托派”的那些人是不是就是敌人呢,这是一个值得研究和商榷的问题。从中国托派的主张和斗争矛头来看,始终是反对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应该说它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一个派别,至于他们的主张不可能成功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陈独秀本人与托洛茨基毫无个人接触。他与从苏联回来的那批支持托洛茨基的留学生搞在一起,主要是因为他赞同托洛茨基对中国大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即认为斯大林和布哈林也有责任。陈独秀虽然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即“中国托派组织”)的总书记,主要是那些人利用他的影响力。陈本人在政治主张上与那些极“左”派并不一致,不久他被托派开除就是证明。

陈独秀等人在党内另立派别,当然为党的纪律所不容。但他之所以走到那一步,与苏共、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领导在大革命失败后对陈独秀没有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有直接关系。那种把一切错误都归咎于陈独秀,采取孤立、批判、打击、剥夺他在党内言论权利的方针,只能把犯错误的人往对立的方向推。

五、怎样看待党的领袖人物们关于陈独秀问题的言论和态度。

要大幅度调整对陈独秀的功过评价和纠正对其不公正的对待,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如何历史地看待党的领袖人物们对陈独秀问题的言论和态度。

大革命失败后到陈独秀被开除党籍期间,党内批判陈独秀调门最高、最无情的当然是王明,其次是李立三、博古,连陈独秀的学生蔡和森、瞿秋白也骂陈独秀是“机会主义”、甚至是“法西斯”。当时担任中央组织部长的周恩来,是开除陈独秀出党决议的起草人,当然也是支持开除陈独

“延安一代”和“红岩一代”的心路历程

——兼说他们的“两头真”

。 穆广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国统区参加革命的知识青年,现在多人已辞世,活着的都是耄耋之年,正在走完历史舞台的最后几步。那么,现在来谈论他们当年参加革命的价值,还有什么意义?

正确地看待历史,是解读现在、面向未来的钥匙。

有些论者把那些知识青年称作“延安一代”和“红岩一代”。这是不确切的称呼,为了叙述的方便,姑且借用之。所谓“延安一代”,大约是指“一二·九”运动后奔向延安的那批知识青年,不包括经历长征的红军和此前到延安的老共产党员、左翼人士。所谓“红岩一代”(“解放一代”),大约是个世纪40年代,在中共南方局(重庆红岩村是其驻地)指导下参加爱国民主运动的那一代知识青年。二者有共同性,都投向共产党,都参加抗日救亡和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革命斗争。但也有不同特点。去延安的青年,开始的出发点是参加抗日斗争,并怀有“延安是自由民主的圣地”的向往。他们在延安学习了些马列主义,经历了整风和抢救运动,有较强的组织性纪律性,接受

了“改造”,其中一些人不同程度地成为党的“驯服工具”。而“红岩一代”没有那种经历,保有较多的自由民主思想,除少数外,对马列主义所知较少,他们生活在国民党政权的黑暗统治下,不但有抗日救亡的强烈要求,还具有更鲜明的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色彩。他们构成了中共地下党及其周围的进步组织的主体。这两个“一代”,并非截然划分。参加“一二·九”运动的许多进步青年,也有留在国统区的,特别是在“皖南事变”后,去延安之路被封锁,只能在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去延安的,也有又被派回到国统区,成为地下党。反之,在国统区参加地下党及其领导的秘密组织的,也有的后来到了延安。

我不曾到过延安,不能对所谓“延安一代”做恰当的评述。“一二·九”运动时,我还是小学生,什么都不懂,在老师的带领下参加了抗日救亡、反对“华北自治”的游行示威。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百年来中国贫弱,国难频仍,受列强欺凌的历史。“七七事变”后,大片国土沦丧,大批学生辗转流亡。这些流亡学生(我也在其中)和在“大

秀出党的。毛泽东当时不在党的最高层,直接批判陈独秀的言论比较少见。持不同意见的同志意见不可能得到声张。当时党内高层似乎在对待陈独秀问题上态度很一致。但这种“一致”能不能证明当时中央的决定和领导人们的态度就完全正确、不容置疑呢?

领导层的“一致”,主要是由当时的历史大背景注定的。批判和开除陈独秀并不是中共中央独立自主进行的,而是按照苏共中央、斯大林和他们的代理人共产国际的旨意进行的。当时党的高层领导的绝大部分成员都是盲信、紧跟苏共中央

和共产国际的“国际派”,他们只能顺从,即使有不同看法也不敢坚持,因为他们的政治命运掌握在苏共和共产国际手里。

今天我们重新审视陈独秀问题时,不能以当时领导人们的是非为是非,那是不可能重新评价陈独秀的。试想,如果以领导人们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言论作为判别是非的标准,那么历史上的许多冤假错案,包括建国后和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重大冤假错案能够平反昭雪吗?■

(作者为新华社原副总编)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后方”读书的青年,都满怀抗日救国的激情,寻找救国之路。在学校读书期间,他们不满足于课本上的知识,读了许多课外书,从鲁迅、茅盾、巴金……到高尔基、托尔斯泰、奥斯特洛夫斯基……那不只是汲取文学的营养,更是探求中国贫弱之源,救国之路。正是那个时代,各种救国济世学说,包括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共产主义)等等,已经在中国某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当中传播了。知识界还有教育救国论、实业救国论等等。为了救国,青年学子们开始从文学的殿堂走进社会科学之门。进步青年还组织了各种读书会。《大众哲学》、《社会发展简史》之类的左翼通俗读物,也进入他们的视野。当时,有地下党的存在,但是学生们的绝大多数并不知道。

他们这种抗日救亡、追求自由民主的“青春热情”是弥足珍贵的。他们面对国破家亡,专制与腐败的现实,没有一点激情、没有任何理想,是不可想象的。他们中的先进分子,以忧国忧民为荣,以改变现实为己任。他们的理想,是建立一个独立的(不受外国欺凌)、自由民主的(不受专制压迫)、和平团结的、繁荣富强的中国。这种时代的理想,只能说是对改变黑暗现实的期盼,实质上,不过是真实朴素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倾向。它并非是虚幻的空想,也说不上是对某种学说的膜拜。

他们这种理想,和中共当时所倡导的新民主主义,也就是中共的最低纲领,是吻合的、相容的。当时他们没有其他道路可供选择(包括标榜中间立场的民主党派、有影响的文化界艺术界人士,也作了这种选择)。他们这种理想,最终使他们做出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选择,其中的先进分子加入了共产党,成为地下工作者。

为了改变现实而采取行动,也可以叫做“革命”。革命并非都是暴力行动。到延安和其他根据地的青年参加了抗日战争以及以后的解放战争,是革命行动;在国统区读书的青年们,在先进分子的带动下,进行抗日救亡工作,从事爱国民主运动,也是革命行动。他们演街头活报剧、出版壁报,举行时事讨论会,进而呼吁停止内战、和平建国,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反对专制独裁等等。他们的爱国民主行动遭到阻止或镇压,就上街游行示

威。这些行动唤醒了民众的觉悟,坚定了战胜日本帝国的信心,揭露和孤立了反动的专制统治者,形成了与解放战场相配合的第二条战线,为新中国的奠基做出不可或缺的、重要的贡献。这“两个一代”无疑都是真诚的革命者。

他们为理想而奋斗,甚至牺牲一切,有的还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并不都像某些文学作品和宣传家们所形容的那样对共产主义学说有深刻的理解和执著的信仰。当时,他们绝大多数不曾读过马克思主义的原著,不知道共产主义学说的具体内容。如果说在抗战初期国共合作时,左翼书籍还能在一定范围内传播,到“皖南事变”之后的20世纪40年代,宣传共产主义的书和各种左翼读物都在严禁之列,买不到、看不到,课堂上老师们也不准讲。谁个持有或者读这些书,若被发现是要坐牢,甚至杀头的。在学校里,国民党派去的特务严密监视着学生的言行。从那一代知识青年走过的道路看,他们追随共产党,并非是先被灌输了马列主义的理论,之后才参加革命,而是要求变革现实的热情和理想,促使他们探寻救国图强之路,他们从一些社会科学的通俗读物去试解社会现象,从斯诺的《西行漫记》等读物来偷窥延安的共产党,从《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之类的小册子和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来认知共产党的现行政策。他们亲历的现实和艰难探索的结果,接受并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是他们合乎逻辑的选择,也是唯一的选择。

他们大量读马列主义的书,多是1949年以后的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多是在1949年以后作为学习任务或“思想改造”过程中才读了一些,而且也不是真正读懂了的。此前,在国统区的进步青年心目中,苏联不过是一个美好的幻影,“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他们知道斯大林的暴政,是1956年苏共20大以后才揭露出来的;普列汉诺夫批判列宁暴力主义、主张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遗言,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对他们早年的共产主义学说的修正,都是在20世纪90年代或者更晚些时候,才见诸于中国学界。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是20世纪末才得以验证的。而且这些历史的真实,长期以来是被封闭的。正因为此,直到本世纪初读到谢韬《民主

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这样的宏文,才使许多人有醍醐灌顶之感。当这些真相大白于世时,那一代知识分子已是耄耋之年。同样,那一代青年曾把中共的解放区看做“自由民主的天堂”,对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国、实行自由民主,建立联合政府、反对一党专政等诺言是深信不疑的(事实上党的领导高层中也确实不乏认真奉行这些政策的智者)。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认识,也只是在党取得政权以后,而不是以前;是在亲历了历次政治运动之后,中国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下的老百姓遭受了许多苦难之后,而不是这一切发生以前。而这时,他们已经垂垂老矣。

现在,了解了苏联和中国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后果的人们,回头来说那一代青年人是“愚昧无知”,也不为过。但是,那些青年们对无从接触到的东西所表现的“无知”,对后来才发生或被验证的东西不能“预见”,是时代的局限。如果把今天对真相洞如观火的贤者们,放到那个封闭的时代,恐怕也会做出和那一代人同样的选择。

这是时代的“错位”。有了时代的错位,才发生对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评价的“错位”。因此,我和我们那一代许多老友们对参加当时的爱国民主运动,参加共产党,采取“无悔”的态度。抗日救亡、反对独裁统治,没有错,不需悔;而且那是他们的可贵的“真”,是他们人生起跑时的“那一头的真”,是为救国图强的知识分子的真诚的革命行为。他们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是不图名位、不图私利。在和江竹筠先后牺牲在渣滓洞的烈士们中,有我们的同学和战友,很难说他们都是为“虚幻的共产学说”而赴刑就义的。

不幸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断,出现了个人迷信的年代,个人独断的年代。众多的党员们(包括我在内)成为“迷失的一群”。特别是许多执著于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折腾,遭受残酷的迫害和折磨,以至人性被异化和扭曲,成为盲目的崇拜者、“驯服工具”。其中既有在政治暴力下违心的顺从,也有在神明的光环下承认思想要改造的自惭。这不止是知识分子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

除了个别先知者外,大多数人直到文化大革

命结束,才开始对这场悲剧进行反思。从个别人个别事件的反思、局部的反思,逐渐发展成为大规模的、全局的反思。从十年文革追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从取得政权之时追溯到延安时代、红军时代,从中国党到苏联党,从毛泽东到列宁、斯大林,这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大量的亲历者们的追述和回忆,改革开放以来海内外提供的官方和民间史料,不仅为这些反思提供了最丰富的实证,而且使这些反思升华为科学的结论,其中一条重要的结论是,暴力革命及其后的阶级专政、领袖专政,是错误理论和政策的核心。他们得出的广泛的共识,是回归到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走民主社会主义之路,宪政之路。他们执著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个人自由、人道主义精神和资本主义将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等正确的判断,以及他们晚年对早期所主张的暴力革命理论的修正。参与这场反思的,主要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起着领导作用的是李锐、李慎之、胡绩伟、李普、谢韬等一大批老共产党员。在这场反思中,原来为抗日救亡、追求民主自由、反对独裁专制而奋斗的那批知识分子,也就是被称为“延安一代”、“红岩一代”的一些人,从迷失中找回真实的自己;有条件的,又在为争取自由民主而呐喊了。这是他们征途末端的“另一头的真”。尽管他们无权无势,人微言轻,而且正在谢幕人生,在整个政治改革和伦理重塑的历史进程中,不过是长途接力中的一代接力棒。但这是无可代替的一棒。因为他们所经历的大半个世纪,是中华民族百年史中最复杂、最多难、最丰富的一段。他们从血和泪中反思,总结出的经验教训,是可贵的,是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史鉴。没有这些苦难历史的回忆、记述、反思,探索,人们将忘记历史,过去走过的弯路、痛苦和灾难,就可能重复。有些人不总是要人们淡忘历史、把记述那段历史的文字列为“敏感禁区”吗?而走向谢幕的那一代知识分子,却不计个人得失,顶住压力,勇敢地讲出些真话。他们,这些被称作“两头真”的人,正在真诚地做些力所能及的、别人所不能做的事。

这就是探索这段历史的真实价值。■

(作者为新华社原副总编)

(责任编辑 杨继绳)

1956 年的汉阳一中事件

。 朱 岩

1957 年 4 月，湖北省汉阳县第一中学青年教师李穗，在给初一（4）班上课时，批评有些同学不专心学习，她透露了这样一个信息：“我们全校 1001 名应届毕业生，今年能升入高中的指标只有 50 个，要发奋学习啊，不然到时耽误一生，后悔莫及！”本来是恨铁不成钢，但却无意中点燃了导火索。下课后，该班学生纷纷向初三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传达这一内容。听说此事后，全校九个毕业班顿时都像炸开了锅，学生们走出教室，涌向操场，群情激愤，高呼口号，要求校长当面回答，当时校长不在学校。学生们怒火难平，马上写出标语并走上街头，要求教育局做答复。教育局有关领导没有做出明确答复，学生们又涌到县政府门口，要求县长回话，听说县长不在，又朝县委大院涌去。口号声、怒吼声引来更多人旁观并加入游行队伍。

当时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已经扩大，生活资料供应被计划卡得很死，出现很多缺口和不足，群众意见不断滋长。有少数人认为，共产党当年靠农民闹革命才打下的江山，进城之后制订的政策却限制农民，造成了今天的城乡差别。实际生活中农民受歧视的现象也确实存在着。就学校招生来说，城市招生比例要远远高于农村，而当时湖北省 95% 的招生指标分配给了武汉市和少数几个专区直属市，县以下的地区只给了 5% 的招生指标。该政策下达后，意味着大多数农民的孩子永无跳出“农门”之日，只能在田埂上守一辈子。

4 月 13 日上午，又有几百名学生列队来到县政府，要求澄清事实，县主管领导指出，招生指标县里无权更改，要更改只能经过专区和省里。学生代表于是拉住县长韩茂林，要他一同去省里反映情况，韩茂林无奈，只好同往。当学生们押着县长走出大门时，被一些县政府干部截了下来。在扭打中县政府调来警察，扣留了几名学生。这

引起了学生们更大的愤怒，他们开始向县政府院里扔砖头，并且高呼口号：“反对学生运动没有好下场”。县一中副校长王建国担心学生把事闹大不好收拾，就带着部分教师，一面劝阻学生，一面通知学生家长来校帮助做工作。得知学生被扣押后，王建国立即赶到县政府交涉，要求释放学生，由他带回去教育，防止事态扩大，但却遭到县政府的拒绝，王建国不得已只好离开。不料又聚集了几百名学生，当时就把县政府大院的围墙推倒了。这时，县政府工作人员打电话给几个工厂，要工人前来保卫县政府。几百名工人赶来后，事态得到控制，扣押的学生得以释放，其他学生自动散去了。学生们刚一回校，就被赶来的家长接走，风波也就此平息。

本来已风平浪静。然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有人把这起事件政治化了。县长韩茂林在向孝感地委和政府做汇报时，称这是一起“反革命事件”。很快，地委和政府抽调了近百名干部组成了调查团，进驻汉阳县一中。按照已定好的调子，由调查团寻找幕后指挥，也就是这场“政治暴乱”的幕后策划人，发动了一场人人自危、个个难保的揭发斗争。调查团责令师生人人写交代，个个写检讨，企图按图索骥，找出“反革命分子”的罪证。

很快，斗争的矛头对准了当时要求释放学生的副校长王建国身上，有关人员用“阶级分析论”一分析，觉得王建国应该是策划暴乱的“反革命头子”。王建国当年 32 岁，解放初从湖北革大毕业后分配到汉阳县工作，1952 年任一中副校长，家庭出身富农，父亲参加过国民党的“清乡团”。他本人曾申请加入共产党，但因家庭问题未获批准。就凭这些情况，要置他于死地毫无困难。当时县一中的校长兼党支部书记韩建勋是个土改干部，被教师们认作是不懂教育的外行，教师们任何事都主动向王副校长请示，这让韩建勋大为不

快,他提供了王建国的大量所谓“问题”,并开展了批判王建国并肃清其影响的斗争。此外,还牵连到一大批平日与王建国有往来的人。

语文教研组长钟毓文平时有爱眨眼的习惯,在批斗王建国的会上也一个劲儿眨眼,韩建勋立刻向调查团汇报“此人向王建国使眼色传递消息”,将其隔离审查。调查团不仅大抓“同伙”,还要搜出“后台”,他们无限上纲上线,觉得越闹越大才好,才越有成绩,非要搞出一个“中国的‘匈牙利事件’”不可。

民盟成员杨焕尧曾来过汉阳一中,联系发展民盟成员的事,这一重要线索让调查团兴奋不已。他们马上将其与当时民盟中央刚刚揪出的“大右派”硬挂上钩,并且又与湖北省民盟主委马哲民(已被打成右派)也挂上了钩。于是,从中央到地方直到县里,一条完整的“反革命黑线”显示出来了。

经过这番“苦战”,一起“匈牙利事件”式的“反革命政治暴乱”就被人为地捏造出来了。汉阳县一中发生的学生闹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极为罕见的反革命事件,是国民党残余势力精心策划的地方性夺权斗争的表现,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

王建国、杨焕尧、钟毓文纵有千张嘴也说不清,这三人立即被判处死刑。胡平轩、邹振钜、胡斌等9位教师和一名学生分别被判处2至15年徒刑,“散布谣言”的李穗等三人被送去劳动教养,3名教师被定为“坏分子”,11名教师和10名县直机关干部受到各类处分,33名学生被开除学籍和团籍。这样,这起人为制造的“中国‘匈牙利事件’”,以40多人的生命和青春时光丧失为代价而告终。调查团也满载而归。

在真相不为人知的情况下,紧接着又来了一连串歌功颂德式的大宣传。一时间,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大小报纸和广播电台,连篇累牍地宣传汉阳县一中的这起“匈牙利事件”以破产而告终。台湾的国民党宣传机器也大肆配合,他们称王建国等人是“反共义士”,甚至还为他们开了追悼会。后来美国青年代表团、匈牙利访华代表团、路透社记者也都慕名而至,争先访问汉阳县一中。而那些假案制造者当然早就编好了说明词,吹嘘自己的“辉煌成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各方面的拨乱反正工作势不可挡,发生在汉阳县一中的这起事件自然地引起了人们的质疑。幸存的受害者胡斌、赵迪生先后就此事向党中央上书89封,尽陈冤情及事实真相。女教师李穗也四下奔走,长年呼吁解决历史冤案。在时任湖北省委政法委书记的张思卿同志的主持下,此案的重审报告上报给了中央,冤案终于得以昭雪。1985年1月,湖北省委报请中央批准为当年“汉阳一中事件”彻底平反,压在胡斌等人头上将近30年的这顶沉重帽子才被摘了下来。虽然他们的青春年华已逝,但多年苦难毕竟熬到了头,而当年无端被判死刑的王建国等三人,只能是永远含恨九泉。■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11年第7期目录

红色记忆	一本书,一个决议,一个思想 新中国建党纪念活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朵奇葩	王翠 陈金龙 张量
书屋品茗	学问之路——从《容斋随笔》谈起 他乡遇知音 答“文化史上的一大谜案” 鲁迅小说注记 公者千古 私者一时	邹金灿 姚契 李镛 顾农 刘春贤
人物春秋	我所知道的李铁铮教授 耆宿硕彦周退密 陈寅恪的红豆缘 杨树达与胡适的初次交锋 胡适的师道	洪其庚 肖跃华 黄全彦 朱发建 王士俊
史识佚篇	桐城方氏:中国文化世家的绝唱 以“王”僭“帝”的秦汉秘史(上) 卜式的慈善人生 秦淮河畔赋沧桑	陶善才 方宁胜 张勇 张远山 罗维 李厚光
说长论短	都是《魔崇》惹的祸 曾、左交恶为公不为私 李绅的为官与为人	陈漱渝 魏羲之 陶易
灯下随笔	1982年 李谷一在桂林 代沟与对话 名人后裔有名人 “不弃旧诗爱新诗”	李侃 翟大炳 刘法绥 胡克庆
流年碎影	禹之谟办工厂二三事 难忘的曹大哥	刘磊 黎维新
域外传真	医生拉柏雷	余凤高

邮发代号:42-150 月刊 每月6日出版 定价:6.00元
地址:长沙市韶山北路443号《书屋》杂志 邮编:410007
电话:0731-85791300 85486812 传真:0731-85790197
邮箱:nlh5314@263.net

李锐的坐牢心得

。韩磊

李锐一生大起大落,跌宕起伏,可谓浓墨重彩、精彩绚烂。从42岁开始,他倒霉了整整二十年,其中包括秦城监狱的单间八年。

2010年底的一天,笔者在一次聚餐时,有幸亲耳聆听了李锐讲他自己如何在八年单调乏味的牢狱生涯中“寻找快活”、锻炼身心的精彩故事,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

那次午餐是在建外大街一家上海餐馆进行的,参加聚餐的有李锐、何方、张思之、邵燕祥、蒋彦永、章诒和等十余人,其中李锐年纪最大,为94岁。

正式开餐之前,大家在闲聊的时候,齐夸李锐的身体好。李锐说:“我这三十年,身体不错,老伴有很大的功劳。我给老伴写过一首诗,说她是护士、医生兼政委。除了她的功劳之外,我自己有什么名堂呢?今天结合自己的坐牢经历,给大家贡献一点。”

1967年11月11日,李锐从“流放地”安徽磨子潭被“请”上一辆吉普车来到合肥,然后被一架专机送到北京,直接投入中国级别最高的监狱——秦城监狱,关在一间约三十多平方米的单间牢房里。(后来,秦城监狱的牢房不够用,李锐们的单间被隔成了两间,并新盖了单间牢房。)在秦城,李锐度过了八年单牢生活。

牢房中,除一张矮木板床外,没有任何物件,被褥很薄,且没有枕头。李锐好不容易攒下一些手纸当枕头,都被查房的没收了。没办法,他只好把鞋脱下来当枕头。

狱中规定夜间睡觉必须面朝门上的哨兵观察孔,因此整夜不准翻身,不得仰睡。碰到看守故意刁难,还会有新的花招,比如冬天胳膊要放在被子外面之类。

最可恶的是,狱方纵容看守对犯人进行各种形式的人身侮辱和折磨。李锐经历过的就有:经

常无缘无故被罚站半天,动辄训斥辱骂,乃至被叫到小窗口往脸上吐唾沫,或者命令把手臂伸出窗口锤打。有一天早晨,李锐把手伸出窗口取稀饭,看守故意把滚烫的稀饭倒在他的手上,以致烫伤。

关了不到一年,通过墙上那个长条窄窗户,李锐看见外面有起重机在施工,他就知道还在盖房子,于是开始作长期打算。

李锐说,秦城监狱是上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命令盖的,用的苏联图纸。原来关的主要是国民党战犯,因“胡风事件”入狱的谢韬也关在秦城,给国民党战犯上过课。文革一开始,这些昔日的“敌人”都搬走了,改关李锐这些被判了“死刑”的自己人。如“六十一人”案中的薄一波、安子文,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刘仁以及彭真、陆定一等。李锐后来组织编中共组织史资料时查清:文革期间,秦城共关了502人,司局级以上的干部有一半左右,死在里面的近三十人,被打伤致残二十余人,得精神病的近六十人。

如闫宝航1968年被整死的,他的儿子闫明复1968年关进秦城,不知道父亲已死在里面了。北京市委书记刘仁一直戴着手铐,吃饭都不自由,最后铐死在里面。闫明复同李锐谈过,由于单间和各种刑审,他也得过精神分裂症。和李锐同住一楼的卫生部长崔月犁说,他在秦城也得了精神病。李锐在秦城经常听到两种呼喊声:一种是显然是精神病者的叫喊,有整天喊“毛主席万岁”的,也有整天大声骂娘的。另一种是受不了侮辱痛骂看守的,但接下来就会听见有人开锁进房,痛打叫骂者,于是又响起被打犯人的惨叫。

最后几年,陆定一关在李锐的隔壁房间,他们两人在延安《解放日报》一个窑洞工作过,李锐听见他天天大喊大叫:“毛主席啊,我什么事也没有啊!”放风的时候,就唱《苏武牧羊》。李锐说,

他当时真怕陆定一得精神病。

但幸运的是,八年关押期间,由于问题简单,刑讯和逼供等李锐都没有受过。

他说:“人在倒霉的时候,最不愉快的时候,要找一点快活。”

李锐倒霉了二十年,北大荒劳改几乎饿死,磨子潭流放劳动,最后是秦城监狱单间八年。由于读过《马恩通信集》,知道单间关押是西方死刑以外最重的刑罚。他在延安时知道,王若飞在绥远被单间关押了六年,出狱以后,有人送他一块怀表,他竟叫“锅盖”。

李锐知道要长期住下去了,怎么办?决不能痴呆、失语,于是做“大脑体操”——背旧诗,自己做诗回顾一生。

李锐举了一个例子:从庐山下来(指1959年庐山会议倒霉一事)以后,水电部批斗了他几个月,最后打了一个“李锐反党集团”。批斗时,他们知道李锐文章写得多,就逼问他“还放过什么毒?”李锐就将自己以前写过的包括延安时的所有文章都交上去了。李锐为此事吟过一首七律,其中有上句“平生文字难成狱”,白天很久没对上,晚上,灵感乍现,李锐一下子对出了下句——“自我批评总过头”。

“一下子对出来了,你看,对仗很工啊,平仄也很好,高兴到了极点,结果失眠了,晚上睡不着啦!”旧事重提,李锐一点都不像是在讲他的苦难史,倒好像是在叙说自己的光荣。

最后三年,牢中可以看书了,李锐为此作过一对联句:“只要有书来做伴,自然无处不安家”,也快活了好几天。

此时,章诒和插话说:“很有点聂绀弩的味道!”

秦城监狱坐落在京北燕山脚下,因为位于昌平秦城村而得名。李锐说:“那个地方空气好极了,我每天就在房间里做气功,跑步,用手指在空中练习书法。”气功和跑步,看守都明白,但李锐每天挥手在空中“乱划”,看守无论如何都看不明白,只能用奇怪的眼神看着他,不知道他在搞什么名堂。

李锐在狱中还坚持冬天用冷水擦身子,没有水游泳,他就旱游,锻炼两臂和胸肌。他说:“秦城监狱八年,当然很痛苦,但我苦中作乐,好些时候

也过得很快活,既锻炼了身体,又锻炼了大脑。”

《榻上吟》是李锐出秦城前不久所做的一首长诗,全面总结了单间八年的苦难。摘要如下:年年落叶夜敲窗,屈指幽居八度霜。旦夕所亲唯一榻,问君遣日有何方?流水不腐枢不蠹,依旧惜阴无事忙。……日日读书穷究理,朝朝看报不厌详。……熟读诗词知格律,时翻经典见海洋……夏来跑步治哮喘,冬仍冷浴免风伤。……斗室恰如面壁窟,方丈堪为健体房。……人间寂寞亦如是,岁月蹉跎又何妨。久病安危账懒算,逢时否泰运全忘。无忧无虑自不惑,患得患失难免狂。

1972年以后,由于刘建章的家属告状,秦城囚犯的待遇有所改善,可以有限制地看书了。负责审问李锐的人,从他北京的旧居中找了《马列选集》等十来本给他。于是有了后来极富传奇色彩的一件事:八年牢狱之灾,李锐在狱中最大的收获还不是前述那些事,而是写出了一部古今中外可能绝无仅有的奇书!

1973年的一天,李锐在房内跑步不慎摔倒,手腕碰破了,护士给了他一瓶龙胆紫药水和几根棉签。于是,李锐突发奇想:此可作奇墨怪毫也!从此,他的狱中生涯掀开了新的篇章。

他每天靠墙坐在矮床上,面对哨兵的监视孔,越发规矩地捧着原本的《马列选集》读,并遮住哨兵的视线,用棉签蘸着紫药水,把他几年来吟得的一首首“铁窗诗作”,写在两本《马列选集》的空白处。就这样,1975年5月,58岁的李锐不仅活着走出了秦城监狱,而且还带着他在狱中用棉签蘸着紫药水写成的四五百首旧体诗词。这就是用紫药水和木棉签“奇毫怪墨”写成的《龙胆紫集》。

听李锐讲到此处,邵燕祥插话说:“李锐同志,你应该写一本《坐牢指南》,肯定能火。”邵燕祥的话引来大家的一片笑声。

“这是我贡献给大家的一点经验:无论何时何地,无论什么情况下,人都要过得痛快、心安理得。再怎么倒霉,老子不怕!就像现在一样,我已经94岁了。有人喜欢我,有人讨厌我,这很正常。但是,不管他们怎么讨厌我,控制我,老子还是过得很痛快!”李锐用这样一句话结束了他的精彩“演讲”。

此时,餐桌前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作者为《中国水电报》记者)

齐燕铭看闹剧

。 马 林



齐燕铭(1907~1978)

1964年末到1965年初,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下达了。批示严厉指责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是“被古人死人统治着,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问题如此严重,中宣部急忙派出了以周扬、刘白羽为领导的工作组进驻文化部,展开了一场整风运动。运动首当其冲的是主持全面工作的齐燕铭和主管电影工作的夏衍、陈荒煤。电影方面的阵式先头已经摆开。指夏衍为电影界的“祖师爷”、“老头子”,陈荒煤是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急先锋。《早春二月》、《北国江南》是代表性的毒草片。戏剧方面最先提出批判的一出是所谓鬼戏《李慧娘》,另一出就是《谢瑶环》。

《谢瑶环》是田汉先生根据碗碗腔《女巡按》改编的新编历史剧目,说的是唐朝女官谢瑶环奉旨巡使江南,因主持正义为民请命,得罪了酷吏来俊臣、权贵武则天的侄儿武三思,遭对手陷害造成冤狱,宁死不屈的故事。不知哪位仁兄,出于何种目的,向工作组提出了一个建议,说《谢瑶

环》是新编历史剧目,看过的人并不普遍,再加上这出戏影射现实的手法曲折隐蔽,所以应组织大家再看一遍这出戏。演出应是炮制毒草的原班人马,原原本本原汁原味,不得有任何修改。说非如此,不足以表现毒草炮制者的悔改诚意,不足以推动广大群众对毒草戏批判的深入。

建议当即被工作组接受了,很快就组织了这场演出。地点选在东单青年艺术剧院剧场,观众是文化部机关全体干部。彼时本人在电影局工作,正为《北国江南》遭康生点名批判弄得焦头烂额,好在跟戏剧隔行可以不参加正面批判,但大流是要跟随的。文化部坐落在朝内大街面对着菜市场的一座灰楼里。从文化部到东单骑自行车或乘公交车不过20分钟的路程。那天给我留下的印象是谁都不说话。路上不说话,进入剧场也不说话,剧场里,往日演出前的喧闹嘈杂、交头接耳的气氛不见了,大家都默默地坐着。过了一会儿齐燕铭来了,他是主管戏剧艺术的部长,是被批判的主要对象。那天他仍戴着一副黑边眼镜,就坐在我前面几排。没人跟他打招呼,他也不亢不卑跟平常没有什么两样。

锣鼓声起,大幕拉开,演出开始了。

应当怎样来形容这场特殊的演出呢?说它空前绝后,绝无仅有,怕是合适的。我推想,自从人间有戏剧,古今中外,各类演出年年岁岁,日日月月没有中断过。但像这样的为批判而演出,把一出戏的演出和纠正文艺方向、巩固国家政权联系起来的,实在闻所未闻。

那天,田汉并未到场,虽有田汉、齐燕铭在前头顶着,最难受的还是演员。我们都知道演员演戏,首先讲究要入戏,要有真情实感。可是那时候演员们一个个都已被弄得灰头土脸,又都知道下了台以后等待着他们的是不讲情面的批判,哪里

还有精气神来塑造舞台形象呢？那么，可否采取敷衍马虎的态度呢？谁敢？在“乃武升天，斯文扫地”的大环境下，果真敢那样做，演员们的罪行恐怕就要从炮制毒草升格为公然对抗革命路线的现行问题了。于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绝对是一场既平淡寡味，毫无激情，又有板有眼，一丝不苟的一场演出。不管时间过了多久，我永远也忘不了杜近芳先生脸上流露出的那无助、无告、无奈的神情和黯然的目光，像待援的孩童、待屠的羔羊。

演出结束了，大幕徐徐落下，没有掌声、没有喝彩、没有谢幕，唯一的声音是观众起身时坐椅发的声响。似乎一切又归于平静。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第二天在文化部机关里，又掀起了一场戏外戏的高潮。这回戏的主角是齐燕铭。一夜之间在文化部机关和五号大院铺天盖地贴满了大字报。大字报的主题是《质问齐燕铭你要干什么？》，让《齐燕铭回答对谢瑶环是批判还是欣赏？》据大字报揭发，昨天看戏时齐燕铭的表情是：眼半睁、头微晃、口若张、手击节，全神贯注、无限欣赏。充分说明齐燕铭批判是假，欣赏是真，是明目张胆地为黑线张目，对抗两个批示。

这个揭发批判给齐燕铭出了一个天大的难题。作为当事人，他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他选择了沉默。试想，假如承认有此事，那好，紧接着你就要回答为什么？回答目的何在？可是在当时那个大环境下，实事求是，平等讨论的条件已荡然无存，面对已被发动的狂热群众，这样的问题，谁能回答得清楚。倘断然否认此事，事情会更麻烦。难道革命群众有着雪亮的眼睛，会造谣说谎冤枉你？再说，这种事齐燕铭本人有把握吗？这里我们不妨往远处扯几句。齐燕铭是蒙族，世居北京，精于国学，抗战前即任教于北京中国大学，教授文学史、戏曲史和文字学，经过“一二·九”运动的洗礼、抗日战争爆发即以大学教授身份投笔从戎，在战争年代担任过许多党政要职，到文化部之前任总理办公厅主任。他是京剧艺术



《谢瑶环》剧照

的行家里手，参加过评剧《逼上梁山》的编剧和演出，毛泽东为此还专门写信给他和另一位同志表达祝贺和希望。此外，他还有一付好嗓子，据说反串唱京剧三花脸的角色堪称一绝。在戏曲改革上，他主张现代戏、新编历史戏和传统戏三并举。这个三并举方针虽被江青诬称反对革命样板戏，却正好与《谢瑶环》的出现相契合。这样看来，演出那天，当胡琴声响起，演唱者又是名家、听着听着他一时忘却了时空条件，流露出某些不合时宜的表情动作而不自觉，也不是不可能的。不是有个词叫“情不自禁”嘛！

好在那时还处在“文革”预演期，斗争还不像后来那般的凶残无礼，刀刀见血，一定要被批斗者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三反分子方肯罢休。因而这场闹剧折腾了一阵子，也就偃旗息鼓告一段落了。后来，齐燕铭被下放任济南市副市长，陈荒煤下放任重庆市副市长，夏衍被挂了起来。俟“文革”正式兴起文化部这次整风被称做假整风。

行文至此，这段“文革”中的小插曲本该结束了。我又猛然想起那段时间，我曾多次听齐燕铭做关于文化工作方针政策方面的报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句口号一再被提到。与众不同的是齐燕铭口中的百家，一定要读成 bō（“擘”字的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说时慢条斯理，京腔京韵、字正腔圆，每个字都咬得十分清楚，直达听众的耳底。

燕铭同志蒙冤离开这个纷扰的世界已经20多年了。他不论做多大的官，骨子里仍是一介书生，一个有风骨的文化人。他身上流淌着、传承着中国历代优秀知识分子的血脉，让人亲近，让人怀念。

默念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回忆着他的音容笑貌，我不止一次地笑出了声，眼睛却是湿润的。

（作者为北京电影制片厂原总负责人）

崔万秋不是文化特务

。 毛德传

崔万秋(1904~1990)是山东观城人,在聊城、济南读中学。1924年夏,崔高中毕业,决心东渡留学日本。

一

离国前,崔万秋特赴中西文化集萃处上海,欲呼吸欧美风云,结识贤才英俊。抵大上海后,先拜访中学时期经常通信的戏剧家田汉和时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学生杂志》的杨贤江。田汉是创造社成员、左翼健将。杨贤江是早期共产党人,马列宣传家。田汉邀崔寓其家中,并由田汉介绍,崔认识了张闻天和左舜生、陈启天诸人。九月初,崔万秋自青岛乘轮船抵日本,进东京帝国大学,以后,又入广岛大学研修。

崔在日本和田汉、杨贤江及新交左、陈不断通信交流,也将创作《自由神》等及译述寄回国内在《真善美》等多家报刊发表。杨贤江常将中共所办《向导》、《中国青年》邮送崔万秋,左、陈也将所创办的《醒狮》赠崔。共产主义与国家主义思想尖锐斗争,崔万秋思想未认同马列而倾向国家主义,和《醒狮》主编曾琦建立友谊。由左舜生陈启天介绍,崔加入了中国青年党。

崔万秋在扶桑十载,足迹遍日本列岛,结识日本文艺界及广泛阶层人士。他对明治维新打破德川幕府闭关锁国,汲取欧美先进科技文化政治理念,发展工商业求民富国强研究很深。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对华野心更至为警惕。

二

1933年,崔万秋离日回国即到上海。应邀在曾虚白(《孽海花》作者东亚病夫即曾朴之子)主持的《大晚报》任副刊部主任,主编该报文艺副刊

《火炬》及影剧副刊《剪影》,活跃于大上海文艺影剧圈,尤和田汉、洪深交往密切。崔又撰小说《群莺乱飞》于该报连载。

1937年卢沟桥、八一三炮声震天,崔万秋毅然告别上海租界优裕生活,奔大后方投身抗日救亡。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博士延揽崔在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处长董兼,后曾虚白)任第三科即对敌宣传科科长。崔万秋深悉日本情形,通过对扶桑文艺历史的研究,对日本社会及大和民族特性,了解很深,对日宣传心战有针对性活泼有力。崔万秋收集日本的广播编发内参,送蒋介石及各院部会及军委会首长参阅。他所主持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之声》(THE VOICE OF CHINA)对日广播,获内外好评。

在主持对敌宣传科同时,崔在重庆还兼任成舍我主办的《世界日报》副刊《明珠》主编,还以台儿庄会战和保卫大武汉为背景,创作了小说《第二年代》。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抗日战争及二战胜利结束。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奉命主持京沪受降,负责解除日军武装及遣返日俘和日本侨民。汤邀崔万秋飞上海,委为少将高级参议,襄助受降。崔主要负责督导接收日本在沪的文化事业机构,创办日文《改造日报》对日俘日侨进行教育宣抚,直到日俘官兵和男女老少日侨遣返完成。

1948年,崔万秋和左舜生在上海创办了《中华日报》,崔任副社长兼总编辑。崔所著长篇小说《重庆睡美人》在该报连载,轰动一时。同时,崔兼任成舍我创办的上海《立报》的副刊主编。

三

同年,蒋介石“开国大行宪”青年党陈启天入阁任经济部部长。崔万秋受推荐赴日本,任中国

驻日本代表团(团长朱世明将军)商务代表。

时值日本战败后经济凋敝,中国对日贸易,日方缺付汇能力,商贸进出口多采易货方式,华商经营困难。崔万秋是日本通,多方奔走协调排难,予在日公私华商极大帮助;日方也表示满意。

1952年4月,日蒋和约签订,于东京和台北互设大使馆,驻日代表团撤销。崔的老长官董显光博士出任“驻日本大使”,对崔器重,委崔万秋“政务参事”。崔万秋任此职十二年,1964年始离东京返台湾。计自1948年起,在扶桑又历十六载春秋岁月。

崔万秋熟习孔孟,又出身日本名牌大学,日文造诣为一般日本人远不及,学识渊博,文笔流畅。先后在上海沪江、复旦大学、重庆中央大学、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任教授。著有《日本废除平等条约史》、《通鉴研究》、《东京见闻录》等,翻译出版日本作家夏目漱石、武者小路实笃、井上靖、林芙美子的戏剧、小说颇多。

崔万秋1964年到台湾后,供职“外交部”,外放过驻巴西“公使”。1971年自公职退休,移居美国。1990年7月病逝于旧金山。

四

新中国成立后,祖国大陆人们很少知道崔万秋的名字。突然,在1976年10月后,神州城乡皆知“文化大特务崔万秋”。北京一文件称,抗战前江青(蓝苹)、张春桥在上海受文化大特务崔领导作恶。

实际上,抗战前在上海租界,崔已是社会名流,张春桥只是小文人,崔张并不熟识。1936年3月15日,《大晚报》副刊《火炬》发表张春桥(笔名狄克)文《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只是崔主编所编发千百篇文稿之一。那时,对鲁迅先生尚未神化,将鲁迅作为文艺思想战线尊神。鲁迅的文章,篇篇是真理。鲁迅的话一句顶几百句。文革十年中,所有报纸杂志文章,批判斗争大会发言,不厌其烦引用鲁迅语录仅次于毛泽东语录。荒唐的推断,谁批评过鲁迅必然是反革命,而被鲁迅点过名的如夏衍、阳翰笙等当然是反革命,为鲁迅在文中指为“昏蛋”,“以文坛皇帝自居”的徐懋庸,鲁迅斥为“洋场恶少”的施蛰存,解放后都受尽苦

难。

崔万秋只是认为狄克文可以发表见报,并签发二元几角稿费而已。而鲁迅于次月即4月16日发表《三月的租界》予狄克(张春桥)驳辩斥责。这在今天学术探讨,任何一名大中学生会认定正常不过。

崔万秋和江青(当时艺名蓝苹)倒是交往颇多。最早是田汉两兄弟介绍相识,称李云鹤是山东姑娘初到上海滩,崔大哥多多关照。崔见蓝苹话剧、电影、京戏皆能,又是山东同乡,也乐于提携后进。圈内人有时约蓝苹会晤或对她发动爱情攻势,在霞飞路、爱文义路喝咖啡及进舞厅,崔有时也应邀参与。崔自己写评论为江青捧场,又编发用粉丝赞誉吹捧蓝苹文稿、照片发表。抗日战争起,蓝苹到延安,崔奔大后方,两人再未见过面。

称崔万秋是文化大特务,系不实之词。崔既未参加戴笠的军统,也与二陈的中统不相干。崔连国民党党员都不是。

当大陆揭批“四人帮”时,崔的友人纷纷劝促崔向北京澄清,崔说随它去吧。后来,崔万秋写了一本《蓝苹小姐》,在香港和美国出版畅销,倒发了一笔小财。■

毛德传(离休干部)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启 事

《炎黄春秋》杂志尚有少量过期刊物零售,有需要的读者可电话咨询购买。

联系人:崔秀岭 手机:13611159388

电话(传真):010-60342528

汇款地址:北京市房山区

102488 信箱3分箱

收款人:崔秀岭 邮编:102488

本刊声明

为保护本刊和作者权益,凡转载本刊文章,请注明“转自《炎黄春秋》”。

我眼中的广西文革

○ 程郁

1968年我曾做过派仗的俘虏，那年我只有11岁。

一直期待着比我大的人来描述这段历史，然而，转眼四十年过去了，这段往事仍无人提起，忽然意识到，连我自己都到知天命之年，文革的亲历者肯定越来越少了，再不谈，这些沉重的往事必成为轻飘飘的故事。

1966年文革开始，我上小学二年级。只记得先批判“三家村”，代表我们班的小女孩怎么也爬不上那个高高的讲台。其后，校园里出现许多大字报，抓住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攻击老师。毛主席在北京接见红卫兵，我曾为报社上街卖号外。大串联时，在中学当老师的舅舅带一批学生步行上北京，大我两岁的哥哥也跟着去了，但走到湖南就坐火车回来了。哥哥没从毛主席故乡带来红色的种子，却默默地给家里带来一大把虱子，把母亲折腾了两个月。那时运动对我们来说的确是好玩的。

母亲王慕冰在《广西日报》任编辑，父亲程兴业在南宁一中任教，我家就住在报社。食堂前的大字报先提打倒报社社长，后又针对广西的第一把手韦国清，最后刘少奇的名字也被打大叉了。我回去问母亲，这样一个个打倒，最后会不会打倒毛主席？母亲大惊失色，叫我不要胡说。街上越来越闹腾，报社涌来一批批红卫兵，围成一堆堆大声辩论。某天打起来了，石头飞来飞去，有人捂着脑袋退出人群。大人们分为两派，一派叫“联指”，一派叫“四二二”（“联指”全称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四二二”全称为“广西‘四二二’革命行动指挥部”），父母最初不参加任何派别就叫逍遥派，也不怎么上班，母亲甚至学起绣花来。

武斗很快升级，报社成为焦点。最初大人们拿着钢叉和棒子，戴着工地上的安全帽，后来真枪也开始流入民间，流血事件越来越多。父母就把我们送到河池的阿姨家。1967年暑假，我在河池迎来了自己十岁的生日。暑假后，母亲曾想把

我们送到桂林避难。可是桂林也不太平，夜半醒来，我看到母亲守在窗前忧心忡忡地听着远处传来的枪声。

回到南宁，局势仍然乱腾，一伙伙人闯进报社大院，甚至闯进宿舍抢劫，逍遥派也不安全了。母亲较为接近的同事属于“四二二”一边的，为了安全，我们家就和许多人一起搬到“四二二”的据点里住了。所谓据点便是报社最高的编辑部大楼，为红卫兵占据，当时两派都办起自己的报纸。我们家和另一家合住一间办公室，睡在办公桌上，中间拉一块布帘子。没看见里面有人拿枪，外面也没有武装人员包围，据点里的人可以自由走出去，也没听说附近打死人。对面的展览馆也是著名的“四二二”据点，后来被打得稀烂，但那时我和小伙伴还在馆前的大广场学骑自行车。我们常跑到印刷车间去玩，印报纸的红卫兵举起沾满油墨的手吓唬我们。印象中，这段日子就像偶尔的野营一样有趣。

蜗居大楼的日子并不长，我们便回到自己家。后来听说两派开始谈判大联合，父母还说你们快要上学了。然而，1968年春，形势却越来越紧张。同情“四二二”的解放军六九八四部队将调走，“四二二”一派极力挽留。5月某日我跟小伙伴到教育学院去看热闹。教育学院的高坡上有几棵大榕树，其下聚集大批红卫兵，他们和一些解放军战士在交谈，流着眼泪劝他们留下。听说红卫兵晚上也守在那里，可是部队哪里是眼泪留得下来的，部队还是开走了。现在想来，由于广西军区是支持“联指”的，六九八四部队的调走使“四二二”意识到危险的逼近。

某天父亲外出，发现把守报社前后门的红卫兵换防，新来者皆来自南宁一中。父亲原任一中的教导主任，就在不久前，该校的校长被学生打死了。当时母亲出差去了，没办法联系，父亲决定立刻离开南宁。他空手溜出去，哥哥骑车送去一个菜

篮,内装几件换洗衣服,两人还像地下党一样先后出门,在火车站碰头。从火车站回来,哥哥才说出父亲逃走的事,然后伸出两手模仿老虎爪子伸在我眼前,怪声怪气地说:“哈哈,今天起你就归我管了!”第二天,通往外省的火车就全部停开了。

派仗迅速升级,许多武装人员冲进报社。报社的家属到党校躲避,不分两派都在一个大礼堂里打地铺。一天早上,在大门口发现一具尸体,旁边倒着一辆自行车,应该是被流弹打死的无辜路人,一些人只为恶作剧便把枪口对准平民。一次母亲带我上街买东西,我穿着红色短裙。回来时忽听到像放爆竹一样的“啪啪”声,清脆而零星,我们仍不紧不慢地走着。一个女人骑车从身边冲过,大叫:“小女孩还穿红裙子,说不定打你呢!”母亲拉着我的手赶紧跑到岔路上。

党校也不太平,时有武装人员闯入。一天,一群“联指”成员荷枪实弹地闯了进来,指名要抓黄真,扑了个空,他们悻悻离去后,母亲将这一消息告知黄真。第二天,“联指”的人又气势汹汹地来了,这回向母亲追问黄真的下落。黄真是母亲的同事,瘦瘦长长的,架着一副金边眼镜,看上去是典型的文弱书生。他与我母亲都不过是普通编辑,也不是“四二二”的骨干,按常理不会抓他们,但大乱之时是不循常理的。母亲感到极其危险,便托一个当地出身的同事为我们找一个较安全的避难场所,他答应到“街上”找个房子。南宁当地人都讲粤语,但自治区直属的各单位聚集着大批外省人,大院里都讲普通话,和当地人的生活相当隔绝,因而大多数外地人根本不会说本地话,称本地人聚居的老城区为“街上”。

第二天,母亲要带着我们兄妹去避难,而哥哥怎么也不肯去,母亲只能把他托给舅舅,牵着我跟人走了。那人把我们带到解放路的一处老房子,然后他就回去了。以后,母亲才知道那里根本不是什么安全地带,而是“四二二”控制的中心区,他们自称为“解放区”。但两派交火的据点离这儿较远,周围是当地市民的聚居地,从表面上看,百姓仍悠闲地过着自己的日子,因而我们还是住了下来。

在我们之前,黄真已到了那儿,我们还碰到好几个报社人。一个上海人叫陈广旭,二十多岁的样子,架着一副现在最流行的大黑框眼镜,不

苟言笑,用现代流行语说挺酷的。他刚分到报社时,曾奉命和另一个青年来管我们的暑期少年之家,因为他显得特别严肃,孩子们都敬而远之。这期间陈叔叔偶尔来,我就溜到一边去,不敢和他说话,他曾叫母亲等为广播站写稿,他们不肯,也就不提了。还有两位本地籍贯的叔叔,一位叫彭志球,另一位不记得了,他们对我们都挺亲切的。楼上住着几个中学生,一个女生常和母亲说话。一个男生常来逗我玩,他非常聪明帅气,又喜欢开玩笑,我们常玩的游戏是大变活人,我对他佩服得不得了。问他叫什么,他说:“叫我校长好了。”

几天后,这个区域就被“联指”的武装人员包围了。再过几天,两位本地的报社人留下行李都先后失踪了,那时本地人还是能混出去的。多年后彭志球说,那天他拎着一个酱油瓶,走到封锁线时被“联指”的武装人员拦住了,他用粤语说去那边打酱油,就混过去了。可见,“我是打酱油的”在哪个时代都是通用语。母亲越来越担忧,但她一看就是外地来的知识分子,还带着我,根本无法混过去,而被那些凶残的武装人员逮住凶多吉少。

在解放路住了一个多星期,某个晚上大炮响起了,楼上的学生连滚带爬地躲到我们房间,女生说:“吓死了!吓死了!”枪声也越来越激烈,越来越近。后来才知道,那就是总攻,攻击者不仅有“联指”的民兵,还有众多广西军区的正规军,炮弹都是真正的炮兵打出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106页)。我在战争小说中读到的炮声,这回亲耳听到了,果然先听到“呼呼”的呼啸声,接着传来“轰轰”的巨大爆炸声。炮弹并不只打据点,常常会落到居民区来,炸到之处很快腾起一片火光。那时南宁老城区多是解放前留下的老房子,大部为木结构,两到三层,所带骑楼使街道更为狭窄,炮火下极易着火,夜空中这里那里腾起大火。我吓得发抖,钻到母亲怀里,她能做的也只是拍拍我的背。

伤亡也出现了,楼上的女生还去献血了。母亲想给她做一些有营养的东西,却根本没有办法,就在几天前菜都没有了,只能吃一点白饭。不知谁做了一些炸油饼,大人还让给我吃,谁知炸饼的油居然是桐油,结果吃过的人都上吐下泻,我更是不断地水样腹泻。院子里的厕所只是一个坑,久已无人处理,已快要满溢,上面爬满蛆虫,

人要站在两块砖上,才不至于踩到粪水里。那天刚进厕所,忽听头上“呼”的一声似乎有炮弹飞过,我吓得一哆嗦,就把砖头踩翻了,粪水灌满了鞋子。我没有换洗的鞋子,母亲只能把我抱到屋子里,然后一个人跑到院子里冲洗鞋子,炮火似乎就从她身边呼啸而过,此景终身难忘。

母亲将湿漉漉的鞋子穿在我脚上,收拾起行李,因为听说“联指”叫“解放区”里的人快出来投降,她决心今天就带我出去。院子里她和陈广旭在商量什么,炮火又响起来了,我奔过去抱着母亲叫:“我怕!我怕!”陈广旭瞪起眼睛吼道:“小孩子吵什么!”然后听到他说:“你有孩子,先走吧。我只能上山打游击了。”后来母亲告诉我,当时她劝陈广旭也快点离开这儿。

下午,我们和黄真一起出去,先在街道两旁的民房中穿行,原来相互分隔的各家墙壁都被打通了,我跟大人爬过一个个洞口,穿过一幢幢残破的房子,根本不必问路,只要跟随居民一起走,越走人越多。不知走了多久,我们才走出房子,走到街道中央,当地居民背着行李,扶老携幼,汇成人流,街道两边密布着拿枪的人,有的人身着便衣,有的人穿着解放军制服,一些枪还上着明晃晃的刺刀。忽听一声怒喝:“放下东西!举起手来!”人们纷纷丢下手中所有的行李,将双手高举过头,母亲也迅速扔掉大包。前面一个男人还背着一个包,立刻身中一枪,他旁边的人扔掉包扶起他一声不吭往前走。母亲赶紧将我身上的小语录包也扔掉了。其间,一个解放军士兵说:“小孩不用举手。”但我仍然不敢放下手,小小年纪,我就明白:政策都是拿枪的人随心所欲制定的,我不知道前边的士兵是否还有心情仁慈。

人们如驯服的羊群般茫然地走着,虽然数百上千,但连咳嗽声都听不到,只听到杂乱的脚步声,一路上都能听到高音喇叭传来的一个刺耳女声,她反复念着同一篇文章:“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们一颗炮弹,就能打死你们一堆人。”后来读《毛泽东选集》,才知道当时反复播放的正是淮海战役中著名的《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多年以后,当我看到电影中犹太人被驱赶的画面时总是非常难受,因为太像我所经历的投降经历,一样的妇孺无助,一样的充满绝望,甚至一样的对自己的同类麻木无情。时而,守在街

边的拿枪人凶神恶煞般冲进人流,抓住某人捆起来,而人流仍静静地淌过,无人停留,甚至没人看他一眼,身后传来残忍的殴打声,人们的脚步却更快了,似乎这样才能避开厄运。穿便衣的是来自各地的“联指”骨干,他们站在路边睁大眼睛寻找认识的人,一旦认出本单位的人,就把他们揪出来。被挑出的人往往凶多吉少,战区中的虐杀根本不会有人干预。

万幸的是一路上没有人认出母亲,最后,人群被钢枪逼进第九中学。中学的操场上放着几张桌子,我们被逐一带去讯问。一个报社印刷厂的青工冲过来,一脚把母亲踹倒,然后脚踩在她背上捆人,一边捆一边恶狠狠地问:“陈广旭在哪里?”母亲说不知道,他又踢了一脚就走了。过一会母亲就被一个士兵押走了,说她是所谓重犯。

等了很久才轮到问我,问了姓名身份之后,一个女人在我身上细细地搜身。因为我拉肚子太厉害,又没法上厕所,这天母亲把一块毛巾塞在我屁股上权当尿布。那女人摸到毛巾,以为藏着什么值钱东西,厉声喝问,我觉得很丢脸,从裤子里拽出那块臭烘烘的毛巾,狠狠地丢在桌上,那女人也尴尬了。我被送到一个大教室,和当地居民关在一起,晚上只能睡在冰冷的水泥地上。一些居民对解放军士兵抱怨说,所有的行李都被抢走了,衣服也没有,士兵说明天就放你们出去了,行李搜过后会送来的。当然,最终没人领到行李。我找个角落躺下,将那条脏毛巾当做唯一的御寒物,枪炮声还清晰地传来,想着不知明天往哪儿走。

第二天一早,我把脏毛巾随便洗了洗,又用来洗脸。只见母亲跟着一个解放军来了,她指着我说:“她是我女儿。”于是我又随母亲被关到二楼的一个教室里。里面关着十几个人,不分男女,都睡在课桌上。似乎没人来讯问,大家都呆坐着,看着太阳一点点从这个窗口移到那个窗口。晚上相当凉,我们仍然没有任何被褥,母亲只能抱着我。同室一个受伤的小伙子有一条毛毯,母亲恳求他匀一角让我盖,他与他同伴却像没听见一样,头也没转过来,我拉住母亲说:“别求了,我不冷的。”

几天后,突然发大水了,然而这之前并未下大雨,当局命令转移。洪水来得极快,我们只能从二楼的一个窗户爬竹梯而下,再爬过一条捆缚课桌而成的临时浮桥,经另一幢楼才逃出。一个解

放军士兵泡在水里拉着浮桥,另有人在窗子边帮助囚犯一个个爬出。士兵比“联指”的人和蔼多了,起码我没看到他们打人,也许来自外地的士兵对派仗的牺牲者没什么偏见。后来查资料才知道,这场水灾超过1958年特大洪水的水位,而且是人为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115页。)。母亲也一直以为那是场天灾,前日我告诉她真相时,她半晌无语。

我们被押解到交通学校,被关押者多为知识分子,男女分开,也是在一间间教室里席地而卧,教室外边有一条长长的走廊,对面是一个大操场。饭还能吃饱,当然还是没有菜,并开始提供草纸之类。被俘者久未沐浴,都臭极了,还让我们洗了一次澡。我身上长了癣,解放军士兵带我到卫生室上些碘酒,刚上时舒服一些,但以后越来越严重。

有天早上,突然把我们全体赶到操场,一会儿,开进几辆敞篷卡车,车中站满荷枪实弹的“联指”武装人员,一些被五花大绑的人面朝外排在车厢两边,每人颈上挂着一块巨大的木板,上书其名字和罪名,名字上打着红叉,还故意滴上红墨水,给人以血淋淋的感觉。几个人拿着扁担或木棍,开始在我们面前打人,高音喇叭里一男一女数落着那些人的罪名,其间也放毛主席语录歌,被害者的惨叫就在音乐的背景下凄厉地传来。我吓得发抖,把脸捂在母亲的怀里,根本不敢看,而大人却不能不看,有人大叫:“抬起头来!”我感到母亲的手也在发抖。不知打了多久,终于,卡车开走,这场惨剧才得以结束。大概这就是所谓示众。听说外边还搞过“禽兽展览”,即将一些人关进铁笼,然后组织群众参观(《广西文革大事年表》,118页。),当然我没看见。

几天后,要放我出去,一个士兵骑着自行车驮着我,找到舅舅在建政路上租住的弄堂,但舅舅已回到邕江南岸的中学去了,士兵说洪水太大现在不能过邕江,我只能沮丧地跟着士兵回集中营。回来途中看到卖菜的摊贩,摸到口袋里还有几角钱,取得士兵同意后,买了一小把腌过的大头菜。我们已经近一个多月吃不到任何咸味的东西了。

当我掏出那把生大头菜时,母亲直夸我能干,她又想起难友黄真,要我给他送点去,看守居然同意了。看守士兵捏着一根军用皮带,带我穿过长长的走廊,所到之处,犯人眼中都露出恐惧,

以为小孩也来“点水”了。当时“联指”的人时来看看守所指要某人,其后便是折磨或殴打,这就是所谓“点水”。我们走到另一头的教室,正值中午,天太热,门也没关,只用一张课桌拦在门口。带我去的看守用皮带猛敲一下桌子,大吼一声:“谁是黄真?”所有的犯人都像装了弹簧一样跳起来,脸上带着难以言状的惊恐,黄真脸色蜡黄,朝门口走来。我从看守的背后闪出,一言不发,将大头菜递给他,他的脸一下子绽开一丝微笑。

不久,大水基本退去,我被允许出狱。文革前常去舅舅所在的亭子农业中学玩,先坐公交,再步行穿过一片田野,凭记忆准确地找到。舅舅正在屋里,看到我大吃一惊,劈头就问:“妈妈呢?”我没头没脑地回答:“妈妈在交通学校。”待问清我们的经历,舅舅说,前几天邕江江面上漂出许多尸体,以为我们母女完了呢。

舅舅叫我住到外婆那儿。外公在解放前是位律师,解放初还被认定为民主人士,但因母亲参加革命时自报家庭成分是地主,家里所有的人都受连累了。文革前报社就要求外婆搬走,舅舅的中学也不让住,只好在附近的村子边给她搭了一个小棚子栖身。那是一个用木头、竹片及油毛毡搭成的棚子,只能放一张床,地面是又粘又湿的黄土,外婆戏称为古代考科举用的“考棚”。小村里有几户农家,他们知道外婆成分不好,常欺负她,有个男人还总来说哪里哪里又杀地主全家了,语声切切,挺吓人的。外婆总显得战战兢兢的,家里做点肉汤好菜,总要一家一碗地端给他们,剩下一点才能自己吃。后来才知道,就在我暂住外婆家的那段日子,乡下各县正在大开杀戒,甚至有的被灭门(《广西文革大事年表》,117-136页。),可见,那男人的威胁并非虚言。

一星期以后,火车一通,父亲就回来了。他先去了报社,说看到母亲已被押回,也许他想使紧张的气氛缓和一些,说着说着,还不时夹着几声干涩的哈哈笑声,但在我听来,那笑声实在刺耳。然后他要求我到报社去陪母亲。

第二天,舅舅骑着自行车送我到报社。报社的后门朝向建政路,门前也站着一个威武的士兵,身上背着步枪!舅舅不敢进去,下了车,要我一个人进去。我刚从钢枪守卫的集中营出来,又走向钢枪守卫的大院,心里又惶恐又不情愿,走

到后门口没进去,又往反方向走了。舅舅骑车追上我,压低声音斥责:“怎么不进去!太不听话了!”我从没见过舅舅那么严厉,知道自己别无退路,心一横转身走了进去,哨兵并没盘问。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仍能清晰地看见那时的情景:一切都是熟悉的,熟悉的路,熟悉的宿舍楼,但一切又都是陌生的,只是因为人。走过住了十年的宿舍,我家原在三楼,正对着楼梯,但我知道这儿没家了。楼下有一个公用水管,一个女孩正在打水,一个多月前我还常和她玩,然而,她把头转开了,我也默默地走过,仿佛从不认识。绕过一个草坪,路过公厕、浴室和水房,走到一排平房,那原是厨房,现在是“牛棚”,即落难者的栖身之处。我推开顶头一间的门,母亲正在吃饭。一个星期不见,她更瘦了,头发被剪得乱七八糟,脸上有些黑色的印记。一进门,我眼泪就掉了下来。母亲忙安慰我,说没怎么被打,脸上的黑印是被人倒了印刷油墨。又说:“剪头发时还有人阻止呢,只是那个女的说外面都剪,就被剪了。好人还是有的。”我一直记得这句话,也十分佩服母亲,我永远也不可能像她那样只记住人们的善,而过滤掉那些恶。

很快,我便领略到人们的恶。一个从“解放区”抓住的人被押回报社,在食堂门口示众,他站在一张长凳上,五花大绑。有两天我去食堂打饭,都看到这样一幕。我并不认识他,以后我也从不敢问母亲,她自己遭过什么罪。

我认识的陈广旭没有走出“解放区”。听说他后来也出来投降,在路上就被报社的人认出,然后背部中弹而死。战乱始停,陈的老父曾来报社找,才知道这一噩耗。陈广旭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文革前分来广西日报,父亲是工程师。母亲说陈根本不可能拿枪战斗,即使在“解放区”写过什么文章,也绝无死罪。前日我问母亲,文革后对此案是否有结论,她回答没听说。实际上,即使在“四二二”被当成反革命被镇压的年代,这种事也是不被公开认可的,否则那名指认者应该出来领赏。谁害死了陈广旭,也许将永远是个谜。多年来我一直不能忘却此人,改革开放以后生活越好,我越为他惋惜。假如大乱初起他便逃回上海,假如留在南宁也不参加任何派别,假如那天他和我们一起从“解放区”出来,也许就能挨过那段日子,他还那么年轻,也许能赶上文革后第一批招

研究生,也许又回到繁华的上海。然而,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尽管母亲出身不好,可历次运动都安然无事,本来文革也绝对搞不到她头上,然而既从“解放区”出来,就被指为“四二二”的骨干,文革前所有的经历也都变成罪状了。母亲白天在大院里劳动,晚上在屋里写检查,一出去就得背一个黑牌子。既然住在“牛棚”,我也成了贱民,必须忍受辱骂和虐待,如同一些教育学家所言,孩子之间的施虐往往甚于成人,此处不必赘言。我终日与书为伴,但家里的书大多被抄,只能乱翻仅剩的《鲁迅全集》,以至反复读了七遍,鲁迅对人性恶的剖析与现实如此贴切,那种阴暗的笔调也给我带来终生的影响。我们这一辈就是这样,少年读鲁迅,青年才读到安徒生。

开学以后,政治活动不少,时而拉我们去参加公判大会,每次都有人被判死刑,被毙者最常听到的罪名是参加“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文革后证明那是彻头彻尾的冤案(《广西文革大事年表》,89页。)。那时语文课的作业多是造句,一次,要求用“斩钉截铁”来造句。第二天,老师讲评念出这样的句子:“昨天,我们去参加公判大会,回来的路上同学们议论纷纷,有的说‘枪毙了7个’,有的说‘枪毙了8个’,我斩钉截铁地说:‘是8个!’”同学们顿时哄堂大笑,老师讲评说:“语句很通顺,但典型的用词不当。”不知为什么,我没笑,这个造句令我终身难忘。

战后,南宁的中心区即解放路一带变为一片焦土,百货大楼也大半坍塌。小学奉命组织学生去参观,老师指着炸毁烧焦的废墟说:“看!那都是‘四二二’烧毁的!”讲解员甚至对小学生说“四二二”的人如何淫乱之类。我在心里说:大楼是被“联指”与解放军的大炮炸毁的,民房就是那些炮火点燃的,我也见过那些男生与女生,他们和你们一样,也曾是那么阳光与天真。当然,当时我绝不敢吭一声,更不敢说我曾从那儿走过。龙应台说,她23岁时读近代史原始资料,才知道“原来历史的一半是编造”(龙应台:《不相信》,《南方周末》2007年12月12日。)。然而,1968年我就知道了,那年,我11岁。■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我为周扬敲边鼓

○ 邓伟志

我很喜欢能在每个月的月初就看到《炎黄春秋》的当月刊物。4月2日,我把目光集中在第4期的《走出秦城的周扬》一文上。当我读到开头第一段的第二句时,就发现文中有一个明显的硬伤。文章说,1966年2、3月柯庆施邀请……。

柯庆施1965年4月就病逝了,是不可能邀请的。柯更不可能参与策划什么“纪要”。(本刊没有发现这个错误,特此致歉——编者)

接着,读到第三句“张春桥登门拜访”周扬时,尤其是读到第四句“文艺黑线”时,勾起了我的一段甜酸苦辣的回忆。

我差一点诬陷了周扬

那是1976年冬,我怀着“第二次解放”的喜悦心情,参与中共上海市委组织的批判“四人帮”的文字工作。1976年底,带着上海以及各地揭批张春桥的主要材料,到《红旗》杂志撰写《评张春桥的反革命道路》一文。在红旗杂志社招待所一住就是四、五个月。据说我住的招待所曾经是周扬的家。

在写批张春桥文章的时候,有位领导同志提供了一个材料:“张春桥是周扬文艺黑线上的人。在1966年周扬过上海时,张春桥私下里去看周扬。”我懵了。第一,用“文艺黑线”当棍子打人的张春桥,他自己也是“文艺黑线”。第二,这位知情的领导同志怎么不早揭发呢?早揭发,张春桥岂不是早就垮台了!还有,第三,张春桥的这条罪状要不要写到批张的文章里?

毫无疑问,那是一定要写的。因此,在一稿又一稿中都保留有“张春桥是周扬文艺黑线上的人”。在六七个学者起草初稿时有“张春桥是周扬文艺黑线上的人”的字眼,在只有两个人驻京修

改七稿、八稿时,仍有“张春桥是周扬文艺黑线上的人”句子;不用说,在留下我一个人在京参与定稿时,依然保留有“张春桥是周扬文艺黑线上的人”说法。

1977年5月2日,《从历史反革命到现行反革命——评张春桥的反革命道路》一文,经当时的中央宣传小组负责人审定、一位政治局委员批示,马上要在《红旗》上刊出,由新华社发稿。领导要求我与两位《红旗》编辑(一位是解放军政治学院的哲学教研室主任,再一位是《思想战线》的文艺编辑)连夜再斟酌一下,看看还有没有需要修改的。看到“张春桥是周扬文艺黑线上的人”一句时,三人不约而同地都停住了。因为,“文艺黑线”虽然还没正式公开平反,但是否定“黑线”的传言我们都听到了。再从我们自己的艺术良心上看,“黑线”的说法打击面也太广了。于是,三个人决定把“张春桥是周扬文艺黑线上的人”划掉。当夜向上报告划掉的事,上面都没反对。全文便于5月4日向全国播发。

这篇文章的社会影响很大,不仅所有大报一律全文刊登,而且连专区小报也摘要发表。幸亏当时文章作者署名是:中共上海市委大批判组。否则,文中那些转瞬即逝的提法,我不知会招来多少骂哟!随着形势的发展,一个又一个时髦的提法被否定,激发我决心不做一个随波逐流的写手,要学会独立思考。

“轩然大波”中的小波

1983年周扬讲异化和人道主义的报告受到了批判。这也就是周密在《走出秦城的周扬》一文中所说的“政治事件”,“轩然大波”。

按统一部署,我认真学习了批周扬的文章,

可是,说什么也不敢苟同。尽管批周扬的带头人胡乔木同志也曾经是我所崇敬的人,尽管我的导师当过胡乔木的秘书,同我讲过胡乔木的很多写作上的故事,尽管胡乔木1963年秋来我们中共中央华东局政治研究室找资料时,给我留下了文质彬彬的美好印象,我仍然认为胡乔木批周扬批得不对。

胡乔木批周扬的观点,在当时是主流看法。要正面批评胡乔木的观点是很难的,况且我也没那个水平与胡乔木坐而论道。我知道胡乔木批周扬的文章发表前曾征求过不少专家的意见,我也知道有些专家鉴于当时的政治气候,难以对胡乔木的文章提出尖锐意见,连文中一些知识性技术性的明显错误也不便指出来。于是我写了篇小杂文,用曲笔批评胡乔木对周扬的批评。

我写道:“最近,胡乔木同志在文章中把卓别林的国籍搞错了。这本来也是难免的。谁能记得那么清楚?可是令人费解的是,乔木同志的文章事前送给了那么多专家看,为什么竟没有一人提出来呢?总不会都没有发现吧!我看这里可能也有一个‘怕’的问题。大家都不愿提,到头来还是乔木同志自己出来更正,这岂不增加了麻烦!”

“这些事情虽小,但告诉我们一个问题:要创造一点学术民主的空气,要培养人们的知识勇气,不那么容易,还要花很大力气。没有一个‘敢’字,什么创新呀,改革呀,都是一纸空文。不敢碰旧,如何创新?不敢改旧,还谈什么改革?似乎应该提倡一下为‘敢’字撑腰,敢于坚持真理,敢于修正错误。”(见《人民日报》1984年5月28日)

拙文没有点穴,却有点名,以致发表后第六天,一位朋友化名在《人民日报》刊出批评我的文章。说我“没调查”,说我“横扫”。不知深浅的我,不服气,立即写了反批评,大意是:我愿意继续调查,请协助调查。待我调查后我将再写。

《人民日报》赞成我的观点、不同意乔木观点的同志对我说:“不可能给你发,你想把老头气死。”

我说:“我估计老头子在收集我的动向。那就请你们发个内参,说:邓伟志不服气。他又来稿,被扣下没发。”

后来,我的日子就开始不顺了。不过,较之那“轩然大波”来,我这里是“小波”,是不值一提的

“涟漪”。

二十多年后的反思

理论问题同学术问题有联系,更有严格区别。动不动把学术理论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会阻碍学术理论的发展。“政治高度”上去了,理论水平说不定就下来了。看似“上升到政治高度”,实际上是对政治的亵渎,是把政治庸俗化。政治标签到处贴,是“降低”了政治高度,是滑到了“政治低度”。

就是十足的政治问题也不是不可讨论的。曾有一阵讲,政治问题不可讨论,搞得人晕头转向;后来又讲,政治问题可以讨论,让人心花怒放。殊不知,正确的政治主张无不是讨论出来的。讨论是交流。交流是互补,是共振。深入地而不是庸庸碌碌地交流,一定会出现交锋。有交锋才能有火花,才有突破,才能出新。平等地交流、探索式地交锋,也一定达到交融,实现水乳般的交融。在水乳交融后,也就在“思想大体统一”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实践的丰富,又需要展开新的讨论。我不同意现在媒体上“减少矛盾”的说法。矛盾具有普遍性。矛盾是推动事物转化、进化的动力。问题不在于矛盾多少,而在于能不能及早地发现矛盾,有没有正视矛盾,会不会妥善地解决矛盾。没有矛盾还要那么多公务员干什么?没有社会矛盾,社会怎么发展?没有政治矛盾,没有政治讨论,就没有政治学。掩盖矛盾,回避矛盾,是没出息的表现。

政治水平与政治地位有关联,但二者之间决不能划等号。政治地位是一时的政治水平的标志,但不是永恒的标志。君不见有多少政治家被后人分了早年和晚年,分台上和台下。晚年不如早年的有,台上不如台下的也有。这不是有意对高位过不去,这是“实践出真知”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压低“高贵者”,在提升“卑贱者”。因此,在理论讨论中,没有政治地位高下之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一票对一票,不需要、也不可以加什么“权重”。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的中国人应当是最懂得这个道理。■

(作者系上海大学教授、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

(责任编辑 杨继绳)

一次“特殊”的抄家

○ 季旭东

在十年动乱的“文革”初期,江青通过叶群指使江腾蛟(时任南京军区空军政委)等人,利用当时在动乱中随意抄家的混乱局面,蒙骗一些部队的指战员和中学的学生红卫兵,在上海进行了一次针对一些文艺界人士的“特殊”抄家行动。这次行动的目的在于从这些人家中搜寻江青在上世纪30年代在沪活动的资料,以供江青对它们进行销毁或隐匿,从而达到其篡改自身历史、神化自己的目的。作为当年曾经参加过那次行动的一名中学红卫兵,我在此将我在那次行动中的所见所闻写出,以昭示世人,警醒自己,并对那次被抄者及其家人说声迟到的“对不起”。

1966年时,我正在上海市复兴中学念高中。“文革”爆发后,我和当时的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参加了学校的一个红卫兵组织,还成为负责人之一。记得是那年10月初的一个下午,几名驻沪空军的军人来到我们学校,并找到了我们的红卫兵部,要求借一些红卫兵袖章,说是文艺演出用。见是解放军有事相求,我们便不假思索地按其要求,将百来个袖章借给了他们。

当天晚上约六七点钟,驻沪空军部队来了辆汽车,并让我们红卫兵中家住驻沪空军大院的人(我也是其中之一)上车,说是到部队有事,什么事到了再说。既然如此,出于对解放军的尊敬,我们便上了车。

车行约半个小时,我们来到了位于邯郸路上新华一村的一家空军招待所。下车后,有军人将我们带入了一栋两层的小楼。在楼下的客厅里,我发现已有一些别的学校中家住驻沪空军大院的学生红卫兵先于我们到了这里。在客厅的两侧是摆放着餐桌的两间饭厅,餐桌上有着还算可口的晚餐。这里的工作人员让我们先吃饭,饭后在客厅中休息并等候,说是过一会儿有部队领导来说事。

大约在晚上11时,来了几位驻沪空军的干部,其中一位据说是部队保卫部门负责人告诉我说,现在在建的空军上海地下指挥所设计图纸及施工资料失窃。据空军保卫部门侦察,这些图纸与资料可能藏匿于赵丹、郑君里、白杨、童芷玲等5位旧文艺人家中,他们中有特务。为了军事工程的保密,上级领导(当时并未说明是哪个领导)决定利用红卫兵可以随意抄家的形势,组织驻沪空军警卫连指战员假扮红卫兵,对这5个人进行抄家。由于当兵的对红卫兵的做派,如语言、行为等不熟悉,若在行动中与其他组织的红卫兵遭遇,将多有不便。所以,就需要找些“真正的”红卫兵一起来参加行动,以应对与其他红卫兵可能会发生的遭遇。

这位领导还对我们说,这次行动的目标是文字材料,尤其是手写的文字材料,对于被抄人家中的其他东西一律不得拿走。此次抄家针对5个被抄人兵分五路,每路由十来名军人及四五个学生红卫兵组成,并由一名部队的干部任队长,行动于午夜12时开始。

12点整,我们被带出客厅,但见外面已然停了5辆解放牌军用卡车,车子的牌号及写有部队车号之处均已被写有“红卫兵”三个字的红纸覆盖,每辆车边均有十来名身着军装,但去了领章帽徽的军人。这些军人着装上的领章和帽徽印迹清晰可见。他们的左臂还有佩带着红卫兵袖章。我们一眼便看出这些袖章就是我们借给他们的。

我当时被分在抄章芷玲家的一路,登车后,当兵的便将汽车的篷布放下,随即车子便开动,向着目标进发了。由于我看不到外面,加上又是夜间,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一路上都经过了哪些街道。约一小时后,车子停了下来。下车后,我们发现我们来到了一个宅院的铁栅栏门外。透过铁栅栏,我看到里面有一栋正对铁门的住宅楼。队长

告诉我说,目标就在这栋楼的二楼。

在铁门外,一位学生红卫兵见铁门是锁着的,便一把抓住门上的铁栅栏,打算爬过去,但被队长发现了。队长说这样动静太大,并又指着门上一个个尖尖的铁栅栏杆尖告诉他说从上面翻是有危险的。说罢,他拿出一件事先准备好的工具,三下五除二地弄开了门锁,全部人马也随即进入了院子。接着,队长让学生红卫兵守在院中,以应付可能到来的其他红卫兵,并指定由我负责室内,即抄家现场与院中学生红卫兵的联络。然后便带着由军人装扮的红卫兵径直向二楼童家走去,我也跟着他们一同上了楼。

到了童家门外,队长有节奏地敲起门来。不一会儿门便开了,门里闪现出一张四五十岁男人惊恐的面孔。队长一脸严肃地对开门的男人说道:“我们到来干什么,想必你也明白。希望在我们抄家时你不要捣乱,这样我们也不会让你受皮肉之苦的。”说完后便带人一拥而入。

进入童家后,我们发现里面十分凌乱。那男的告诉我说,他们单位已来人抄过家了……这时,睡在一间卧室中的几个孩子要起来,队长见状便对他们说:“都躺下,别动!”同时让家庭主妇童芷玲起来,指着开门的男子问她:“是你丈夫吗?”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便让他们二人背墙而立,并让一名战士在一旁看着,随后即开始了抄家。

在抄家的行动中,由军人装扮的红卫兵显得十分老到,他们相当仔细,对房屋的角角落落及天花板上进行了搜索,甚至连钢丝床的钢管,他们也用铁丝对管腔作了钩探。当然对于桌子抽屉、衣橱等就更不在话下了。他们中的一些人还不时地对墙壁与地板进行叩击,以防漏过藏在可能的夹层中的物品。

整个抄家过程还算平稳,而且也没发生与其他组织红卫兵的遭遇,只是在抄到童芷玲夫妇为应对本单位造反派写的一份检查材料时发生了一些麻烦。童夫妇二人请我们千万别将这份检查带走,说否则不好向单位造反派交代,并且写出这份检查也十分不易。面对他们的苦苦哀求,队长认真地阅看了那份检查,然而却坚决地说:“这份东西我们也一定要带走,不能留下。”之后,无论童夫妇怎样苦求也都无济于事了。

抄家一共折腾了两个来小时,抄出的文字材

料,其中还有一些旧照片、旧书什么的统统被装入了事先准备好的麻袋(一共装了两麻袋多)。凌晨三时左右,队长告诉大家行动结束。临离开童家时,童夫妇让我们给他们写个抄家证明,以便向单位造反派说明,包括那份检查在内的一些文字材料已被外单位红卫兵抄走。队长满足了他们的这个要求,信手写了个纸条,落款为临时杜撰的“上海市联合红卫兵”(凭此条是绝对查不到此次抄家者的)。在把纸条交给童氏夫妇后,队长便带着所有人登车返回了。

回到新华一村时,已是清晨四点多。下车后,我们这些学生红卫兵被告之可以解散,各回各处了。我这时发现,五路抄家人马的汽车已有几辆先到了,但人已散去。由于未亲身参加,之后也未去打听,所以也不知道这次其他几路抄家的详情。至于我们离开后,所抄材料的去向以及将会被作何处理,我就更是不得而知了。

对于这次的抄家行动,我们这些中学生当时是感到很荣幸的,认为是为国防、为解放军效力,做了贡献。然而,我们在荣幸之余也有些纳闷,这么严重的国防失密事件为何不让公安部门查办(“文革”初期公检法尚健全)呢?但这种纳闷在当时是无从求解的。直到十来年后的1977年,我作为一名军人在聆听上级传达揭批“四人帮”的材料时,才如醍醐灌顶——原来如此。■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勘 误

本刊热心读者周淑英女士来电指出2011年第4期第19页的照片不是王曼恬本人。经查证,确实有误,特向读者致歉并表示感谢。

贵刊2011年第4期刊登的《我采访了波尔布特》一文,开头的年份有误:“1974年2月”应为“1975年……”。

1975年2月,中国新闻代表团离京经越南去柬埔寨访问,我是代表团成员之一。当年3月25日,中国新闻代表团在金边前线会唔了波尔布特等柬共中央领导人。当时我有记录。此事还可以向代表团成员、新华社记者徐熊、汤孟宗等同志核对。

陈泊微

参加革命前后的记忆

○ 戴 煌

1943年夏天,苏北地区的日寇进行大扫荡。当时我15岁,是陈桥小学初中补习班二年级学生。这时因早听说鬼子已开始大扫荡,全家老小已急促搬迁到陈桥西三里地的小朱庄一带一个表舅家避难。一天,我临时到还没有全部搬完的陈桥镇的祖居房收拾清理残存旧物,中午草草地吃了点东西,就躺在地上的草席上睡着了。忽然,听到陈桥镇东边猛烈的炮弹爆炸声,我急忙爬起来冲出屋子,与镇上的男女老少挤在一起急步穿过街西头的大桥,向西北方向一里多地的马泥沟跑去。不一会儿,扫荡的日本强盗就占领了陈桥镇。并且也过了街西头的大木桥,朝好多条田埂上向北逃避的人群头上开枪威吓。我们急奔到马泥沟边,跳上渡船过了河,躲在长满芦苇的小水沟西边几座茅屋背后,免得日寇追在背后鸣枪射击。等到鬼子们也在那个渡口过了河向东边的沟墩据点走去,我和逃难的乡亲们这才松了口气。

这沟墩镇,是苏北盐阜地区阜宁县城南30里、盐城县北90里的一个原700多户的大镇,我的出生地。1937年底,占领了上海的日本侵略军又占领了南京,1938年早春向苏北侵犯。我们全家与沟墩的很多邻居,一度离散到四乡。期间,我们在沟墩东18里的一个村庄,还被路过的一队日本鬼子掳掠过。后来大概由于徐州会战日本鬼子大败,侵占阜宁、沟墩、盐城等地的日寇全部南撤到长江北岸的南通——扬州一线,我们才从乡下又回到沟墩老家。

这时我已10岁了。尽管正在暑假期间,匆匆备好教室的沟墩小学就叫所有的学生加紧上课,补完三年级就急教四年级,好把逃荒的一个多季度时间抢回来。但是到了1939年初,增援徐州战场的大批日军又从徐州南下一部分占据了阜宁城,我们全家就躲避到沟墩西南15里的陈桥镇。

我小学毕业后,跳级考取了邻县(建阳县)海南中学的二年级,但家境日衰,嫂子们已在稀饭里开始掺树皮和榆树叶了,不能及时交上学校每月30斤大米的伙食费,只好回到陈桥小学继续读免费的初中补习班。1943年又遇到日寇的大扫荡,学习不得不停辍下来。

事后不久,就有传言说,霸据沟墩的日本强盗的一个“太君”说:如果谁家有人参加新四军和共产党,就把这个家庭的大人小孩全都“死啦死啦”的!很快,就有沟墩街北头一个姓夏的大约30岁左右的妇女,来到陈桥和小朱庄一带秘密了解谁家有人参加了共产党或新四军,结果被游击区的民兵捉住了。射阳县二区政府在小朱庄召集附近广大群众开了个公审大会,大家一致要求对她处以死刑。这时,她虽然口口声声地“冤枉啊,冤枉啊”但区队和民兵还是把她拉到马泥沟南稻田边上枪毙了。这个小田埂,包括30来米宽的马泥沟在内,离我们全家临时居住的沟北农舍,只有一百来米的距离,全家都看得一清二楚。

我和家里人都知道,这个被枪毙的女探子的父亲,就是一个土匪头子。在1942年春天,被射阳县二区中队在一个乱坟场里枪毙了。经过1943年的日寇大扫荡,大家已经噤若寒蝉,生怕不定什么时候又要来上一回,再加上耳边回荡着沟墩据点那个“太君”的威胁嚎叫,家里如果有人真的参加了新四军或共产党,怎么能不让人担心!

1944年春节过后,苏北新四军游击区的《盐阜日报》中缝,刊登出刚刚成立的“盐阜师范”的招生启事。招生条件是年满18岁,初中文化程度。三年毕业后,不管是中文班还是音乐班,基本上都到各县初级中学当教员;学习期间,一律由公家负担食宿费。



青年时期的戴煌

看了这样的启事,我心中很是兴奋。虽然当时只有16岁,但是我身形高瘦,完全可以冒充18岁,尽管我只是初中补习班二年级,可我从从小就酷爱写文章,临近小学毕业,语文老师在我的作文本上先后批过“天衣无缝”和“鹤立鸡群”的评语,所以小学毕业后能跳级考取初中二年级,后来因家庭困难,才不得不回到陈桥小学。现在既然有公家供给食宿费,我觉得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地试一下。这样,我就到相对安全的阜宁县一个小镇旁的农村考点去报考。考试的课目主要是国、算、英及史、地,数理化的题目十分简单,分数出来,我居然顺利地考上了。按学校的规定,凡考上的学生,最后都要经过校长的面试。面试时,校长陆维特(陆维特,福建人。全国解放后是福建省政府的第一任教育厅厅长。)坐在校长办公桌后面的凳子上,我坐在办公桌外面的凳子上。他一直端详我,就是不讲话。我觉得纳闷,这就是面试?但我也一直没吭声,过了好一会儿,他突然问我:

“你有18岁吗?”

听他这一问,我特别惊讶:“一米七几的高个子,他怎么看出来的?”可是在校长面前,我应该说老实话。

于是坦白:“是,我16岁。”

“这才对头嘛。”陆校长说,“到盐阜师范来报

考的人很多,面试时经我看过的人多去了。所以我看来看去,尽管你个子不矮,但是就觉得你好像没有18岁。虽然你考的成绩还不错,但是你才16岁,三年毕业后把你放在一个初级中学去当老师,说不定班上有的学生还比你的年纪大一些哩,这可不兴。好在我们学校还有个音乐班,你的嗓门儿还不错,又会弹风琴,你就去音乐班,不要去语文教学班了。三年毕业后,去一个学校当音乐教员,不管学唱歌的人年龄大小,那无所谓,你看怎么样?”

我想了又想,觉得这不符合我的理想——小学快毕业时,由于看了一些文学作品和报纸上的许多文章,我就钟情于写作。本想在盐阜师范语文教学班学习几年,日后为写文章打好基础。我遂向陆维特校长吐露。

他考虑了好一会儿,问我有没有听说过射阳县二区文教助理员成运?因为他在担任射阳县文教科长时和成运很熟悉。听他这一问,我说认识,他和我的父亲就是堂表兄弟。我叫他“运叔”。

陆维特一听,连忙摊开信纸,急速地写好一封信交给我,要我回家后送交给成运。

于是我就从盐阜师范所在的村庄,回到临时住宿的附近一个小镇上的饭店收拾行装,准备回射阳县二区的家。回家后的第二天,我跑了七八里路,到当时射阳县二区的中心地带找到了二区政府所在的村庄,并很快见到了成运叔。他看了陆维特的信,并把信纸递给我看,信上的大意是:

成运同志:你的表侄戴澍霖才16岁,不符合盐阜师范的招生条件,但是天资很好,居然考中了,但不能进入他所理想的语文教学班,好在他的音色很好,又会弹风琴。请你劝劝他,最好改选盐阜师范音乐班,不然太可惜了。……此致布礼,陆维特。

于是运叔再三劝我:“陆校长劝你进音乐班,这多好啊!你为什么不愿意去?你的理想是什么?”

我还是摇头:“我想长大了写文章,进语文教学班多看点书,研究研究如何才能写好文章……”

他没等我说完就抢着说:“能够想着写文章当然好,但是你不到18岁,不符合盐阜师范的招

生条件,根本进不了语文教学班,你叫学校怎么办?如果一定要按你的理想办,那就只能等到18岁以后再去考!”

两年之后再考实在太久了,就这样,我心情矛盾地走在回家的路上。刚巧路过射阳县文工团的驻地,我想到文工团里的团员有不少自己的同学、朋友和亲戚,顺便就去看看他们。

他们听我说了投考盐阜师范的情况,纷纷劝我不如参加射阳县文工团,比师范学院音乐班更好,既唱歌、又演戏,还能抽空给报纸写点文章。

“能给报纸写文章”的说法很打动我,于是,立即报名加入射阳县文工团。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1944年4月23日。参加文工团一个礼拜,我收到发下来的新四军单身军装,立即兴奋地换上。

但这一下,引起全家老小的担忧,情势这么紧张,谁家都不愿意让人知道出了个新四军或者共产党,而我的这一举动,无疑是对全家老小生存的严重威胁!怎么办?

那时,我们也不知道抗日还要抗多久,毛泽东著作中有《论持久战》,小学课堂的粉墙上又贴着斯大林这样的口号——“今年消灭希特勒法西斯,明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只是个比喻,没有说明具体年限。这当中,会不会再遭遇日本鬼子的大扫荡?这时我家中老老小小已有二十几个人,最大的侄儿侄女都已七岁,上了学,如果全家老小遭到杀害,那可是灭顶之灾啊!我想如果改换名字,汉奸密探即使听说了,也无从知道我的来历,这对保障全家老小的安全是个妙策。

原来的阜宁县在射阳河南北有广大的地区,1940年共产党和新四军来了以后,把阜宁县划分为三个县:在射阳河以北的中心地带,仍叫阜宁县;在原阜宁县城东北60里的东坎镇直到黄海海边的广大地区,划为阜东县(现叫滨海县);在射阳河南西到沟墩镇、东到合德镇直至黄海海边,划为射阳县。老阜宁县的射阳河两边,原有“陈王顾戴刘”五大姓,光在沟墩南北,就有南戴庄和北戴庄,另外数不清的村庄和散居户都姓戴。

到底改成何名,我冥思苦想。正好文工团里有个比我小两岁的夏姓少年,改名作“夏皇”,启发了我。于是我就把原名“戴澍霖”改为“戴煌”,

我兄弟姊妹几人名字的最后一个字,皆是“雨”字头下面双木林的“霖”字,从水;而改成“煌”字,“火”字旁,从火,“水火不相容”。别人就不会轻易把我与家人联系在一起了。

回到文工团,我把自己改名的设想向文工团政治指导员王新生同志详述了一遍。他完全同意。他根据我投考盐阜师范的情况,要我把自己的学历提高到高中二年级,说这样敌人更把我和“戴澍霖”划不上等号。熟知我的人都知道,我只读到陈桥小学初中补习班二年级,还以为戴澍霖家境贫苦一直在陈桥小学里混,这会使我的身份更隐蔽一些。

我觉得他的建议甚是在理,于是在加入文工团的登记表上,不但将名字易为“戴煌”,同时还依计改写了自己的学历。

当年这样千思百虑,是因为射阳县在整个苏北盐阜区九个县中是对敌斗争最紧张最危险的一个县:全县七个区,被在三条河流的日寇封锁线分割成四小块地区,其中第三区和第四区,还是各自只有20里宽长的小小区域。射阳文工团在不时去各区演出和组织农村剧团时,虽经常跟着射阳县总队一齐行动,穿越日寇河流封锁线时两头都有一支武装部队担任警戒,连部队政委马宾(建国后从事钢铁工业,晚年常常联合些老同志给中央写联名信批评私有化)都肩扛“三八”大盖,为了在穿越封锁线时准备与袭击的日寇对射。因之总的来说,文工团到各区轮流演出和组织农村剧团还是比较安全的。但是单独行动,那就例外了。如1945年开春,县总队忙于分散打游击,文工团要独自从第六区穿越陈洋到海关的海河到第四区去组织农村剧团,保卫文工团只是海河北岸第六区的一些民兵。那天下午,当我们快到陈洋西边海关15里长的海河北岸时,前面的民兵突然发现有十来个鬼子和几个伪军,正在我们准备过河的那一段河岸的路上向西走。前面的民兵立即隐蔽到岸边一座草屋后面回头向文工团的队伍急速打着手势,要我们立即埋伏到正在前进的那条田径小道两边的麦地里,然后快速俯伏在屋后,手端着早已上膛的步枪把守着屋后的两边,那神色就是如果有鬼子兵想过来,他们好立即开火。

这一回,正好文工团背档案袋等大包裹的同

志停歇在六区区中心，这使我们还稍微放点心。我们在麦地里埋伏好后，在上面麦芒的空隙中盯着前面的动静。结果还好，这十来个鬼子兵和几个伪军什么也没有发现，一直向西走去，大约已走了两三里远。隐藏在那座草屋背后的民兵都立起身来，向屋后几十米距离的麦地里飞快地打着手势，要我们立即从麦地起身，快速到岸边登上早就备好的小船渡河南下。我们文工团的男女同志立即还从原来的那条小径飞来到岸边，分别登上那早就备好的三条小船，船上的师傅撑篙的撑篙，划桨的划桨，很快就渡过了这将近100米宽的海河。我们上了南岸。就飞快地向四区中心地带猛跑。我们一口气跑了四五里地，个个大汗淋漓，气喘吁吁，才放下背包和自身背带的乐器，坐下来喘口气歇一歇。然后再前进几里路，才到了四区中心地带的边缘。我们立即进行分工，准备分别去四区各乡组织农村剧团。歇足气以后，又前进三四里地，就到了四区中心的一个小镇，找到了四区区委和区政府，请他们分别开了去各乡的介绍信。

我拿到一封信，是去四区最边缘的紧挨日寇据点陈洋镇的吴墩乡。天黑了，我才摸到这个有十几户人家的吴墩。当晚就和乡长、乡支书谈了话，主要是谈我组织农村剧团的打算。他们说这里离陈洋据点只有四五里地，唱歌排戏要特别小心。第二天天亮时，我到一座草屋的背后向西北方向的陈洋镇据点瞭望，才发觉这四五里地之宽一片空旷的棉田中间，只有一间半间孤零零的小屋，连陈洋据点日寇宿营地飘扬的“太阳旗”都看得清清楚楚。

吃了早饭后，吴墩和附近各小村落和散居人家稍有点文化的青壮年男女，都到我临时住的一家堂屋开会，组织起吴墩乡农村剧团并选出了团长。开始唱歌时，大家都小心翼翼，发声很轻很轻，就怕被远处的人听到。因为谁也不能保证在陈洋据点与吴墩之间田野中那些散居的小屋里，是否有勾结日本鬼子的汉奸走狗。这样搞了几天，在四区中心的那个小镇，还搞了一次农村剧团会演，而我所在的这个吴墩乡的农村剧团，连一个歌子都没去唱。

末了，我们结束了在四区组织农村剧团的任务，又在前几天到四区来的那条小路上回到陈洋

到海关那段海河的南岸。在民兵的掩护下，顺利地渡过了海河，又回到六区的中心地带，与那位背扛档案袋等大礼包的同志汇合。不日，我们徒步穿过了六区西部地带，来到日寇又一封锁线的“串长河”边，准备渡过这条河流，到射阳县一区南部的高陈庄和沙缺口一带。

等到半夜，日寇的巡逻队已经龟宿于据点，我们在串长河两岸六区和一区一些民兵的掩护下，在沟墩据点以北四五里地的曾家祠堂小据点北边悄悄渡过了串长河，立即向西急奔，奔跑了五六里地，过了一条小河上的木桥，登上了比地面高出十几米的沙堤。因为又饿又累，我们就在几间草屋里铺上稻草，打开背包，呼呼地入睡了。

天刚拂晓，我们正呼呼地酣睡着，忽听外面枪声大作。原来曾家祠堂小据点的一群鬼子兵和伪军打过来了。大概是这一带住户里有人偷偷地去告密了。我们立即爬起来，有的快速打背包，来不及打背包的人都头上顶着被子，向西边快步走去。后来听说，曾家祠堂小据点的敌人追到沙堤下东边的小河边，有个鬼子嗷嗷叫地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枪，刚踏上那不到一米宽的小木桥，就被堤上的一个民兵一枪打得掉在小河东岸边的河水里，剩下的敌人发现沙堤上伏有开枪的人，就立即伏在小河东岸的堤埂上或附近的牛车棚里，向沙堤上的农舍猛打步枪和机关枪。这时，我已十七岁，入党已八九个月了，在文工团内行政上是一个分队长，在俱乐部里又是音乐组长，心中激荡起小学快毕业时老师教唱的聂耳词曲的《毕业歌》，“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巨浪，巨浪，不断地增长，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当时每次演唱，我和很多同学都满眼含满了泪水，恨不能立即端起刀枪奔向杀敌的战场。几年来，我一直胸怀着这样的激情。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投降。这样，在1943年的日寇大扫荡之后，人们就再也没见过日寇的再扫荡。再也听不到沟墩据点那个鬼子“太君”“死啦死啦”式的嚎叫，我们全家老老小小安全地渡过了日寇侵华的大灾难。■

（作者为新华社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 杨继绳）

重读《国际歌》感言

○ 杨 起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 让思想冲破牢笼
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 趁热打铁才能成功
今年 2011 年 ,是《国际歌》诞生 140 周年。
每次重读它 ,都有感触。

以上即《国际歌》的中文标准版本 ,是 1962 年中国音协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邀请有关专家对《国际歌》歌词进一步推敲后确定下来的。推敲前的版本称为“延安版”,该版是诗人、毛泽东的朋友萧三所核定的。

《国际歌》的词作者是法国革命诗人欧仁·鲍狄埃 (Eugène Pottier)。皮埃尔·狄盖特 (Pierre De Geyter) 作曲。狄盖特原籍比利时 ,父母移居到法国 ,所以常常被称为法国人。曲谱成于 1888 年 ,此时鲍狄埃已经离世一年了。

或许 ,人们以为以上歌词就是原作的全部。不是的。原作一共有六段 ,以上的译文只是前两段 ,再加上中间那两句副歌。或许 ,人们以为以上歌词就是原作逐字逐句的译。不是的。要想这样做也不可能 ,因为译者总要遣词锻句 ,尽力翻出诗意来 ,而难度更大的是译文的字数必须附和乐曲的节拍 ,多一个字不好 ,少一个字也不宜 ,译

者不得不有所取舍。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 ,不能不说的是 ,汉语歌词中的个别句子偏离了原意。直到今天 ,许多人还经常引用《国际歌》的上述中文版本 ,将之视为格言和经典。引用经典 ,若是外国的经典 ,必须使用权威的译文。引用《国际歌》的歌词 ,就需要多一层小心。翻译歌词 ,既要翻出诗意 ,又要配合原曲 ,所以译文难以十分准确。我以为 ,要引用的话 ,最好引用原诗的译文 ,而不是歌词的译文。鉴此 ,笔者不揣浅陋 ,写此小文 ,一来想把《国际歌》以上歌词与原诗偏离的地方指出 ,二来把原诗用白话尽量忠实地译出 ,俾使读者感受一下此诗的激情和韵味。用白话来翻译它倒是恰如其分的。鲍狄埃的诗 ,早有几位名家翻译了出来 ,其中必定包括《国际歌》。笔者为了不受其影响 ,刻意没有去查阅。我只用最浅白的话把它翻译出来 ,以保持其原汁原味。

第一段

起来 ,地球上的受难者 !
起来 ,饥肠辘辘的苦役 !
公理像岩浆一样在火山口下滚动 ,

国 际 歌

1=B 2/4 庄严 雄壮地

[法] 欧仁·鲍狄埃词
[法] 比尔·狄盖特曲

5 | 1̣. 7 2̣ 1̣ 5 3 | 6 - 4 0 6 | 2̣. 1̣ 7 6 5 4 | 3 - - 5 |

起 来 , 饥 寒 交 迫 的 奴 隶 , 起 来 , 全 世 界 受 苦 的 人 ! 满

1̣. 7 2̣ 1̣ 5 3 | 6 - 4 0 2̣ 1̣ | 7 2̣ 4 7 | 1̣ - 1̣ 0

腔 的 热 血 已 经 沸 腾 , 要 为 真 理 而 斗 争 !

(接歌词)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国际歌》作者鲍狄埃(1816-1887)

最后就要爆发喷涌。

让我们把过去一扫而净，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世界的基础将要变更：

莫说我们现在什么都不是，

我们要做到一切都行！

说明：

以上的第三句，在标准版本中，译作“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显然与原文不符。原文的意思是，受苦受难的人们生活在暗无天日、无理可讲的境况中，现在呢，公理（即世界大多数人认为正确的道理）像地火一样，已经点燃，像岩浆一样，正在翻滚着，最后就要喷涌而出了。无理可讲就要变成有理可讲了。原文中没有任何“为真理而斗争”的字样。再说，公理与真理并非同义词，二者不可随意相互替代使用。

第四句，“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标准版本的译文和原文没有根本的歧义，只是，原文说的是“过去”，而不是“旧世界”。过去是时间概念，而世界是多种概念的聚合，其中有物质概念、政治概念、精神概念等等。二者的差别是很大的。原文说，“把过去一扫而净”，意思是告别过去，迎接未来。在这里，作者显然没有确指要打垮某某性质的旧世界，建立另一性质的新世界。混淆了时间概念和政治概念，不妥当。

第五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这个译法确有望文生义或移花接木之嫌，因为，原文中既不包含“一无所有”，也没有表达“要做天下主人”的意思。这句话的两个关键词是 rien 和 tout。它们是十足的反义词。rien 既可以表示“什么也没有”，即英文的 nothing，也可以表示“什么也不是”、“一钱不值”或“无足轻重”，即英文的 nobody。原句中的 rien，受动词所限，只能理解为“我们什么都不是”，而非“我们一无所有”。rien 的反面是 tout。tout 即一切，其相对的英文词是 everything 或 all。若死译，原文字句如下：“我们什么都不是，让我们成为一切”。“我们什么都不是”，在法文里，一眼便可以看出来，作者不是说劳动人民自轻自贱，而是说，现在我们被瞧不起，在那些家伙们的眼里，我们什么都不是。笔者在忠于原文的前提下，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将之调整为“莫说我们现在什么都不是，我们要做到一切都行！”

我们不妨大胆想象一个场面：鲍狄埃在一次劳动者的集会上情绪激昂地向与会者发出号召。他说：今天，他们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是吗？不，我们什么都是！他们不是说我们无足轻重、轻如鸿毛吗？不，我们一点都不轻如鸿毛，我们要当顶天立地的人！我们一切都行！

这就是这两句诗的含义。

鲍狄埃此处是在使用强烈的反差来唤起劳动者的自信，激励劳动者的斗志。在这两句诗中，显然，鲍狄埃强调的是人的价值、尊严和能力，而不是具体地夺权，即“要做天下的主人”。

当年的译者为什么把“无足轻重”译成了“一无所有”，把“争当顶天立地的人”译成了“要做天下的主人”呢？当事人早已辞世，我们只能各自揣测和猜想了。

据专家考证，1920年10月广东省共产主义小组主办的《劳动者》周刊，11月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主办的《华工旬刊》，1923年《小说月报》第十二卷增刊《俄国文学研究》上都曾经刊登过未署名的《国际歌》译文。最先有署名的中文版本应该是郑振铎留下来的。1923年6月，《新青年》第1期上发表了瞿秋白从法文译过来的《国际歌》歌词。法文“国际”这个词，如果译成中文，只有两个字，而这个音节有八拍，不易唱好。经过再三琢

磨,他采用音译“英德纳雄纳尔”。

萧三是毛泽东的同学,曾追随毛泽东共同发起成立“新民学会”。1920年5月,萧三远涉重洋,到了法国。当他和他的伙伴们第一次听到法语《国际歌》的时候,热血沸腾,产生了把它翻译成中文的心愿。1922年冬,萧三从巴黎抵达莫斯科。第二年,他与陈乔年一起,把《国际歌》的歌词初步翻译成中文。萧三回到延安后,又对歌词作了全面的修改。修改后的版本称为延安版。

列宁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于1917年俄历十月夺取了政权。1922年12月苏联成立。当萧三到达莫斯科的时候,《国际歌》已被确定为苏联国歌。

布尔什维克夺取的政权被定性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这些革命党人的胸中包蕴着冲天的壮志,他们并不满足只在俄国取胜,他们要把列宁的旗帜插遍全世界。萧三后来回到延安,那时的延安正是革命热情激荡高昂的地方。延安的革命者们定下的明确目标就是要推翻旧社会,建立新政权。解放区已经唱响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在上述的背景下,无论是延安版还是后来的标准版,都把“过去”译成“旧社会”,把“我们现在什么都不是,让我们成为一切”译成“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就是一件不难理解的事情了。

还有一个细节交代一下也许不算多余。鲍狄埃写此诗是在1871年,正是巴黎公社的社员们遭受镇压的当儿。他自己就是公社成员,可以想象,他是怀着一腔怒火奋笔疾书的。他号召工人们切莫自暴自弃,而是要豪情满怀地团结斗争,以便摆脱被人轻贱的处境,而变成举足轻重的群体。鲍狄埃是一位劳动人民的诗人,是一位革命者,但他不是列宁式的职业革命家,从来没有当过革命领袖。十月革命成功于1917年,比1871年晚了46年。在十月革命的46年前,鲍狄埃怎么会像一个职业革命家那样设计着世界革命的宏图呢?实际上,他也从来没有提出过任何夺取政权的目标。写完了《国际歌》之后,为了躲避迫害,他先是潜入英国,然后流亡美国。晚年穷困潦倒,半身瘫痪,直到1880年法国颁布了大赦令,他才得以重返故土。

显然,《国际歌》标准版的译文中,有些句子是再创造的产物。

副歌(重复两遍)

这是最后的斗争,
只要我们集结起来,
国际工协的理想,
明天就会扩展到全人类。

说明:

标准版的译文是: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以上译文与乐谱节拍丝丝相扣,用汉语唱起来铿锵有力,但是,它并不忠实于原文。

让我们先从第二句说起吧。英特纳雄耐尔是“国际”的音译。具体地说,指的是第一国际。第一国际的正式名称是“国际工人协会”,1864年成立于伦敦。其宗旨是在把各国(其实就是欧洲各国)的工人运动联合起来,以便更有效地保卫工人的利益,为劳动者的解放而斗争。这句话的原文是:“国际”将是全人类。若如此译成中文,中国读者肯定难于理解。但是,法文原文并不显得唐突。它要说的是:“国际”的理想和原则将来会扩展到全人类。将之译成“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即等于说“‘国际’一定要实现”。这就文理不通了,因为,“国际”是个组织实体,即国际工协,已经成立了好几年了,还要怎么实现呢?

据历史资料,中国音协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1962年邀请有关专家对《国际歌》歌词进一步推敲时,萧三曾将“英特纳雄耐尔”修改为“共产主义世界”,即由音译变为意译。但并未被大家所接受,此后各种出版物仍照原样排印,保持首创于瞿秋白的音译不变。

把第一国际改为“共产主义世界”,这不能称之为意译。怎么可以将第一国际等同于共产主义世界呢?

鲍狄埃在此诗中所指的“国际”的理想,实实在在地说,就是“*émancipation des travailleurs*”(劳动者的解放)。在当时,劳动者的解放指的是减少劳动者所受到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要求提高工资,减少工时等等,和打碎旧世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没有直接的关联。

第一国际的成立和运作,与马克思的支持与

指导是分不开的。它的临时章程就是马克思起草的。上一段中的“劳动者的解放”的提法乃马克思亲笔所书。但是,这个第一国际的组织成分太复杂了,鱼龙混杂,有工会工作者,有社会党人,有马克思主义者,也有以巴枯宁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该组织的成员的观点和利益根本无法融合,以至于在鲍狄埃写此诗的第二年,即1872年,便宣告解散了。

现在回过头来谈谈这副歌的第一句:“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当然,这十四个汉字非常符合乐曲的节拍,文字也没有译错。然而,由于歌词里一般不用标点,所以,它的断句相当模糊,以致让人弄不清上下句的关系。“到明天”三个字是和下一句连在一起的。我们唱《国际歌》唱了几十年,许多人一直把这一句理解为“大家要团结战斗,直到明天”。这样的理解是完全错误的。难道仅仅团结到明天?如果只团结到明天,后天就散伙吗?可是,原文却不会让人产生任何误解。它说的是:让我们集结起来,如果这样做了,那么,国际工协的理想明天就会扩展至全人类!此处的“明天”当然不是确指具体的明天,而是寓意“很快”或“即将”。

第二段

世界上没有救世主,
上帝、凯撒和演说家都不是救星,
生产者们,我们要自己拯救自己!
我们要做出拯救大家的决定!
要迫使窃贼把侵吞的东西吐出来,
要把我们的思想从囚室里拉出来,
让我们鼓旺炉火,
趁热打铁干起来!

说明:

此段歌词,在标准版中译作: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
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趁热打铁才能成功

译文与原文没有根本的差异。可能为了乐曲节拍的需要,当时的译者添加了某些字词,甚至在不违反原意的情况下,添加了一个句子。比如说,第一句加了“从来”二字。加上这两个字,不但强调了口气,也使这句话具有了格言的味道。未

尝不可。第二句,“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在原文中并不存在。即使在鲍狄埃的初稿里也没有。这显然是译者大笔一挥,自作主张添加的。第三句,“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这句话,是译者对原文的解释,解释得无误,却丢失了原文生动。原文将剥削者比作窃贼,号召劳动者掐住他们的脖子,硬是让他们把吞进肚子里的东西吐出来,就像渔翁挟着鱼鹰的脖子迫使鱼鹰把鱼儿吐出来一样。这个形象很能引发人们的联想,特别是引发那些遭受着剥夺的人的联想。只有这样方能解除他们的心头之恨。相比之下,“夺回劳动果实”的表述就显得有些呆板了。

第三段

国家压迫,法律搞鬼,
倒霉蛋被迫上缴血汗税;
富人哪有义务可言,
穷人的权利只是空谈。
受监管没完没了,
实现平等需要制定新法规:
《不承担义务就不该有权利,
没有权利就不该把义务承担!》

说明:

《国际歌》中文标准版仅仅包括原作的前两段和两段中间的副歌。作为一首歌曲,当然不宜太长,只选取原诗的前两段是颇为得体的。如果将该诗作为读物,那么,了解后几段的内容不无益处。就拿这第三段来说吧,作者写得深刻沉痛。法律不过是些死条文,怎能搞鬼?这个不难解释:首先,法律本身是保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其次,法律的解释权掌握在统治阶级手里,实在解释不了的时候,或者,在执行过程中发现对自己不利的情况时,随时可以修改嘛!“法律搞鬼”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不要以为法律白纸黑字,就是一成不变、对大家一视同仁的了。执法人可以把法律当成一团泥巴,想怎么捏就怎么捏。他们可以拿法律作弊,就像在牌桌上偷牌换牌一样。我想,鲍狄埃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第四段

矿业大王和铁路大王们,
他们不可一世的嘴脸是多么丑恶,
他们除了把劳动人民洗劫一空,
还干过别的什么勾当?

劳动者所创造的，
都流进了这帮家伙的保险箱。
人民决意让他们归还财富，
这只是求个理所应当。

第五段

给这些大王们干活，我们烟尘满面，
劳动者之间要祥和，我们只向暴君开战！
让我们规劝军队也发起罢工，
劝他们把枪托倒挂，把队伍解散！
若是这些吃人的野兽，
一定要把迫使我们牺牲当英雄，
他们很快就会看到，
我们的子弹将射向将军们的前胸！
说明：

在这一段里，我们看了一个有政治思想、讲究策略的鲍狄埃。他把打击对象缩小到一撮暴君。在法文里，暴君的本义和中文所说的暴君是一样的，但是词义逐渐扩大后，也指那些拥权自重、行事霸道的人，如矿业大王和铁路大王们。鲍狄埃想到了瓦解军队，但并非一厢情愿地光往好处想。他说，若是这些吃人的野兽，即当政的和行业的暴君们，一定要动用军队，而军队又执行他们命令来射杀我们的话，好啦，我们将以牙还牙，把子弹射向军队指挥官的胸膛！

第六段

工人们，农民们，
我们是劳动者的大党；
大地只属于在大地上劳动的人，
让有闲者滚去别的地方。
贪食我们血肉的，有多少魑魅魍魉！
有朝一日，当乌鸦和秃鹫消失时，
太阳将永放光芒！
说明：

此段第三句的原文是“大地只属于人”。若机械地逐字照搬，中国读者可能有五花八门的解读。有些人会认为鲍狄埃的意思是说大地只属于人，而剥削者是吸血鬼，不是人。有些人可能提出问题：为什么只属于人？难道飞禽走兽没有一席之地？要知道，作者写的是诗，他不可能超越字节和韵脚的限制。在这里，他不可能再加字了。所幸，这个“人”字(hommes)，在正常情况下，法语读者是不会误解和曲解的，因为与这个字相对应

的就是下一句的oisif(有闲者)。显然，鲍狄埃所设置的对立面是劳动的人和剥削别人、自己游手好闲的人。因此，在翻译此句时，笔者就把它处理成“大地只属于在大地上劳动的人”。有闲者，好理解，即过去我们常常提到的有闲阶级。法国一位朋友对我说，鲍狄埃是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在他的眼里和笔下，有闲者即具体指资本家。倒数第二句，乌鸦和秃鹫是个象征。不少的民族都将之视为不祥之鸟。

国际歌的歌词写得实在好，大气磅礴，慷慨激昂；狄盖特这个曲子，谱得也实在好，雄壮高亢，明快嘹亮。这首歌，无论是听，无论是唱，都会让人热血沸腾，激动不已。词曲配合得惟妙惟肖，相得益彰。它是激励斗志的战鼓，它是奋发精神的号角。它像野火一样迅速蔓延，世界各地的革命者争相传唱。

读此诗，首先要把它置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中。但是，在14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重读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强烈地感受到它的现实意义。读荷马的诗是读历史，读杜甫的三吏三别，也是读历史，读鲍狄埃的诗，那就不仅仅是读历史了。

在世界工人运动史上，鲍狄埃的革命诗篇当然不宜以“文献”相称，然而，不是文献，却胜过文献。有多少文献，能像《国际歌》这样鼓舞过这么多的劳苦大众，而且鼓舞得这么持久？

有多少革命歌曲（或者冠以革命头衔的歌曲）能像《国际歌》这样经得起历史考验？好的革命歌曲，如《国际歌》，如《马赛曲》，如《义勇军进行曲》，久唱不衰，如泰山上的青松，耐得烈焰，经得冰霜。一百多年来，在出现过革命风暴的国家里，不知有多少歌曲传唱，然而，其中的一些，只能说是芦苇捆，只能说是稻草堆，一经点燃，火光冲天，须臾便化为灰烬。急功近利、迎合跟风，奉旨成章，等等，这与发自人民心底的呐喊，哪能一样？

最后，让我们用《国际歌》的最后一句歌词来赞美《国际歌》：它与其他史诗并肩，将永放光芒！

■

（作者为新华社原国际部主任、巴黎总分社原社长）

（责任编辑 杨继绳）

读《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

○ 翁永曦

四十三年前我在内蒙古农村插队的时候，看到过一篇油印的文章，是关于中国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调查分析报告，颇有见地，印象很深，作者叫张木生，是我们这一辈人中，最早提出“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人。

四十三年后，案头又放上了一部书，张木生写的《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这部书洋洋洒洒，古今中外，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的现状和历史，读起来不轻松。一边翻看，一边查阅，一边思索。这部著作，对我而言最有价值的是提出了思考、判断现实和历史问题的角度和方法。

譬如，这个世界上究竟有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有没有终极真理、绝对真理？尽管受过中等以上文化教育的人都持否定态度，但现实生活的运转和操作中，从朝廷到百姓，不少人持肯定态度。有必要全文引述恩格斯称之为“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这个伟大的基本思想，特别是从黑格尔以来，已经成了一般人的意识，以致它在这种一般形式中未必会遭到反对了。但是，口头上承认这个思想是一回事，实际上把这个思想分别运用于每一个研究领域，又是一回事。

譬如，这个世界上究竟有没有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类文明进步中形成的共同财富和共识？对这种浅白的问题似乎没人会去正面否定，否则，无法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因为马克思的主张并不是无产阶级想出来的，是从人类文明文化进步中继承和提炼出来的。但在现实生活中，似乎还颇有争议。我记得

上中学的时候，学平面几何，教科书上讲“一个平面上两点连线以直线为最短”，后面加了一个括号“公理”。我问老师公理和定理的区别，老师讲定理是需要论证的，而公理是不需要论证的。普世价值就是公理，简而言之三句话：每个人都有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权利，公权力必须由人民定期授予，且必须受到限制、监督和制衡。对此难道还需要论证甚至去否定和批判吗？

再譬如，这个世界上究竟有没有“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事，有没有单凭主观意愿和意志就能实现的事？历史的轨迹是多种分力作用下的合力线，优秀的战略家、政治家通常是能够判断和把握住合力线方向的人。换句话说，这个世界不在于我们想要干什么，而在于只能干什么；不在于我们想要怎么干，而在于只能怎么干。对于决策者来讲，最危险的，莫过于自以为懂得而实际上并不真懂。

看完张木生的《我读李零》这部书，我想21世纪初叶，以“三个代表”为旗帜的中国共产党人肩负着伟大的历史使命和历史责任，大致可以表述为以下几点：

第一，制定一部立足于人类文明共同价值观、具有无上权威的宪法。这部宪法要说清楚权力的来源、权力的制衡、权力的监督和权力的更替。简而言之，这部宪法要把权力关进笼子。共产党领导千百万人民，武装夺取政权，但必须依照宪法建国、治国。国家权力的来源只能是人民授予，而且是定期授予。为什么？就是前面讲到的这个世界上最一切都在变化之中，共产党会变，任何伟大领袖也会变。否则就不会有反右派的悲剧，大跃进的悲剧，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一纸形同儿戏的宪法保护不了共和国主席的悲剧！

第二，以法律保护“少数”，积极倡导对少数人的主张和见解的尊重、包容和宽容。中国文化

中有其狭隘和极端的一面，我们在这方面是有缺陷有毛病的，对“少数”这个概念从不尊重、从不包容、从不宽容，动不动就搞思想斗争、路线斗争、阶级斗争，决不留情。张志新，一个了不起的追求真理的年轻共产党人，枪毙前连“共产党万岁”都不容许她喊。“大民主”在中国有过实践，文化大革命中谁都可以拉杆子当司令，一个中学里就有上百个红卫兵组织，最后形成两派，中学是、大学是、工厂是、地方上是，动枪动炮，你死我活。这叫民主吗？这是多数人的暴政，连民主的门槛都没碰到。

第三，把中国共产党从一个执政集团改造为真正意义上的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现代政党。一些老共产党人认为，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出现大面积、制度性腐败。何故？体制使然。党不改革，国家政改就无法推进。中国共产党的改革，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是超大型、超难度手术，需要有极高的政治智慧。一方面，几种病患不能同时上手术台；另一方面，巨轮转向要缓慢，转弯半径要长，快了会翻船。有一点是清晰的，今天的中国没有任何其他政治力量能取代中国共产党对经济与社会发展所必须保持的相对稳定作用；另一点也是清晰的，即老一辈革命家多次强调过的，党不改革，要么烂掉，要么爆掉。

第四，探索并创建国家与社会的现代治理模式。中国是一个层级鲜明、纵深很长的社会，海面波涛汹涌，海底却很平静，现代化就是使其扁平化；中国又是一个地区发展差异很大的社会，东部沿海地区和内地中心城市正在迈进现代化，但太多的地方还在农业社会滞留，现代化就是使其均质化。中国现行国家制度，源自于90年前的苏维埃模式，更适合抗击封锁、自力更生，而很难适应今天的全球化时代，把所有的矛盾、怨气和责任引向政府的体制，是难以为继的。今天信息传播瞬间万里，且传播成本大幅降低，这意味着政治将不再限于政府和政党范围。当代所有国家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是，越来越多的事情已不在可控范围内。中国无法侧身其外，网络的影响已超过传统的说教。很多实例证明，信息的透明和自由交流，会有效阻止非法治理，瓦解靠隐瞒真相来维持的权力。如何建设一

个更加开放的公民社会，如何给予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更多的自治权利，说到底，何种治理模式能使中国的文化、科学、经济更富于创意、创造和创新，这需要有大气魄、大智慧、大胆略的探索。

张木生在该书中提出的回归新民主主义的主张值得重视，它反映了当初共产党人最美好的理念、理想和追求，也包含了对蒋介石专制统治的批判。我问过很多老同志，当年你们参加革命，是不是为了实现今天的社会现状，他们都说是，没想到会是今天这样。原因呢？起初不明显，但慢慢地发生了异化。张木生呼唤的新民主主义不是经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也不是六十多年前的相对简单的概念，其中蕴含了这些年实践中的教训对其内含的丰富和充实，符合当初也基本符合今天中国的现状，虽然未必理想，也未必解渴，但不少人认为这个手术方案也许能形成今天朝野、“左”“右”的最大共识，既是回归点，也是出发点。■

（作者为某公司董事长）

（责任编辑 吴 思）



湘西王 陈渠珍

。 罗 维

民国时期湘西出土匪，天下皆知，如果了解湘西土匪，决不能不知道陈渠珍这个名字。他曾降服了无数彪悍的土匪，号称湘西王，影响民国湘西政局数十年之久。开国元勋贺龙曾经是他的部下，蒋介石、何健这样的大人物他也从不放在眼里，陈渠珍的人生很具有传奇色彩，他对于民国湘西地方治理的是非功过也难以用一句话来评说。

一部尘封的历险奇书

1882年陈渠珍出生于湘西凤凰一个小士绅家庭，他原名陈开琼，后来自己改名为陈渠珍，别号玉璠。陈渠珍16岁就读于芷江明山书院，17岁时考取秀才，传统士人经世致用的价值理念在他思想中这时已经根深蒂固，他胸怀远大，一心想要凭着自己的文韬武略报效国家，平治天下。

当时正逢清末政治腐败，甲午之战后割地赔款的消息接踵而来。陈渠珍虽身处边地，却和所有有志青年一样痛心国事，决心投笔从戎。1903年他考入刚刚在长沙成立不久的湖南武备学堂的兵目班。不久，将弁班学员——他的老乡——湘军将门之后田应诏因与外国教官殴斗被开除，这名缺额从兵目班学员中择优增补。陈渠珍因学习优秀，经考试录入将弁班，两年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时逢湖南成立新军，他初任教官。由于在学校期间陈渠珍受到社会革命新思想的影响，秘密加入了同盟会。当时湖南搜捕革命党人风声很紧，他被迫离开湖南，几经辗转，投奔到四川川边大臣赵尔丰处，和他一起前往四川的还有他在武备学堂的同学、后来一直跟随孙中山先生的林修梅。陈渠珍在当时的新军协同钟颖的手下当了个六十五标队官，相当于连长的职务。

素怀大志的陈渠珍是个有心人，他预计部队有随时进藏的可能，所以平时在军中很注意收集

入藏的史地资料。果然后来英国人支持的西藏叛军引发西藏骚乱，达赖喇嘛向清廷求援。清廷令四川边军派军援藏。陈渠珍及时向没有什么军事准备的上级钟颖进献了一份论证充分的西征计划，受到钟颖赏识，很快就晋升为一标三营督队官，这个职务相当于现在的副营长。到了宣统元年（1909年）清军入藏，陈渠珍已经凭着机智果敢，屡立战功，升为管带。陈渠珍曾只身带一名翻译，深入敌军侦察敌情，虽然被敌人抓住，但凭着机智勇敢总算安全返回。在入藏的战斗中经历诸多艰险，他也都化险为夷，平安度过。他甚至在西藏还交了桃花运，对一位西藏少女一见钟情，演绎出了一段非常感人的爱情故事，也成就了日后一部和西藏高原有缘的惊才绝艳之作——《艸野尘梦》。

军队进驻拉萨后，当地藏官热情邀请军官们到自己家里宴饮玩耍，中间让一些藏女骑马拔竿做表演——这是藏人常常玩的游戏，矫健的藏族女子，骑驰马上，袒露右臂，到了立竿处，俯身拔竿，以竿数多为胜。当时有一个女子，十五六岁年纪，长得端庄清秀，且矫健敏捷，连拔五竿，非常厉害。陈渠珍大概在内地看多了小脚羸弱的汉族女子，这样健美矫捷的身姿令他盛赞不已。这藏官见陈管带如此盛赞，便将这名藏女送给他。其实陈渠珍原有妻子，娶藏姬西原未必不是出于军旅无聊之心。但后来西原的勇敢高尚，和他一路上生死与共的真情，确实让他刻骨铭心。

世事多变在人意料之外，陈渠珍的军功升迁之梦很快被现实击得粉碎。1911年内地武昌起义爆发，风声很快传到西藏。因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哥老会成员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驻藏军队里许多加入哥老会的川籍将士听到反清起义的消息，开始骚动哗变。陈渠珍读军校期间就参加了同盟会，故军内的同盟会又有意推举他作为反清的首领，夺取军权。审时度势之后，他决定离开是

非之地,两边都不靠,于是写纸条托人送到西原家里,期望她和自己一起东归。西原如约而至,决心和自己的丈夫相伴相随。

当时从原路东归已经不可能,陈渠珍率领湘西新兵一连115人只好走藏北无人区,经青海去西安。可是路途中迷了路,时当冬季,北风凛寒,浩瀚的大漠似乎没有尽头,且有饥饿的野狼时刻尾随,更残酷的是他们面临弹尽粮绝的绝境,人马一天天在减少。西原忠心耿耿跟随着丈夫,不仅不是他的包袱和累赘,而且成为他打狼却敌的得力帮手。这一行人在无人藏区曾一度完全断粮,士兵们因为饥饿,心性大变,想要杀掉西原带来的藏族少年作为食物,西原坚决地阻拦了这些饥饿疯狂的士兵,自己默默拿起枪独自去打猎,猎来野狼供大家食用,陈渠珍在书中一一记下这个女性让男人们黯然失色的坚韧和勇敢。

七个月后,他们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达兰州,之前出发时的百余人只活下来7个,而到了西安,那里正流行麻疹,洁净的西藏高原无麻疹病毒,西原很快被传染,一病不起,溘然长逝,年仅19岁。当时西原被葬在西安雁塔寺,后来陈渠珍将她的灵柩运回湘西,建了墓,也算是了了西原万里从夫的遗愿。

这段时间,在对西原和往事的怀念中,陈渠珍深情地写下了《艸野尘梦》,详细叙述了他入藏的经历。这本书不光见证了一段湘西王的传奇经历,是一部精彩绝伦的传记小说,而且也是极为珍贵的清末民初西藏文史资料和军政备忘录。

雄霸湘西

再说陈渠珍办完西原的丧事,心灰意冷,终于于1913年正月底落寞地回到了凤凰黄丝桥老家。这时光复后的凤凰城里迎来了帝制推翻后民国肇始的湘西第一任长官,这位长官出任湘西镇守使,并兼辰沅道尹,湘西的军事、政治大权完全掌握在他的手上。他就是当年痛殴教官,被开除学籍后远走日本的田应诏。田应诏走马上任后正在招贤纳士物色幕僚参谋,陈渠珍的归乡让他格外惊喜,马上让他做了自己的参谋。陈渠珍向田应诏建议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湘西范围内的军事学校,军官训练团。这样才有过硬的军官,自然

也就有了具有战斗力的军队。

田应诏欣然接受,让陈主办湘西军官团,担任军事教官。这湘西军官团好比是湘西的黄埔军校,日后陈渠珍的手下得力干将多出自于这个军官团,像戴季韬、陈斗南、顾家齐都是他的学生。日后陈渠珍之所以在湘西根基稳固,无人可代,也得力于他和这些部下之间建立的深厚的师生关系。

陈渠珍接下来是如何一步步走上权力的巅峰成为湘西王的呢?

正值1916年的中国,由于袁世凯的称帝,陷入了南北军阀混战的动荡时局中。全国反袁呼声很高,护国川军和黔军正酝酿北上讨伐袁军。袁世凯也想将势力扩张入湖南。湘西这个地方又是北军南下和南军北上的必经之地,所以作为湘西的军队统帅,必须做出何去何从的抉择。面对如此复杂的时局,要做出种种重大的政治抉择,田应诏很是为难。陈渠珍为他出谋划策,湘西在这场南北混战中“暂守中立,以观成败”,既向北京那边表示忠贞不渝,又和西南护国军暗通消息,



表示同情。结果不仅保全了湘西军队的实力,又以“兵单械少”为由向袁世凯要了一千余支枪和18万发子弹。湘西地方部队——箠军实力大增。

1920年当政的湖南督军谭延闿对于主持湘西军政的田应诏很不放心,因为1919年田应诏拥护程潜拒绝谭延闿督湘。如今谭延闿当权了,他自然没好果子吃。谭延闿让他保留湘西镇守使的原职,可得把行署机关迁到长沙,同时选择了陈渠珍这个中层军官作为可以信赖的人。田应诏只好将镇守使的行署迁到长沙,湘西靖国军第一军军长的职务则交与陈代理。同时谭延闿又任命陈为湘西剿匪总指挥。从这时起,陈渠珍开始成为湘西军权的掌握者,开始走上统治湘西的权力道路。

陈渠珍手握重兵之后主要做了三件事情发展自己的实力,体现出他的谋略才干以及勃勃雄心。第一件是1920年开始湘西护国军和常澧靖国军之间的混战中,陈渠珍坐收渔利的老谋深算。

这时因为湖南督军谭延闿不与孙中山合作,受到护国湘军中赵恒惕和程潜两派军人的同时反对,无法在湖南立足,只得跑到上海去了。护国湘军于是由赵恒惕把持,这时常澧靖国军由孙中山先生的亲信,也是湖南武备学堂陈的同学林修梅直接指挥,也想在湖南扩张地盘,常澧靖国军里有不少有名的湘西战将。比如绰号周铁鞭的周朝武,他是湖南庸县也就是现在的张家界人,他精于刀术,武艺高强,曾做过慈禧太后的随身禁军。民国后他忠于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人称“江湖怪杰”,是一员猛将。而一直信仰追随孙中山的贺龙也是其中的一个团长。还有其他一些将官都是绿林出身的不怕死的战将。

赵恒惕为了消灭这股威胁到自己利益的革命力量,纷纷给湘军诸将领加官晋爵,陈渠珍就多了一顶新头衔——湖南省第十三区守备司令。按说,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既然升了官,就得好好给主子卖命。可是陈渠珍却把自己的部队布防在永顺一带便按兵不动,坐观虎斗,等到两边打得差不多两败俱伤了,他就收渔翁之利。

1921年,他趁势收编了护国湘军里被鄂西神兵击溃的张学济的旧部,其中就有后来有名的湘西苗王——龙云飞,这时只是个营长,又叫龙滕汉。在日后“倒何”的革屯运动中他和陈渠珍配

合默契,成功将一省之长何键给拉下马来。而一向桀骜不驯、具有绿林背景的周铁鞭、朱云五等常澧靖国军的军官虽然不得被收编,但对赵恒惕是口服心不服,而对于湘西“土皇帝”陈渠珍却很信服。他凭借武力作为后盾,打出“湘西人不打湘西人”的口号,不战而屈人之兵,轻而易举地收编了贺龙部队,任命贺龙为湘西巡防军剿匪第二支队的司令。陈渠珍也因与贺龙的这段交情,才有后来“剿共不剿贺”的原则,凡是同贺龙带领的红军交战,采取亦战亦和的策略,而贺龙军队借道陈的防区,陈也慨然让路,甚至贺龙队伍有难,陈也出手相救。

总的说来,这次征服常澧靖国军之战令陈渠珍的军事实力大增,达到了人枪2.5万人的鼎盛时期。也才有了主持湘西政局来和省府分庭抗礼,从此闭关自守,划地自治的实力。

体现陈渠珍谋略才干的第二件事情是剿匪。他剿匪,并非对土匪一概杀之,而是区别对待,所谓胡萝卜加大棒的软硬兼施政策。对大土匪他采取抚的方法,对散匪则剿。1921年陈渠珍进驻湘西的保靖,提出了“保境息民”的口号,对各县拥有武装的地方匪首进行招抚,对接受招抚的委任他们为团长、营长,仍然驻扎原地,维持治安。而那些小股土匪早闻风而散了。所以陈渠珍在剿匪过程中,队伍不断壮大。他真正成了统领湘西各路土匪的“土皇帝”。

就这样,经过剿抚并用的策略,湘西境内的土匪渐渐趋于平息。陈渠珍在这种相对安定的局面中,着手建设湘西。他虽然当了湘西巡防统领,却并没有逐鹿中原争霸天下的野心。在他看来,在军阀割据的纷乱时局里,只要能保境安民,做个独立的不受外来势力制约干涉的强大首领也就可以了。为此,他倾心于搞湘西自治。这也是陈渠珍权力道路上的第三件事情,那就是建设湘西,实现他的礼运大同的湘西之梦。

他开始效法当时山西军阀阎锡山推行自治。聘请梁漱溟来帮助草拟地方自治条例,分教育、实业、团防、慈善四项。他曾经对大家说:“向来武力不足恃,秦二世而亡,楚百战而败。混战多年的湘西,今已平定,为政之道,在于偃武修文,使民自治。”

在这些举措中,陈渠珍最重视的应该算是教

育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陈渠珍开始重视湘西地区教育尤其是小学教育。他认为,湘西匪患长久,要灭不易,从儿童教育始,养成“风气开通”,使“人文蔚起”,则“匪患始自靖绝”。他遣人远赴长沙聘来小学教育专家李云杭,帮助制定湘西民族地区教育发展规划,整饬并推进湘西教育。主持设立了一批教育研究机构和学校。其次,他颁布普及小学教育令,实行强迫入学。各县还必须开设幼稚园和女子职业学校。当时在保靖,民风还很保守,很多人对女儿去上学顾虑重重。陈渠珍采取措施。一次本城地痞肖伯庭夜晚在女校前面路旁解小便,算他倒霉,被拉到统领部打了几百板子,这一下任何人都不敢对女学生胡作非为。



陈渠珍(1883~1952)

扩充军队,要办事业,经费不够,正常税收满足不了需要。于是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为了广开财源他大力提倡种植鸦片,以便大收鸦片税。谁要是不种,就要加倍抽你的懒税。并且他什么都可以建设,唯一不修路。他很清楚,没有铁路和公路,中央军和省军就开不进来,不能用武力解决他,他就可以凭借天险,稳当湘西王。所以这种封闭起来的乌托邦建设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湘西,很快时局的动荡,政治的风云诡谲让陈渠珍自己都无法自保,更遑论“礼运大同”之梦了。

在抗日时期

陈渠珍还大批吸收师范毕业生,充实教师队伍,对清代遗老举人、贡生、秀才予以撤换。规定私塾也必须讲授经过审定的小学教科书,不准再讲授四书五经,否则,予以取缔。在陈渠珍治下,偏僻保守的湘西出现了现代教育,并有了初步发展。

他还注重发展实业,开办各种工厂,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为了保证湘西财政、经济独立,先后在保靖、凤凰开设湘西农村银行。他也很注意搞民族团结,争取苗民的支持,拉拢苗族的上层人物,同时实行税收的丰年多收,荒年少收,并让无业游民和军队士兵大量开垦荒地。所以当时的湘西被誉为“弦歌之声,遍及苗乡”。沈从文的《边城》中开头这样写道:

两省接壤处,十余年来主持地方军事的,注重在安辑保守,处置还得法,并无变故发生。水陆商务既不至于受战争停顿,也不至于为土匪影响,一切莫不极有秩序,人民也莫不安分乐生。

这说的正是陈渠珍治下的民国湘西社会状况。

应该说陈渠珍对于湘西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走上现代化的进程的推动还是有所贡献的,体现了他不同于一般军阀的识见。但他的政治梦想却注定了是空中楼阁,而且其中充满了历史的悖论和讽刺。比如陈渠珍在“保境安民”的口号下,要

湘西凤凰原名镇竿,自清朝康熙四十三年始就是湘西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这里常年拥有一支军队,名为“一军”,目的是为了平息苗汉冲突,保住南方苗疆的社会秩序安定。“地皆屯田,民皆兵籍”的状况,断绝了凤凰人另操他业的一切通道,只剩下以血肉之躯来换取生活这一条路子可走,连沈从文十四岁时也背起一个比自己还大的包袱去做了一名小兵。清咸丰年间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时,这支军队达到了荣耀的巅峰。俗话说,无湘不成军,无竿不成湘,正是指的曾国藩湘军中这支引人注目的军队——一军。太平天国被湘军镇压后,因功受赏的一军将领不计其数,其中最有名的就是24岁被提拔为贵州总督的省部大员田兴恕。随着清王朝统治结束,一军也渐渐丧失了威名,军队在涣散慵懒中日趋消沉和堕落。直到陈渠珍主持湘西一军,才使一军的面貌焕然一新。他不仅重视军事训练,还著《军人良心论》作为教材,强调“有良心的人拿枪才是军人,没有良心的人拿枪便是土匪。”曾经也是湘西军阀、陈渠珍秘书的大作家沈从文这样评价他的上司:“由于他那份稀奇精力,一军在湘西二十年来博取了最好的名誉,内部团结得如一片坚硬的铁,一束不可分离的丝”。

1936年,日军侵华,陈渠珍的部队被整编后上前线抗日,他则以“湖南省政府委员”的空衔移

住长沙,第一次结束了他在湘西割据的局面。湘西 军组成的陆军新编第三十四师被改编为陆军一二八师,由陈渠珍的学生顾家齐任师长,二月开出湘西,踏上了抗日的征程。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点燃了中日战火,举国抗战的序幕拉开。日寇曾口出狂言:“一个月攻陷上海,三个月灭亡中国”。然而在中国军人铁一般的意志面前,他们的美梦化为了泡影,而国民党陆军一二八师血战嘉善一战成了抗日战争中的一座丰碑。

由湘西 军组成的第一二八师的士兵们武器装备和蒋介石的中央军不仅没得比,连其他湖南军团也比不上,不仅没有重型武器,他们的步枪、轻重机枪以及“八二”迫击炮均由湘西凤凰县的小兵工厂手工制造。然而他们几乎创造了一个战场上的神话,以这样的装备抵挡了日军日夜不断的疯狂进攻,坚守了七天七夜阵地,为中国军队赢得了防守的时间。嘉善战役中作战的一二八师官兵,大部分都是来自湘西的苗、回、土家和汉族人,而且大部分是由土匪武装改编而成。毫无疑问,师长陈渠珍对这支湘西 军的苦心培育是有作用的。他的治军思想在抗日战场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1938年,随着抗战时局的变化,国民政府迁址武汉,并将进一步迁往重庆,作为川黔屏障的湘西就有了更重要的战略地位。为此,蒋介石通过张治中得知陈渠珍在湘西地方上的影响力,希图利用他来巩固湘西这道可能成为抗日前沿的防线,于是电召陈渠珍到武汉一见。

陈渠珍兴冲冲拿着张治中的亲笔介绍信前去谒见委员长,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见到蒋介石。不料蒋介石见到他只是三言两语,居高临下说了一套例行公事的话。也许此等官场应酬让这个性情高傲的凤凰人很不舒坦,自尊心大受伤害。他取消了拜见陈果夫、张群、何应钦、陈诚等人的计划,立时回了湖南。当时虽然张治中器重他,但1938年长沙大火令张引咎辞职,张治中曾力保陈渠珍继任省主席,但遭到九战区司令官薛岳的反对,薛岳兼任省主席,同时对陈渠珍颇为排挤。

这中间陈渠珍还去过重庆一次,希图再次谒见蒋介石争取前程,但他个性刚直,仍然不肯屈节求人,受到蒋的亲信陈诚阻挠。他向张治中辞

行时,张再三挽留:“委座要再见你”。陈渠珍不肯再去见蒋。张治中于是批评他:“玉璠先生个性太刚”,接着笑道:“请先生稍柔一些”。后来陈渠珍对人说:“蒋介石的住房有许多狗洞,我就不丧失人格钻狗洞,去求一官半职”。话虽如此,但仕途也基本没有希望了。

因为湖南地方长官薛岳的排挤,加上湘西作为西南门户的重要军事地理位置,不容陈渠珍以自身影响力干扰湘西政局,所以从1939年到1944年陈渠珍被迫住在贵州南川,基本上处于被软禁状态。过着造机纺织,笺书训子的生活,直到1945年9月薛岳离开湖南,他才得以回到凤凰,变卖田产,过着清贫的平民生活。他自己编制棉花和牛毛混纺的冬帽出售,从事轻微的田间劳动,过着陶渊明似的田园生活。在内心之中,他对于政治仕途也已经心如枯木,当别人纷纷劝他出山任职时,他一一拒绝,自言:“对时局徒有悲观,对事业早已绝望,对政治则毫无兴趣,对军事则有类谈虎……”

如果不是1949年湘西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三·二”事变,群魔当道,土匪们血洗沅陵,把怀化辰溪的兵工厂都给劫了,如果不是辰溪大土匪张玉琳扬言要杀掉陈渠珍替父兄报仇(他的父亲和哥哥都是土匪,上世纪30年代被陈渠珍处决),陈渠珍是不想第三次出山的。即使如此,当蒋介石托人带来信件,要陈渠珍“戡乱建国,共图中兴”,他仍然不买蒋介石的账,看信后说:“我决不给蒋介石送葬”。反而是共产党的使者,他曾经的部下、贺龙的表弟(后因贺龙案遭到迫害,自杀身亡)王尚质代表二野战军来争取他时,他十分欢迎和配合。在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七军联络部长顾凌申的复信中诚恳写道:“七十老翁何所希冀,从此得为解放区自有幸福之人民,于愿足矣”。当年风云一时的湘西王临到晚年,已经看淡风云,心如止水,只想平平静静做一个普通老百姓,安度自己的晚年。

1952年2月,作为湖南省政府委员的陈渠珍因患喉疾,病故于长沙麻园岭旧居,享年71岁。

(以上所引陈渠珍语出自陈元吉编《陈渠珍遗著》湖南人民出版社以及《湘西文史资料》等书籍)■

(作者是湖南警察学院副教授)

抗日名将孙立人

○ 陈华 综合整理

孙立人(1900.12.8—1990.11.19),字抚民,号仲能,汉族,安徽省巢湖市庐江县金牛镇人,毕业于清华大学,留学美国弗吉尼亚军校,抗日名将、军事家、民族英雄、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新一军军长。在赴缅抗日作战中,仁安羌一战以少胜多,率一团兵力击败数倍于己的敌人,解救十倍于己的被围英军 7000 余人,取得空前大捷,赢得了国际赞誉。在和美军并肩作战打通中缅公路的系列战斗中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战功卓著,被欧美军事家称作“东方隆美尔”。在两次入缅作战中,由于指挥出色,战果辉煌,共歼灭日军 3.3 万余人,是军级单位将领中,歼灭日军最多的中国将领。在国际军界和二战战史中都具有极高的声誉和评价,是“二战战史”中唯一列入“名将”榜的中国将军,而被他打败的日军也在日军缅甸战史上尊称他为“中国军神”。但在他的后半生,在台湾因人际矛盾而遭构陷,以所谓“兵变”罪被台湾当局无端幽禁三十三年,含冤而终。

早年经历

孙立人于 1914 年以安徽省第一名考取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预科毕业。后赴美留学。1925 年取得学士学位毕业后,即申请转入弗吉尼亚军校直上三年级习文史,1927 年毕业,游历欧洲,考察英、法、德等国军事。1928 年回国,在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任中尉军训队长。1930 年入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侍卫总队任上校副总队长。1932 年调财政部税警总团任第二支队上校司令兼第四团团。税警总团由财政部长宋子文一手创建,武器从美国购买,排以上军官大部分由留美学生担任。在宋子文的支持下,孙立人努力施展自己的军事才能,千方百计训练部队。他把中国

传统教育和美国军校的教育方式结合起来,制订出适合自己部队需要的训练制度和办法,形成了一套与国军其他部队不同的训练操典,被大家称为“孙氏操典”。所属部队按照“孙氏操典”进行严格训练,官兵无论是文化水平、还是学科、术科水平,乃至专门的缉私技术,都远高于一般部队。

淞沪抗战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9 月税警总团开拔淞沪抗战前线,孙立人率税警第四团防守苏州河南岸,与日军血战两周,在周家桥七次击退强渡苏州河的日军,使该地成为淞沪会战中日军伤亡最重之处。孙立人因奋勇当先,在一线血战中被日军迫击炮弹击中成重伤,全身中弹片十三处,昏迷三天不醒。急送香港接受完整治疗,始得痊愈。伤愈后,孙立人立即返回武汉,加入财政部重组之缉私总队担任少将总团长,率部迁移到贵州都匀练兵。重组之缉私总队为松沪会战之税警总团残兵,加上新募,规模 3 团,经过两年严格的训练,孙立人将缉私总队由原本之三团残兵新兵逐步扩充至六团。在国民政府急需有力部队之要求下,1941 年 12 月财政部被迫交出缉私总队半数兵力给国民革命军重组为新编第三十八师,孙立人晋任少将师长,隶属于第六十六军。

赴缅抗战

仁安羌大捷:1942 年 2 月,蒋介石按照与同盟国的协议,组成中华民国远征军,下辖第五军、第六军和第六十六军。4 月,孙立人统率新三十八师进驻缅甸曼德勒,兼任卫戍司令。当时缅甸整个战斗情势,就盟军方面来说,左翼为中国远

征军第六军,当面之敌为敌18师团,正面为第五军,当面之敌为敌第15师团,右翼为英方第一军,当面之敌为敌第33师团,新三十八师在曼德勒,无形中有东西策应的任务。

4月14日,西线英帝国缅甸军步兵第一师及装甲第七旅被日军包围于仁安羌,弹尽粮绝,水源断绝,陷于绝境。孙立人将军奉罗卓英之命,亲率113团星夜驰援,而大获全胜。仁安羌大捷是一个闻名世界的战役,是现代史上中国军队第一次和盟军并肩作战所得的荣誉,是盟军在第一次缅战中唯一的大胜仗,同时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东亚战场打得最艰险的一次大胜仗。孙立人率新三十八师在极端劣势的情况下,竟以800多人的兵力,击败数倍于己的敌人,救出10倍于己的友军。确属震惊世界的战争奇迹。

为表彰孙立人的战绩,中国蒋介石授予四等云麾勋章。美国罗斯福总统授予他丰功勋章,英王乔治六世授予他“帝国司令”勋章。凭一次战斗而获三国元首同时授勋,这是世界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莫大殊荣。也因此一战而使中国孙立人的指挥才能和军队的英勇善战享誉全球。

印度整训

仁安羌战后,英国方面决定弃守缅甸,撤往印度,新三十八师奉命掩护盟军撤退。4月下旬,英军撤过曼德勒后,继续向西逃往印度。由于英军的溃退,导致了远征军陷入日军包围。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副司令官杜聿明因对英国人的不忠感到不满,拒绝了时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要他撤往印度的指示,而执行了蒋介石令他经野人山热带丛林北上撤回云南的命令。孙立人则认为野人山属瘴疠之区,纵横千里,难以穿越。为保全官兵生命,当机立断,执行史迪威指示,率新三十八师向西撤往印度。由于日军的注意力被杜聿明率领北上的大部队所吸引,新三十八师在撤印途中比较顺利。部队装备不但没有损失,还收容了数以千计的难民和英印散兵。而杜聿明所率的第五军因遭到日军阻击和追击,丧失了穿越野人山的最好时机,给养中断,饥病交迫,半数官兵葬送于野人山中,孙将军得知后立刻派遣新三十八师搜寻并救出部分友军转而撤往印度。

5月底,孙立人率新三十八师到达印度边境。英驻印边防军要求中国军队解除武装,以难民身份进入印度。孙立人拒绝解除武装。恰巧,为新三十八师在仁安羌解救过的英联军第一师师长正在当地医院疗伤,闻知孙立人部的情况后,即前往调解,说明这是一支救过英军的英雄部队。第二天,新三十八师开进印度,英军仪仗队列队奏乐,鸣炮10响以表欢迎。

1942年8月先后到达印度的中国远征军新三十八师和新二十二师进驻印度兰姆迦训练基地,番号改为“中国驻印军”,开始装备美械和训练。10月,中国驻印军改编成新一军,郑洞国任军长,下辖孙立人新三十八师和廖耀湘新二十二师。

反攻缅甸

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开始向缅北反攻。战役开始,孙立人指挥新三十八师进攻胡康河谷。10月29日占领新平洋,12月29日攻占于邦,1944年2月1日攻克太白加,3月4日与廖耀湘新二十二师两路夹击攻克孟关。3月9日,新三十八师113团与美军麦瑞尔突击队联手攻占瓦鲁班。日军号称“丛林作战之王”的第18师团死伤过半,狼狈逃出胡康河谷。据日军战史记载:“师团长接到两军交锋报告后,判断这支敌军只是为了掩护中美军主力越境派出来的一支先遣部队,首先命令富昆南部地区的第56联队急速前进,企图将其各个击破。及至该联队到达战场交战后才搞清楚,敌军原来是中国军第三十八师(孙立人师)一支劲旅,和第18师团过去在中国大陆上接触过的中国军队,在素质上完全不同,因而大吃一惊。过去,这个九州编成,素有把握的第18师团转战中国,同中国军交战最有自信,岂料胡康河谷对阵的中国军队,无论是编制、装备,还是战术、技术,都完全改变了面貌,尽管第56联队奋勇猛攻中国军圆形阵地,在炽密的火力网和空军的支援下不仅毫不动摇,中国军虽已遭到了将近900名的损失,却仍顽强抵抗,坚守密林阵地,毫不退让。而日军的损失却不断增加。于是立即向上级报告了这个情况,使全军不禁为之愕然。”

驻印军攻占胡康河谷后,于3月14日乘胜向孟拱河谷进攻。新三十八师113团从左翼翻山越岭迂回到坚布山后方,和新二十二师两面夹击,29日攻占坚布山天险,扣开了孟拱河谷的大门。4月24日,按史迪威的计划,新三十八师和新二十二师分别向孟拱和加迈攻击前进。5月下旬,孙立人将军从缴获的日军信件中获知:由于日军第18师团主力在索卡道被新二十二师包围,加迈城内兵力极为空虚,师团长田中新一坐守空城,惊恐万状。孙立人见机而行,不拘泥于原定计划,以112团秘密渡过南高江,向加迈南面的西通迂回,切断加迈日军的后路;以113团向西进取加迈;以114团向南对孟拱实施大纵深穿插。6月16日,113团与新二十二师会师加迈,日军第18师团团长田中新一率1500余残兵仓皇南逃。6月25日,孙师114团攻克孟拱。

8月3日,中美联军克复密支那。至此,反攻缅北的第一期战斗结束。中国驻印军给日军王牌第18师团等部予毁灭性打击,歼灭日军2万多人,一雪两年前退兵缅甸的耻辱。史迪威称此战为“中国历史上对第一流敌人的第一次持久进攻战”。中国驻印军攻克密支那后,部队进行休整扩编,由新一军扩编成两个军,即新一军和新六军。孙立人升任新一军中将军长,下辖新三十八师(师长由孙立人兼)和新三十师(后廖耀湘新六军回国增援国内抗战,其五十师也编入新一军)。

1944年10月,反攻缅北的第二期战斗开始。中国驻印军由密支那、孟拱分两路继续向南进攻。孙立人率新一军为东路,沿密支那至八莫的公路向南进攻,连续攻取缅甸八莫、中国南坎。1945年1月27日,新一军与滇西中国远征军联合攻克中国境内的芒友,打通了中印公路,次日两军于芒友举行会师,作为在越南河内(时称东京)会师的前奏。随后,孙立人指挥新一军各师团继续猛进,3月8日攻占腊戍,3月23日占领南图,24日占领细胞,27日攻克猛岩,消灭中缅印边界所有的日军部队,第二次中缅印战役以胜利告终。

孙立人将军指挥所部,在远征缅甸,协同盟军抗击日本的战斗中,迭克强敌,战果辉煌,共击毙日军3个联队长以下3.3万余人,伤日军7.5万余人,俘虏大尉以下323人。缴获大炮186座,

战车67台,汽车552台,攻取公路646英里。新一军伤亡1.7万人。其运用的战术、显示的战力,备受国内外各方肯定,有“东方隆美尔”之誉;而被打败的日军在缅甸战后史料上,也尊称他为“中国军神”。

孙立人在缅甸这一国际战场上所展示的英勇善战和取得的辉煌战果,也为蒋介石挣足了面子,大大改变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而使贫弱的中国居然也能在战后雄视阔步地登上世界“四强”宝座,当仁不让地获得联合国“五常”席位。其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都是深远的。

1945年5月,孙立人率新一军返抵广西南宁,准备反攻广州。同月,应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之邀,赴欧考察欧洲战场,是中国唯一被邀请的高级军官。8月15日,侵华日军投降。9月7日,新一军进入广州,接受日军第二十三军投降,并建造新一军印缅抗日阵亡将士公墓。嗣后,新一军进行了休整和扩充,成为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号称“蓝鹰部队”、“天下第一军”。

卷入内战

1946年3月下旬,新一军乘美舰在秦皇岛登陆,同时孙立人被派往美国参加联合国军事参谋团会议。由于抗战后国共关系迅速恶化,国共两党争夺东北战事激化,蒋介石急电孙立人返国指挥新一军。5月15日,在四平街被攻陷前夕,孙立人从郑洞国手中接过新一军的指挥权。随即向四平街进攻,同时新六军廖耀湘部迂回攻占塔子山,即将切断四平守军的退路,迫使林彪率领的东北民主联军后撤。林彪执行毛泽东“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命令退到公主岭,杜聿明接到投降的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作战科长王继芳的情报,林彪战力已失,就命令所属5个军进行超越追击,孙立人一路前进,率新五十师强渡辽河,攻击公主岭,林彪又北撤,孙立人五日内攻克长春,随后又收回农安、德惠等战略要地。此时,马歇尔来华调停,向蒋介石施压,迫使国共停战。6月6日,蒋介石下达了第二次停战令,国共停战。

由于孙杜不和,杜聿明屡次发电向蒋介石批评孙立人,指责其“作战不力,骄横跋扈”。蒋介石

鉴于孙立人和杜聿明合不来,将他升为东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长官虚职。解除了他的兵权。1947年7月,将其调离东北,出任陆军副总司令兼陆军训练司令官,在南京成立陆军训练司令部,负责全国国防新军训练。

台湾岁月

1947年11月,孙立人将陆军训练司令部迁到台湾的高雄凤山,并从新一军调去几百名他在税警总团和在缅甸作战时期的得力干部,一同前往台湾训练新兵,在台湾建立新军。1949年9月1日,孙立人正式就职台湾防卫司令,第二零一师10月在金门参加金门战役。1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第二分会中提议孙立人再兼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台湾国民党当局“国防部”亦随之发表新职。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复职“总统”,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随之裁撤,孙接任陆军总司令兼台湾防卫总司令(当时陆军总司令部与台湾防卫总司令部址乃同一驻所)。1951年5月,晋升陆军二级上将。1952年4月,连任陆军总司令。孙立人整编撤退来台之国民党军,建立完善之兵役制度与预备军官制度。

孙立人对于蒋经国以政工制度破坏现代军事体制曾表达不满之意,在1950年12月,孙立人召开“新年第一次年终扩大良心会”时,致词说:“现在社会黑暗,人心不古,不但做事骗人,说话也骗人,所以社会动荡不安,就是彼此不能开诚相见,埋没了良心之故。”因此也与蒋经国的政工系统埋下了冲突伏线。

1955年8月20日,孙立人的所谓“兵变”事件公开化。当天台湾国民党当局以“纵容”部属武装叛乱、“窝藏共匪”、“密谋犯上”等罪名,革除孙总统府参军长职务。事后,组成了以陈诚为主任的9人调查委员会,查处此事。在美国军方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对孙采取“不杀、不审、不问、不判、不抓、不关、不放”的“七不政策”,以软禁代替刑罪。“长期拘禁”在台中市向上路寓所,孙立人平时有空种种玫瑰,靠家人卖“将军花”维生,直至1988年3月20日台湾“国防部”部长郑为元来到孙立人家中,向孙立人宣布,从即日起“恢复一切行动、言论的自由”。这才解除长达33年的

“监护”。有记者采访孙立人对得到“平反”有何感想时,孙立人说:“从未‘反’过,何‘平’之有?”

孙立人于1990年11月19日病逝于台中寓所,享寿89岁。灵柩安葬于台中市北屯区大坑东山墓园,鸣葬枪,吹安息号。美国维吉尼亚军校已在校史馆中将孙立人将军同另两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杰出校友马歇尔将军和巴顿将军并列,永久展览孙立人将军生前所用的军服,马靴,军帽,马鞭,缴获的日军军旗,毕业证书和画像。

情系故乡

两岸恢复交流后,虽然由于年龄和身体原因不能成行,但只要亲友回大陆,他总要托付他们表达心愿。1988年4月11日,孙立人旧部刘文美回乡探亲,给孙立人带回了一张故居照片,孙立人看后,于同年11月8日给刘文美回信:“故居所摄照片,曾一再展玩,虽旧梦重温,然感慨系之矣。”

1989年清明节后,孙立人旧部潘德辉先生回大陆探亲,将军函托他到庐江代为祭祖。“一则离家已久,对故乡思念甚殷。再则祖先坟墓不知尚完好否,亦日夜不能去心也。”潘先生回来后,有关部门带他前去月形山孙立人父母墓地(原在龙灯桥,后因当地兴修水利,将之迁往月形山)代为祭拜。

得知父母墓地仍在后,1990年3月29日,孙立人专派孙安平回来祭奠。对当地有关部门的热情接待与安排,孙安平回去汇报后,孙立人于5月中旬来信表示感激,同时表达了将父母墓地迁往故居地金牛山的心愿:“立人以身许国,长年在外,于先父母养育之恩未能报答于万一”,“为谋窀穸永安,拟由月形山迁葬于金牛镇金牛山之阳,既稍尽人子之心,而此地亦先人平昔游息之地,想千秋万岁,魂魄心能乐之以为安宅也”。虽然时间已过五十多年,透过此,我们仍能看到孙立人对故乡记忆之细、记忆之准、记忆之深,只有时刻都系念着故乡的心才能如此。有关部门帮将军了却了这桩心愿,遗憾的是,将军最终未能亲自回来祭拜。■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我在“初澜”写文章

○ 吴启文

坐落在礼士胡同中段的“创办”，是国务院文化组文艺创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简称，有北院南院之分，北院是于会泳、浩亮、刘庆棠办公的重地，非经允许不得入内。南院才是我们这个集体写作班子（笔名初澜、江天）的聚集之所。两院门对着门，北院的权贵从来不与这些普通工作人员直接接触，有什么吩咐，都由“创办”主任转达，某篇文章炮制出来，也由他送审，如再有什么指示也由他传递下来。

居住在这条胡同的百姓，就更不知“创办”是一座什么庙，里面供的哪路神仙了，但见崭新的轿车进进出出，嗅到的只是这些专车排出来的有害尾气。北院有放映室专供领导审查样片，观摩来自海外的过路片。这“过路片”的名称，至今我还不得确解，大概就是指那些群众不得接触的封资修毒草吧！我来自“五七”干校，当初在文艺黑线下的“裴多菲俱乐部”工作，记得对什么《早春二月》、《阿诗玛》、《舞台姐妹》等国产影片批判再批判，消毒再消毒，生怕流毒天下，贻害人民。现在倒好，红线专政之下，怎么连《网》、《冷酷的心》、《女人比男人更凶残》都不害怕了，难道革命已革掉了孔孟之道的“非礼勿视”，变成非礼可视了吗？

事到如今，这才若有所悟。原来一切特权的繁殖孳生，都来自绝对权力的垄断，是权力在运作过程中的再分配和延伸。一面搞所谓文革，一面欣赏过路片，搞一点内部观摩，就是绝对权力玩弄的小把戏。当然，在“创办”放映室看过路片的特权，我这“初澜”班子的人也不容问津。特权的结构看来是多层次、多侧面、多等级的。从外面看“创办”，它似乎俨然一个整体，但内中等级森严，礼法规范非常严格，未经召唤，从南院去北院，那是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随便跨入的。

礼士胡同的革命礼仪，当然会触动我的某些神经，产生一些困惑。要还原我在“创办”时的人生状态及其心态，最恰当的概括，莫过于“克己复礼”

四个字了。说起来，这又是刻骨的反讽。当时“创办”的一个中心任务，不就是批孔老二的克己复礼吗？为什么我们自己倒来奉行“克己复礼”，要求大家克个人主义之己，以便当权者来复文化专制主义之礼。这才是对礼士胡同的“礼士”二字的新解。

专制主义的极权社会，是分裂人格，产生双重与多重人格的沃土。在“初澜”写作班子期间，我就这样陷入了严重的人格分裂而不能自拔，不能自救。那时，像我这样的人，无论在口头上笔头下，都必得秉承上意，充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传声筒，实际上却像一只应声虫，在瑟瑟秋风里嘟嘟囔囔地聒噪。

“初澜”的文章，暂且不论其红与黑，它往往会跳出人们的常识范围，自然也会跳出我本人的常识范围。而我，却正是此种文章的炮制者中的一员。这样的人格分裂表现，如今旧事重提，还真叫人难为情，万分羞愧。这里先以对于《园丁之歌》的批判为例。

这出湘剧高腔小戏，反映的是小学生的校园生活，肯定了作为小学老师的辛勤耕耘，这有什么不对呢？可那时“中央首长”正要抓一个修正主义教育黑线回潮的典型，这出小戏就撞在枪口上了。那时我的两个孩子，一个上中学，一个上小学，即便我自以为革命，总还不至于希望他们在学校荒废学业，也不希望他们的老师成天放羊，不教他们念书学文化。如果这样，我为什么还要将他们送去上学？这就是一个常识问题，也是为人父母者的人之常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可是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将令之下，我这马前卒就得遵从将令，向前冲杀，决不允许所谓的园丁，以“五分加绵羊”的修正主义模式，毒害革命幼苗。于是《园丁之歌》罪名成立。作为“初澜”的成员，任务下来，我就只得克己，打消自己也在盼子成才，望子成龙的私心杂念。既然已经参与到此类革命大批判文章的炮制中来，而又不让自己的人

格分裂,不昧着天良说话,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经过集体反复讨论,一再修改,由我执笔,以“初澜”署名的这篇文章就炮制出来了,在《人民日报》的显著位置发表,各省市的党报一律转载,并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全国播出。那铺天盖地的声浪,百姓们即便可以闭目塞听,充耳不闻,但教育界与文艺界的人却不能不予理睬,自然会有本单位的领导出面组织学习讨论,并且敦促每人发言表态。我这个隐于幕后的文章执笔者,事实上成了为虎作伥的帮凶,欠下了一笔孽债。

在“初澜”班子的数年间,作为文人,最使我深感羞辱,左右支绌的,应是在关于影片《创业》问题上的自我遭遇。正是这一经历,最足以显示当时一个文人的处境有多么无奈,多么艰难,多么为人所不齿。

那是在一个严寒的冬天,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故事片《创业》停机了。“创办”指派一个三人小组,先去长影看看样片,回来再给领导写一份报告。因为这小组的其他两人是借调人员,就由我来牵头了。

长影厂来接站的厂办主任,与我有同窗之雅,彼此多年不见,相见甚欢。我们乘一辆吉普,径直开到厂区里的小白楼前,安排住下。这小白楼,在全国文艺界颇有名气,不少作家艺术家,都曾在这里住过,进行创作。反右派运动中,这里发生过小白楼事件,揪出一批右派分子,大都是影剧界的一些知名人士。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今来此,自然要引以为训。

长影的领导,在宴请我们一行之后,接着就陪同我们看了《创业》。出我意料,这部片子拍得出色,让我大为感动。它歌颂了大庆的创业精神,以铁人王进喜为主要英雄人物的原型,在题材、主题、人物的方方面面都无可非议,理当称赞宣扬,鼓而呼之。那些激情燃烧的镜头,那些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结合的处理,一切都政治正确,横挑鼻子竖挑眼,我硬是挑不出什么毛病来。我想,只要“工业学大庆”的方针不变,铁人王进喜的榜样不倒,这部影片就不会趴下。作这样的评估,应当万无一失。

在与长影领导和主创人员座谈的时候,我谈得十分动情,认为这部电影为时所需,对文艺革命可以添砖加瓦,有所贡献。会后,我们与编导和主

要演员继续接触交流,他们谈到在大庆体验生活时的感受,谈到王进喜等英雄人物的榜样作用对自己的教育,这都符合演英雄,学英雄的要求,符合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大方向。一句话,我们这个小组一致认为影片歌颂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文艺革命的一个成果。

我们三人返回北京,立即写出书面报告,对这部影片提出了完全正面的评价。与此同时,长影厂将《创业》的样片正式送审,在于、浩、刘等人看过后,也持正面看法。“创办”领导于是向我布置,要我写推荐《创业》的评论,在影片发行时配合发表。这篇文章我写得顺手,通过领导审阅打印出来,只等“中央首长”看过影片,即可送交报社发表。

谁知风云突变,我们原先的那些评估全都错了。江青看过样片后勃然动怒,指斥这是歌颂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给被打倒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翻案招魂。

一天晚上,我正在家中吃饭,“创办”的一个行政人员,风风火火跑来,要我丢下饭碗,马上跟他回去。我们径直进入北院的小放映室,银幕上正放映《创业》,于、浩、刘一班人全都在场,我如坠五里雾中,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还要再看一遍这部影片?但也有些不安,为什么要把我叫来陪看,这葫芦里装的什么药呢?

放完《创业》,接着又让我随领导进入小会议室,这才看清于、浩、刘的脸色很难看,他们并没有对影片本身再作讨论,提出任何看法,只谈怎样落实首长的指示。我于是才知道,原来《创业》闯了大祸,已被定为新冒出来的大毒草了。眼下的任务,只是如何进行批判消毒。他们布置下来,要立即在文艺界传达中央首长指示,雷厉风行,坚决贯彻。现时要“创办”评论组写出批判《创业》的文章,而这执笔的差事又派定了,还要我参加罗织《创业》罪名的上报材料。这时,不会有任何人想到我在此之前曾对《创业》持完全肯定的看法,现在要转一百八十度,这样合适不合适,我本人会不会有什么难处,反正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一切无需多言。就这么简单,我便被裹挟进《创业》事件的漩涡中来了。

这时“初澜”班子的秀才们,已被全体动员,按照中央首长定的调门,挖空心思,只是为了硬挤出《创业》的坏水,捕风捉影,只为掏出《创业》的黑

心。大家七拼八凑,东拉西扯,总算罗织出一份材料交差。而我还有一个主要的差事等着呢,这就是炮制批判《创业》的文章。这对我来说,实在太难了。我不是不明白,完成此事之日,即是自己给自己勾了个小花脸之时。在先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先写了赞扬《创业》的文章,现在又要我来写批判的文章,左右开弓,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吗!怎么道理都在自己的手里呢!尽管我本人这种万分尴尬的情形不为外人所知,尽管我主观上先前怎样,后来如何,客观上反正左右不是人,成了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

我多次叩问过自己的良心,要我老实回答,即便不幸而为文人,即便那时我真的自以为革命,也该讲一点革命的气节吧!既然我肯定过《创业》,如果错了,就该由自己认账,多多反省,总不该让我再来教训他人,俨然一副正生的装扮。这不是什么“常有理”的问题,而是强权对自身人格的践踏与凌辱。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我还常常为这不光彩的一页而懊恼。

正当我不顾人格与文格的分裂,炮制出一篇批《创业》的文稿时,客观情势又出现陡转。长影方

面对批《创业》始终不服,一直在暗中抗争。他们竟有办法通过自己的关系和渠道,将有关情况向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反映上去,邓大人随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此时正准备调整一下文艺政策,便顾不得江青脸面,批示指出此片无大错,罪名竟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建议通过发行。《创业》的风波由此平息下来了,但我却留下一个耻辱的记录。

在批林批孔、批儒评法运动中,每当我拐进礼士胡同,转转悠悠,总不免窃笑。在这礼士胡同批“克己复礼”,矛头不也是冲着我们这些“士”来的吗,而“礼”之本身,却非但没有过时,反倒复了再复,发扬光大了。那时,我一边批判他人,一边也感到自身处境的危殆,一边气势汹汹,吓唬别人,一边也胆战心寒,自轻自贱。我有些意识到了,当自己走进礼士胡同中的“创办”,其实也就是让自己走进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一个“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作者吴启文是文革时期文化部写作班子“初澜”的成员。近年来反思过往,心存愧疚,文中所述都是他的亲身经历。)

(责任编辑 杨继绳)

SIEMENS

西门子助听器

Hearing Aids

服务热线:010-84608877

SW 声望听力

www.sw-tl.com

请认准西门子听力集团授权证书 西门子听力仪器(苏州)有限公司

数字型耳背式助听器 苏食药监械(准)字2010第2460986号 数字型耳内式助听器 苏食药监械(准)字2010第2460987号

注:请认准西门子标识/请详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在医务人员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苏医械广审(文)第2010040048号

大清帝国的两道催命符

○ 袁伟时

辛亥百年,初夏时节,独坐书房,心潮翻腾,为什么一个历时267年的大帝国那么经不起风浪?自问自答,无遮无拦,只求自己信服。录下要点,公诸同好。

(一)黄花岗:损失惨重的孤注一掷

问:百年前的辛亥,够热闹的。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的黄花岗烈士的壮举以后,前仆后继,终于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帝制,不愧为历史大转折。

袁:胜利者为自己的统治制造合法性,喜欢夸大自己的功绩。国民党及其追随者书写的历史,水分太多,不足凭信。黄花岗烈士的精神当然值得敬佩;为反对专制制度献身,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但从历史进程看,辛亥革命,黄花岗起义,作用都被夸大了。

应该如实把辛亥革命看成是多种因素汇合的产物。1911年11月15日出版的《东方杂志》发表了该刊主编杜亚泉用高劳的笔名发表的《革命战争记》,对刚刚发生的革命,分析就比较全面:

“当时下有鼓吹革命之党人,而上复有制造革命之官吏;立宪其名,专制其实,商路则收归国有,外债则任意大借,代表则递解回籍,内阁则专任亲贵。凡可以离民之心,解民之体者,行之惟恐不力!又值各省水灾,饥民遍地,天时人事,相逼而来。宜乎广州之变方起于前,川省之事又继于后。……殆武汉事发,各省响应,革命军之旗帜遂翹然高举于禹域之内矣!”(高劳《革命战争记》《东方杂志》第八卷第九号。)

至于黄花岗之役,可以说是同盟会的孤注一掷。

据一些学者研究,所谓十次革命,大部分是规模不大的军事袭击,一共用去57.98万元(当时它的财务中心在香港,所以全用港币计算)。其中黄花岗起义从1910年10月12日开始筹备,历时7个月,所用资金连善后费用2万元,共达23万元,占十次革命总费用的40%。(郑宪:《中国同盟会革命经费之研究》,《中国现代史论集》第三辑第252~253页,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台北版。)

这次起义,参加者170人,殉难86人。人数仅次于1910年2月12日倪映典领导的广州新军起义(战死百余人,被捕14人),但这次死难的烈士很多是留学生和同盟会的中坚。而就后果来看,这个事件对清政府和社会的震动都不大。两广总督张鸣岐接连洋洋得意向朝廷报告:“此股乱匪歼灭殆尽,城内外商民始终均未受扰,地方一律安谧”;“粤垣乱党一律肃清,人心大定,佛山、顺德股匪均已击散”。(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四)第324、32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版。)

不宜简单地说黄花岗起义催生了武昌起义,大清王朝坍塌,另有原由。

问:不是革命推翻了大清帝国,难道他们是自杀吗?

袁:革命当然是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元勋。

没有武昌起义,这个腐朽王朝不会倒下。武昌起义最初的规模,远远比不上黄花岗之役,更与倪映典领导新军激战一天的壮烈无法比拟。但这两次起义被清政府轻而易举镇压下去了,而武昌起义一声枪响,却推倒了多米诺骨牌。原因在于半年之中,清政府的倒行逆施。

(二)拖延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后果

问:你所谓倒行逆施指的是什么?

袁：头一条是拖延政治体制改革。

清末新政，20世纪中国的第一个十年，改革推动着经济和社会向前，业绩辉煌。但是，社会危机也日益显现。废除科举加上涌向国外的留学潮，培育了知识谱系与自我定位崭新的知识阶层；由于获得经济自由而壮大的工商阶层也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公民权利意识。他们对内难以忍受无所不在的腐败折磨，难以忍受与文明格格不入的蛮横专制和民族不平等，对外深感列强欺凌而又受制于文明差距和力量对比而回天乏力。

条条愤慨汇聚为一个压制不住的要求：政治体制改革！

对大清帝国的统治者说来，这是赎罪的机会：对1840年以来的无知、野蛮决策给各族人民带来的苦难赎罪。这也是自保的机会：经济力量和文化知识特别是新知都在民间，你凭什么仍然把一切权力都攥在自己手中？越来越少人相信，遥远的过去铁骑开疆拓土的辛劳可以换得万世江山。统治的合法性已经丧失殆尽，赶紧弥补社会大裂缝，避免在大风暴中彻底埋葬自己，是最为清醒的选择。

不改革无法稳定，改革要遏制和调整统治者的利益。士绅和知识阶层的主流，深知急剧变革的负面效果，希望建立君主立宪体制，实现和平转型。他们被称为立宪派。但年青一代知识阶层中，失去耐心的越来越多，支持武装革命的力量日益壮大。与此同时，统治阶层内部也在分化，对要不要和何时实行宪政，众说纷纭。于是，改革和革命的赛跑开始了。这是决定中国历史的赛跑。

问：难道当时的执政当局连这么浅显的道理都不懂吗？

袁：他们似懂非懂。不能说他们完全不懂。1906年9月1日，朝廷下诏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拉开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可是，改革要过三道关。

第一道是认识关。

1907年开始至1908年间，民间和官僚请开国会的呼声已互相呼应。他们的意见在报刊广为传播，也一再上达朝廷。进入1909年，请开国会运动，更进入高潮，并与群众性的游行示威相结合。

立宪派要求结束专制统治，以一年为期，召

开国会。“1909年10月13日，即谘议局开幕的前一天，张謇（江苏谘议局议长）同苏抚瑞（武昌起义时任湖广总督）及立宪派骨干……进行了仔细磋商，确定由瑞联合各省督抚要求迅速组成责任内阁，由张謇出面联合各省谘议局要求召开国会。”（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第26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版。）

这些朝野精英敏锐地看到，这是事关国家兴亡的大事：“窃维国家不可以孤立，政治不可以独裁。孤立者国必亡，独裁者民必乱……非人民参预政权，则国本不立，无以靖内讷而孚众望，此近世以来代议制度所以竞行于各国也。”（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609页，中华书局1979年北京版。）

他们驳斥“或谓国民程度之未合，或谓地方情形之不同”等谬论，直截了当指明建立民主宪政体制，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康庄大道：“盖常人之情，莫不恶乱而思治，惟有所求而不得，则乱心生矣。”“如以议院通达下情，则民气毕伸，宵小自难鼓煽。”（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603～605页，中华书局1979年北京版。）

他们还尖锐地指出：“议者又谓人民程度尚有未及……此则最普通之说而尤为谬误者也。……无论何国其初开国会时，人民之程度皆非即如今日之优……故以我国今日之人民程度比较欧美，彼以有国会之故，训练已熟，经验已久，两者相形，自不免有高下之殊，然比于其国会开设之初，则固未见其远逊。”（同上，第615页。）

1905年开始，清政府多次派宗室和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支持宪政，有些报告分析深刻，提出的措施得当，至今读来仍令人拍案称奇！

看看他们提出的宪政入门的三条路径吧：

“一曰宣示宗旨。……使全国臣民奉公治事，一以宪法意义为宗不得稍有违悖。

二曰布地方自治之制。……乡官恒数十人，必以乡邑会议公举……庶官任其责，议会董其成，有休戚相关之情，无杆格不入之苦，是以事无不举，民安其业。……

三曰定集会、言论出版之律。集会、言论、出版三者，诸国所许民间之自由，而民间亦以得自由为幸福。”（《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戴泽等奏请以五

年为期该行立宪政体折》,《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112页,中华书局1979年北京版。)

简明扼要,切实可行。

不过,这些都没有说服执掌最高权力的“圣上”,他们的根本观念没有改变。

1908年8月27日,预备立宪进行三个年头后,清政府颁布《宪法大纲》,体现了统治集团所谓宪政,不过是皇室继续统揽一切,而希冀得到一些新的统治工具而已:

“谨按君主立宪政体,君主有统治国家之大权,凡立法、行政、司法,皆皆归总揽,而以议院协赞立法,以政府辅弼行政,以法院遵律司法。”(《宪法大纲》,《光绪朝东华录》总5979页,中华书局1958年北京版。)

以此为指导思想,大权独揽,不愿跟上时代、确立主权在民的观念,这是他们进退失据的总根源。

第二关,看行动。

1909年10月14日,全国21个省的谘议局成立(新疆省延期开办),同时开议,尽管仍是咨询性的机构,但它是选举产生的,成了中国民主政治的重要开端。翌年9月23日,钦选、民选议员各98人的全国性的资政院正式成立。民选议员是各省谘议局议员互选产生的。这些都是开天辟地的大事。

省以下要成立议事会。这方面也有不少进展。

第三关,关键时刻的行动。

渐进的改革当然重要。但积累到一定程度,到关键时刻要敢于飞跃。这个时光的决策往往决定政权的生死存亡。

政治体制改革聚焦在两个主要环节上:

1.官制改革,组建与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相适应的政府机构,取代原有的很不完备和运转不灵的腐朽官僚机构。

2.从中央到社会基层建立议会体系和独立的司法系统。

官制改革从1906年开始,就讨论得很热闹,大家翘首以望。4月27日黄花岗起义,被清政府轻而易举镇压下去,大大增强了统治者的信心。十天后(1911年5月8日)他们先后颁发几道关于组织内阁的圣旨,分别任命内阁总理大臣、两

位内阁协理大臣和十位各部大臣,组成所谓责任内阁。十三人中,汉族4人,蒙古族1人,满族8人,而其中皇族又占了5位。舆论称之为皇族内阁。等如一盆冷水泼下来!

看看历史背景,问题的严重性更加凸显。

按照清朝体制,各部设满汉尚书各一员。1906年11月6日宣布实行新官制,11个部的尚书,实际是汉族4人,蒙古1人,满族6人。满汉比例为六比四。而历时五年,组成的所谓责任内阁,满汉比例变为八比四,不进反退!

对于这样的倒行逆施,民间团体和社会精英们竭力设法挽救,希望朝廷回心转意。

“辛亥四月,颁布内阁官制,设立新内阁,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五月,谘议局联合会复上书请愿,以内阁宜实负责任,总理宜不任懿亲,请另简大员,组织内阁。呈由都察院代奏,不报。……六月,飭改订资政院院章。是月,谘议局联合会复请另行组织内阁,朝旨以用人系君主大权,议员不得干预斥之。”(佘父《立宪运动之进行》,《东方杂志》第九卷七号。)

两次上书被斥为越权。

政权开放,拓宽公民参政的途径,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500万满族继续霸占政权,意味着四亿汉族参政路径非常狭窄。各界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期望落空了,特别是稳健的社会精英——主张和平改革的立宪派绝望了,迫使他们走上与革命力量携手共进的道路上,中国从此多事矣!

问:难怪武昌起义与半年前的黄花岗之役不同,一下子就全国响应,各省纷纷宣布“独立”。

袁:社会精英——知识阶层和士绅早就被激怒了。

知识阶层和士绅企盼政治体制改革,集中表现在1910年年初开始的整整一年的各地请开国会运动。

1910年在各省谘议局代表先后组织的请愿速开国会同志会(后更名为国会请愿同志会)和各省谘议局联合会领导下,连续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请开国会运动。

1月16日,第一次请愿。

6月16日第二次请愿,由不同团体分别递交了十份请愿书,签名人数高达三十万人。

10月7日至9日,第三次请愿进入高潮,一些青年学生甚至割下自己的肉、切下自己的手指为代表送行。而10月5日,云贵总督李经羲、湖广总督瑞 联合致电各省督抚征求先设内阁以立主脑,开国会以定人心之意见;并于10月25日由15位督抚、将军联名上奏,请立即组织内阁,明年(1911年)开设国会。其他督抚也纷纷上奏理出同样的要求。10月3日正式开会的资政院,也于10月22日议决上奏,请速开国会。在朝野各方结合的巨大压力下,清廷不得不于11月4日下诏宣布着手组织内阁、编订宪法,提前于1913年开设议院。在清政府看来,这似乎是很大的恩典了,与立宪派的要求只差两年。但这个短短的时间差,却要了大清帝国的命。

与此同时,清政府下令不准继续请愿,并命各省请愿代表即日散归,同时禁止报刊刊登有关消息,禁止发表评论。

可是,这并没有吓到各地群众。从1910年12月4日至1911年1月中旬,以东北和直隶为中心兴起第四次请愿运动,四川、江西、湖北等地纷纷响应。冲在前面的是奉天(辽宁)的学生,12月4日,5000余学生手执“请开国会”的旗帜游行到督署,派出代表向总督锡良哭诉:“东三省就要亡了,非即开国会不能保存。”12月6日,奉天两万余人大请愿,一位报纸编辑断指血书大旗,谘议局议长吴景濂等痛哭跪地要求总督锡良代奏,与会群众在高呼“大清帝国万岁”、“皇帝万岁”、“国会万岁”的同时,也哭声震地,令锡良也感动落泪,答应代奏的要求。

这几次请愿运动说明什么?

1. 救亡呼唤启蒙。

这个时期要求民主、立宪的呼声如此强烈,直接原因不外两条:一是列强咄咄逼人。1910年,日本宣布“日韩合邦”,把韩国吞下去了;与此同时,日本和俄国订立密约划分在满洲的势力范围。另一是义和团事件后,清廷的腐朽已暴露无遗,救国的途径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2. 当时的士绅、商人、学生、市民的政治认识已经达到十分难得的高度。

随着经济发展和思想启蒙的进展,知识阶层的公民权利意识日益觉醒,自由、民主、法治已经成为舆论的最强音。从请开国会运动他们提出的

要求中,可以看出当时知识阶层特别是社会精英达到的思想高度。除了继续督促朝廷早日召集国会外,还要求开放党禁,并着手组织政党;要求参与宪法的制定;要求年内成立新内阁;要求各地继续向国民灌输宪政知识,启迪民智。

他们不是说说而已,并且积极行动。有些人提出“国会不开,各省谘议局不得承认新租税”;原定募集的赎回外债基金和支持建设海军的募款也停止了。思想文化领域的动向,与先进国家民主革命前夕十分接近。

面对汹涌澎湃的群众运动,清政府虽然被迫宣布提前三年于1913年开国会,但基本态度则是坚决镇压。

先是不准上访,把上访者赶出北京。1910年12月23日的圣旨指示:“著民政部、步军统领衙门立即将此项人等迅速送回原籍……不准在京逗留。”

二是公开恐吓和压制:“学堂学生,历练未深,本不准干预国家政治……倘再有前项情事,立即从严惩办,并将办学人员一并重处,以儆其余。”(《清末筹备立宪史料》下册第652~653页。)

三是秘密逮捕。清政府下令侦查请愿领导人,“稍有可疑,即行密拿请愿。”直隶总督即于1911年1月7日下令逮捕直隶请愿同志会会长温世霖;第二天又玩弄指鹿为马的手法,密电朝廷诬指温世霖是“乡里无赖”,“结众敛钱”,“意图煽动”,应发配新疆,严加管束!9日,清廷立予批准。(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第329~330页。)

四是一意孤行,把权力死死握在自己手中。在强硬镇压下,群众请愿短暂沉寂;4月27日的广州起义也以七十二烈士血染街头告终。清政府志得意满,甘冒天下大不韪,十天后就宣布组成“责任内阁”——皇族内阁。

政治体制改革重要的内容是现代政府机构和他们的运作方式彻底转变:机构由专制统治者颐指气使的工具,转变为分权制约、并接受公民严格监督的机关;由统治机关转变为服务机构;由信息垄断者转变为信息的提供者和开放者。这三个转变早就应该开始了,但从当时的实际操作的情形看,见不到任何转变的迹象。一切仍然取决于“上谕”,内阁无所作为。如此不堪的所谓“责

任内阁”，实际仍然视之为最高统治者比军机处还不如的幕僚。

面对这样的情况，哪能不绝望？

拖延政治体制改革的另一严重的后果之一是激发了汉族浓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满族统治者统治 260 多年，仍然没有消除民族隔膜，是由他们实行满蒙贵族处处优先的制度带来的恶果。统治型政府拒绝转型，又加重了汉族各界厌弃满族统治者的情绪。

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后，各地摧枯拉朽，纷纷宣告“独立”，那是对朝廷绝望的谏议局与革命党人合作的结果。他们在各省联手，成立“大汉军政府”。

武昌起义后，武汉军政府通告各省，开宗明义就说：

“满洲以东胡贱种，入主中原，残德相沿，几三百载，淫威虐政，未遑具论，然以神明华胄，而戴此犬羊余孽以为宗主，是亦旷世之奇羞，绝代之巨耻也。”（《武汉军政府通告各省文》，《革命开国文献》第一辑史料三第 261 页，国史馆 1996 年台北版。）

大部分省份发表的文告大同小异，华夷之辨的气息非常浓烈。

这是辛亥革命思想基础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值得庆幸的是，建立了汉族为主的政权后，早已在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占据绝对优势的汉族，理性地对待满族，很快转换语言，众口一声主张“五族共和”，除少数几个地方外，避免了民族冲突。

与民意背道而驰，清政府自己点燃了革命导火索。

（三）践踏法治引发保路运动

问：光是不准提前开国会和退出皇族内阁，还不至于掀起这样的巨浪吧？

袁：清政府唯恐自己覆灭得不够快，沿海各省的请开国会运动好不容易压下去变为潜流，又制造出西部的保路运动。

事情是从 1911 年 5 月 9 日，即宣布皇族内阁的第二天的关于铁路干线国有的圣旨引发的。5 月 20 日，朝廷又批准邮传部粤汉、川汉铁路借用英、德、美、法各银行借款合同。从清政府主观

意图看，为的是加快铁路建设，巩固边防：“川路奉命改为国有，实因民力艰难，虽竭二十年亩捐，亦不能竣事。滇藏威逼，川路不成，边防难办。”（《盛宣怀、端方致王人文电》，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第三册第 1243 页，中华书局 1963 年北京版。）过去把这一措施解读为卖国勾当，过于简单化了。

从 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在中国建设铁路就开始萌动了。动因是外国资本为中国这个大市场流涎。要不要接受洋鬼子的建议修铁路？朝野各方激烈争辩了将近三十年，闹了许多令人喷饭的笑话。1889 年，清政府终于认定，铁路非修不可。列强抓住这一机会，与抢占势力范围的野心相结合，推动筑路高潮的兴起。有清一代共筑铁路 9618 公里，其中 9254 公里是甲午战争（1894 年）以后修的，年均 544 公里，绝大部分是外国投资或借外债建成的。（1912～1927 年修了 3422 公里，年均 214 公里。1928～1937 年，包括东北，共修 7996 公里，年均 800 公里，但日本人在东北修建的占了很大部分。）当时的铁路是利润高达 40～70% 的暴利行业。1903 年开始，国人为维护主权和分享利润，也极力挤进这一领域，掀起收回铁路主权运动。湘鄂粤三省以美商违反合同为理由，要求收回粤汉路自办，终于在 1905 年 8 月以赔款 675 万美元为代价，废除了美商建设粤汉路的合同。在这个斗争鼓舞下，浙江、江苏、山东、直隶（河北）、吉林、云南等省收回路权自办运动风起云涌，并收回了一批路权。为此，1903—1907 年间，全国有 15 个省创设了 18 个铁路公司，其中 17 个是商办、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杨勇刚：《中国近代铁路史》，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57～58 页。）

其中规模最大的是粤汉铁路公司和川汉铁路公司。后者创办于 1904 年 1 月，1907 年转为商办。它的主要资金来源是“租股”，按田租 3% 收取，成为全川士绅和田主广泛参与的公司。至 1910 年止，实收股本高达一千一百九十八万三千两。（宓汝成编：《中华民国铁路史资料》第 4 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北京版。）

川汉铁路公司，本身就是新旧社会递嬗中产生的怪物。这个公司成立于 1904 年 1 月，四川总督锡良倡议创办，最初是官办公司，1907 年转为

商办。1908年聘请詹天佑为宜昌至万县段总工程师,但当时他无暇兼顾,直至1909年才上任,并推动工程在这一年年末正式开工。从章程制定、用人行政到股金收集,均由各级官吏越俎代庖。由此造成两个严重后果:

一是贪污、浪费、账目不清非常严重。

1909年11月19日,“四川谘议局整理川汉铁路公司案”的报告指出:“其开支每多浮滥,即以去年之报告而论,各局所开销至于五十余万金,寸路未修,而耗款若斯之巨”(同上。)

租股“征收之后,或握款不交,或征而不报,辗转侵蚀中饱,多入私囊。按租股征收六年(自1905年开征起至1910年止)应有1200余万两。而实收仅900余万两,足见其弊端之大。”(《川汉铁路筹建经过》,《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14页,1963年,成都。)

一年多以后,上海出现钱庄倒闭潮,川汉铁路公司存放上海的资金350万两,亏损285万余两。据两江总督和邮传部调查,其中大量是经手人诈骗和侵蚀,当时揭露有确凿证据的已达110万两。

二是工程进展极端缓慢。

在1909年秋詹天佑接手宜昌段并于12月10日开工以前,一寸铁路都没有修成。“到辛亥革命为止,已建成通车的运料路有三十余里,因桥洞未完工而尚未通车的铁路有八十余里”。(曾绍敏:《漫话四川保路运动》第7页,巴蜀书社2006年成都版。)其他路段则交白卷。

四川铁路公司的混乱,朝野早已议论纷纷,民怨沸腾,整顿势在必行。上策是监督公司自行整顿。应该在政府和议会(四川谘议局)监督下,由公正的第三方彻底清算账目,保存资产,然后从实际出发,定出整改和重组办法。可是,清政府不遵循当时的《公司律》和市场经济的正常办法,愚蠢地下令“收归国有”,而补偿办法不容股东置喙,反而让各方怨恨集中到政府身上。

据参与者的记录,四川股民认为自己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他们要求通过法治和宪政来保护自己的财产。而统治者却把经济权利的要求说成是政治问题。从5月9日“干线国有”的上谕发表,到9月7日发展至血染成都,双方兵戎相见,整整四个月,有多次挽回机会,都被清政府及其

大员断送掉了。

第一次纠错机会出现在“上谕”下达后的头一个月,各方苦求“圣上”收回成命,而朝廷一意孤行。

各方反对干线国有的函电纷至沓来,这是一场法治、民主与专制的博弈。

其中最为精辟的是四川谘议局呈请四川总督转报朝廷的呈文:

“谕旨收回干路,而川汉并非邮传部从前奏定干路(按:1907年奏定的干路名单)……乃部咨一并牵连收回,似尤未为允协。……取消商路,事系剥夺人民既得之权利,俱应由资政院议决。四川川汉铁路关系本省权利,存废应由本省谘议局议决。”(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第三册,第1269页。)

违反原有规定和民主程序,这样的“圣旨”,显然错了。

5月20日,批准在借外债的合同上签字的上谕公布后,谘议局联合会上奏章指出:

“立宪各国慎举国债,必经国会之议决。先朝钦定资政院章程,亦以议决公债之职权,畀诸资政院。不经资政院议决之国债,遵先朝之法律,原应归于无效。”(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四册第341页。)

没有经过资政院讨论,借债筑路,又是违法的!

成都各团体和川汉铁路公司的呈文则说:

“川汉铁路纯依国家法律而成立,既无收回国有之理由,恐致酿成外有之惨祸。……且按照《公司律》,非开股东大会,不能决议。似此朝旨迫切,少数股东,谁敢承认接收?……请旨飭下邮传部、督办大臣,暂勿派员接收,免致激乱人心,别生枝节。”(同上,第345、349页。)

依法维护自己的财产权,何错之有?

官办铁路是不是好呢?谘议局联合会的奏章指出:

“中国幅员之广,铁路何以必须国有?国有铁路,何以摈斥民款,而纯借外债以收回之?”“以外债造铁路,亦必以铁路受外债之害,路未成而本息已无所出,将何法以治之?官办铁路,夙称弊藪。京奉铁路,每里三万余两;沪宁铁路,每里五万余两;津浦铁路,尚不止此。以有穷之借款,供

无穷之挥霍，将何术以弭之？”（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四册第342～343页。）

四川谘议局的呈文也说：靡费侵蚀等弊端，“即官办又何尝不然？而延误之咎，尤必不尽在商办。即如宜昌购地，请督办大臣一纸告示，经年余而始下。……四川倒款之施典章，乃出于川督奏派而非商民公举之人。凡此口实，岂能一归国有，即保其净绝根株？”（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第三册，第1268页。）

这些都是非常理性请求依法办事的奏章。如果清政府也理性地响应，公布有关信息，与民众代表诚恳对话，矛盾的化解并非难事。不幸，那么平和，那么设身处地为稳定社会提出并不苛刻的建议，都没有打动执政者。

就在这个时候，资政院议员也要求召开临时会议审议有关事项。尊重民意，尊重民意机关，民主、法治的康庄大道摆在眼前。可是，在朝廷眼中，这些事：“虽属重要，尚非紧急，自可于开常年会时从容详议。”（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四册第344页。）按规定，资政院的常会在每年九月（新历十月下旬至11月中旬）召开，那时革命烽火已遍域中。机遇早已在云中飘逝！

第二阶段是8月24日开始的罢市、罢课、罢工、罢耕，四川人以现代社会司空见惯的和平示威方式，保护自己的权利了，最高当局依然无动于衷，采取强硬措施压制。

戊戌变法后，全国各地，民间团体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民间的老社团——同乡、宗亲、同业和各种慈善组织也生机勃勃。

6月17日，川汉股东走在粤汉等地同业前面，率先成立了保路同志会。背后支持这个组织的是四川谘议局的领导人。

这次四罢，是清政府强行接收川汉铁路公司的财产触发的。两个月零七天的和平交涉过去了，清政府不但没有顺从民意，改弦易辙，反而在8月8日，邮传部任命川汉铁路公司驻宜昌总理李稷勋为国家铁路驻宜昌总理，继续用川汉铁路公司的资产修筑铁路。实质是强行接收这个公司的资产，立即变为国有。股东们非常激愤，开会做出决定，撤销李稷勋驻宜昌总理的职务。清政府变本加厉，用皇帝的名义钦派李稷勋为国家铁路驻宜昌总理。股东们忍无可忍，通过决议，即日起

开始四罢（罢市、罢课、罢工、罢耕）。

这些示威活动有几个特点：

1.和平、守法。成都街头搭了许多牌楼，上面供奉“光绪德宗景皇帝之神位”旁书以光绪皇帝名义下达的圣旨中的两句话：“庶政公诸舆论，川路准归商办”；家家户户门首也贴上有同样字句的黄纸，市民朝夕焚香祷祝。

2.同抗缴租税相结合，卡住钱袋子，抓到了专制统治当局的命脉。

9月1日，川汉铁路股东会议发出不纳粮税通告，宣布“自本日起，即实行不纳正税，不纳捐输。”“布告全国，声明以后不担任外债分厘。”（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第三册，第1286页。）

3.与粤、湘、鄂等地的抗议活动互相呼应，成为全国性大规模的示威。

不过，人民走进现代社会了，统治者还滞留在中世纪。他们应对的措施是：

1.切断信息流通。严禁报刊登载这类消息，禁止电信局发送有关电报。

2.坚决拒绝民间和地方官员维持商办的请求。

在罢市和罢交捐税浪潮威胁下，四川总督赵尔丰于9月2日给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副总理）发出电报，坦陈当前局势。他说：

“川人已定宗旨，不能俯准商办，即实行停纳钱粮、杂捐，以为对待。他不具论，即兵饷立竭，势将哗溃，全省坐以自毙。”“自立宪之说鼓吹，人人有自由观念，自留东学生归来，多半狂悖言论。今藉口路亡国亡，浸润灌输于一般人民之心理，群情激愤，矢志决心。……川省有变，湘、鄂亦必继踵而起”。“总之，此事非和平即激烈，如朝廷准归商办，大局或不致十分破坏，如不准所请，则变生顷刻，势不得不用兵力剿办，成败利钝，实不能臆计。至全国受其牵动，尤为尔丰所（不）敢任咎。”（《革命开国文献》第一辑史料三第1554～1555页，国史馆印行，1996年台北县新店市。）

话说得非常尖锐，非常中肯，也非常沉痛。可是，清政府以“奉旨留中”四个大字，束之高阁，置之不理。化解危机的机会又一次丧失。

第三，不能冷静对待少数人的极端意见，抓人、杀人，导致全面的武装起义。

民众认识不可能划一,在群众运动高潮中必然出现一些激烈意见。四川保路运动中同样有这样的情况。

9月5日,有人在川汉铁路股东大会的入口处,派发传单:《川人自保之商榷书》。这份传单号召“保护官长”、“维持治安”和“一律开市、开课、开工”的同时,提出由各州县议会集议,责成城市自治机构——城区的董事会代收租税;“昼夜加工,制造枪炮”;“练国民军”;“边险地方建筑炮台”和发展“实业及教育”等主张。(同上,第1557~1559页。)赵尔丰看到后勃然大怒,认为这是一份宣布四川独立的宣言,保路运动是“阴谋革命”!(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四册第369页。)

这样的过度解读,加上他听信保路会“定谋于本月十六日聚众起事,先烧督署,旋即戕官,宣布独立”(《革命开国文献》第一辑史料三第1564页。)的谣言,导致一场血染街头的大惨剧。

1911年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以开会为名诱骗保路同志会和四川谘议局的领导人到总督府,立即“手缚绳,刃指胸”把他们一一逮捕。成都市民闻讯后,“各街民众来乞释者,由午而暮、而午夜,虽枪毙三十二人,不稍退却(督院内死二十六人,各街死六人。)”(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四册第335~336页。)

这些市民是头顶光绪皇帝的牌位,手无寸铁,向四川总督赵尔丰请求释放代表的。这样的和平请愿竟不能见容于凶残成性的赵尔丰,居然下令开枪,让鲜血染红了督署和成都街头。

当天,赵尔丰致电内阁,竟然把事情说成是匪徒数千放火和进攻督署,他“飭令兵队开枪抵拒,伤毙前锋十数人”。清政府于第二天回电:

“该署督前奏川人抗粮抗捐等情,已属目无法纪,兹复倡言自保,意在独立,尤属罪无可逭。著赵尔丰迅速查。如得有狂悖不法确据,实系形同叛逆,无论是否职官,即将首要大犯,即行正法,并妥速解散胁从,毋任蔓延为患。”(《宣统政纪》卷之五十九,文海影印本第1048页。)

7000万四川人忍无可忍,拿起刀枪反抗了;以会党——袍哥为骨干组成“同志军”,到处摆开战场。一个月后,武昌起义;11月22日,重庆宣布独立,成立蜀军军政府;11月27日,四川大汉军政府成立,四川人为埋葬大清帝国建立了丰功

伟绩。

历时四个多月的博弈,历史给了清政府多次回归法治、和平解决的机遇。只知统治人民的专制统治者,毫无自省精神,终于把人民逼上梁山。

(四)专制政权转型的历史教训

问:专制政权本性难移,它的覆没是无可挽回的。

袁:世界上专制统治转型成功的也不罕见。大清帝国转型失败的教训值得认真记取。

有清一代十个皇帝,除宣统小儿和慈禧罩着的同治皇帝外,没有荒淫的昏君。它开疆扩土,留下一份一千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大版图。入关时只有几十万人的满族迅速汉化,施政的成败得失,大体上都是汉族传统文化的体现,仁政和专制兼而有之。清朝特色的仁政是“深仁厚泽,永不加赋”;专制则是坚决维护三纲,制造空前残酷的文字狱!

其坍塌的基本原因,说到底还是统治阶层的认知与现代文明的差距太大。进入20世纪以后,执掌最高权力的专制统治者仍然是宗法专制体系的俘虏,在一呼百诺的军机处辅佐下指挥一切。而在世界现代文明浸润下,民间社会日益强大,社会精英和一部分大臣,包括部分满族大臣和皇族,已认同民主、法治。通过法治和民主程序维护自己的权益、解决社会矛盾已成为他们的共识,而最高统治者的思想仍然停留在统治臣民,用严惩首恶、分化胁从的办法去处理与民间的矛盾。先进的民间与落后的统治核心的思想文化差距,是这个大帝国迅速土崩瓦解的直接原因。

人们说,只要湖广总督瑞 或后来应召出山的袁世凯之中的一个切实卖命,局势会大不一样。须知瑞 是18督抚上书请开国会、推行宪政的领头人;而在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的体制下几乎丢了老命的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内认真推行三权分立的新政支柱,会忠实辅翼这样的专制皇朝吗?思想差距是这个末世王朝分崩离析的最深层的原因。

从1911年10月29日开始,多数省份已宣布独立,大势已去,躲在紫禁城中的寡头,才批准民主机构——资政院的请求:开放(下转91页)

三国张鲁的“共产主义”辉煌

○ 韩 起

张鲁亮相于中共八届六中全会

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批示印发《三国志》中的《张鲁传》,让中央委员认真学习。他还写了批示,一次是1958年12月7日,一次是同年12月10日。《三国志·张鲁传》573字,毛泽东两次批示,是它的三倍。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党的全会上,把一个没有多大名气的古人传记,当做为会议材料,唯有《张鲁传》。不能说绝后,但绝对是空前。

毛泽东的批示,关键的核心,只有一句话:“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而且,他在12月7日,还有一个讲话。他说:“三国时候,汉中有个张鲁,曹操把他灭了。他也搞过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的人,在饭铺里吃饭、吃肉都不要钱,尽肚子吃。这不是吃饭不要钱吗?他不是在整个社会上都搞,而是在饭铺里搞。他统治三十年,人们都高兴那个制度。道路上饭铺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一千六百年的时间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许多了。解放以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人们掌握了自己这块天地,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张鲁传》值得一看。……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

张鲁的创造,让毛泽东心仪不已,因为在毛泽东看来,这和他的理想社会模式完全一致。而当时,为了政治和宣传的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笔杆子”,故意回避了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大肆宣扬张鲁的言论,却从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中,拐弯抹角地寻找理论依据,好证明毛泽东吃饭不要钱的发明,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实践。

学习张鲁的施政方法,都可以被称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实践”,张鲁当年的作为,当然可以称为共产主义社会实践了。

我们现在要探索的题目是,为什么张鲁的“共产主义”能够成功,让人民安居乐业;而两千多年后,我们学习他的办法,反而造成了人类史上的悲剧?

张鲁“共产主义”成功的秘密

张鲁的“共产主义”很简单:一、信教的人出五斗米,便成为信徒;二、以神道治病;三、教规为法,用教规约束民众,“皆校以诚信,不听欺妄”;四、“奉道者皆编户籍,各有所属”,恢复了汉代的户籍制度;五、置义舍,即政府提供可以免费居住的招待所;六、吃饭不要钱。《张鲁传》说,“县置米肉以给行旅”,可以“行路者量腹取足”;七、修治道路,他用轻微犯法的人去修路,既降低了修路成本,同时也消除了人民的怨气(历代的劳役制度,是专制的朝廷和老百姓结怨的重要一环);八、对于犯了法的,张鲁规定“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就是先说服教育,你不听,你再犯就再教育,这样经过三次,你还不改过,才动用刑法;九、“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十、严格规定“师不受钱,不得淫盗,不得饮酒食肉”,吏治很清廉。

张鲁的这种道德治国、平均主义经济、政治纲领,“民夷便乐之”,甚至“民夷信向,朝廷不能讨”。在那个军阀混战的年代,张鲁将汉中治理得井井有条,民风纯朴,人民安居乐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为什么张鲁的“共产主义”能够成功?

张鲁是道教的一代教主。他的治国理念,直接来源于老子《道德经》和《南华经》(即《庄子》)的智慧。中国的历代统治者,只需吸纳少许老庄的管理理念,便收获了“天下大治”的果实。汉代

之文景之治,唐代之贞观之治,皆本源于此。此处因行文容量所限,无法充分展开探讨。这里仅取《道德经》第二章的一段话:

“是以圣人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做而不始,生而不有,为而不争,成功而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译为现代汉语:圣人处于无为的境界而从事,实行不言的教化,万物发作了,而不去提倡;生养了,而不据为己有;施为了,而不恃为己能;成功了,而不据为己功。正因为不居功,所以才不会离去。

这段话,主要是说给统治者听的。“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如果统治者能遵守这10个字,便可以国泰民安。这里强调的,是身教重于言教。

这一切,都是规范统治者行为的。

张鲁治下的臣民,因为信奉神灵,所以灵魂的自律是严格的。他们敬畏神明,展示大爱,不做欺天之事。老百姓耕者有其田,一时没有饭吃的人,可以到义舍吃饭、住宿。这在那个战乱频仍,生灵涂炭,饿殍遍野的年代,汉中简直便是人间天堂。

这就是无为而治。无为而治不是什么都不干。日本福田光司说:“老子的无为,乃是不恣意行事,不孜孜营私,以舍弃一己的一切心思记虑,一依天地自然的理法而行的意思。”张鲁做到了,他统治的汉中便歌舞升平。

后张鲁时代的惨败教训

公元1958年4月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河南遂平县嵒嵒山人民公社,就是仿效张鲁的道德治国、平均主义。因此,当毛泽东看到调研报告《嵒嵒山卫星人民公社简章》,如获至宝,立即批示,并在8月召开的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印发。然后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大肆鼓吹,于是,号称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极其迅速地、燎原烈火般烧遍中国大地。结果是人所共睹的大失败,全国饿死了几千万人。为什么张鲁几千年前能做好的事,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却失败得如此悲惨呢?

这里,首要的关键,是土地问题。张鲁实行的是耕者有其田;人民公社化实行的是耕者无其

田。人民公社化时代,中国广大的农民,连一寸土地都没有。《嵒嵒山卫星公社章程》明确规定:“各个农业合作社合并为公社,根据共产主义大协作的精神,应该将一切公有财产交给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当时所谓“公有财产”,主要的就是土地,还有附着在土地上的农用机械、农具、牲畜等。这就将农民的一切所有,包括人身的自由,全部剥夺了。

第二个关键原因,便是官员的表率作用。上级委任制产生的官员,他只对任命他的人负责,不会对百姓负责。

第三个重要原因,便是自由的绝对丧失。人民公社化时代,农村的管理是实行军事化的。一个人的一言一行,都受到严格的管制。离开村子都要请假,如果当天不能回家,还要开具证明身份的公函。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大钊先生说过:“自由为人类生存必需之要求,无自由则无生存之价值。”(《李大钊文集》)我们能企望既无自由,又无财产,连生存价值都没有的一群奴隶,去促进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发展吗?

第四个重要原因,是灵魂世界的败坏。公元1949年以后,中国大地强行推行无神论,宣扬“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无所畏惧,就可以“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孔子说,人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无所畏惧的人天不怕,地不怕,人类没有了道德底线,什么丧尽天良坏事都可以眼也不眨一下地干出来。

结 语

现在我们可以回首探索张鲁现象了。成功和失败,并不复杂。一言一蔽之,就是私有产权的根基。张鲁的成功,人民公社的失败,盖在于此!

当然,站在今人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还有更多、更重要的原因。直截了当地表述,一个社会,欲天下太平,办法只有两句话:权力必须是公共的,财产必须是私有的;反之,则天下大乱,生灵涂炭。■

(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陕西作协专职作家,一级作家)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戈尔巴乔夫与苏联解体

○ 王铁群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接掌的苏联已处于严重危机之中：

政治上专制腐败。最高苏维埃只是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所有事务的决定权都掌握在几个党魁尤其是总书记手里。在《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结束语中，戈尔巴乔夫写道：“我担任苏共总书记一职时，我拥有的权力可以和专制帝王相媲美。”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各级官员群体实已堕落成特权阶层。现实社会充斥着对人的尊严的无耻践踏和逍遥法外的胡作非为。

经济上停滞不前。以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和牺牲农民、农业甚至国民幸福为代价，换回了表面光鲜似与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称号，实际上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安德罗波夫当政时曾用情报系统调查国家经济真实情况。他已不相信政府统计局的数字。克格勃向他报告的资料显示：20世纪70年代苏联经济开始走下坡路。1982年苏联经济增长率是零。工业劳动生产率不到西方先进国家的1/3；农业劳动生产率是西方的1/5。再加上入侵阿富汗，耗费大量军费，民众生活水平连年下降。

文化上思想垄断。苏共对社会舆论和思想文化实行严控，书报检查制度剥夺了公民的言论自由、创作自由，大众传媒成了官方操纵和摆布人民思想的宣传工具。70年代流传“《消息报》上无消息，《真理报》上无真理”的话，是苏联社会万马齐喑的真实写照。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不仅在经济上实行公有制，也把人民的思想国有化了。

戈尔巴乔夫在一次演讲时提到，他在接掌国家权力时，苏联已经腐败僵化：“完全由中央控制的国家所有制，无处不在的独裁的官僚主义体系，政治上的意识形态控制，社会思想和科学中的垄断，吸走我们最好的资源、包括最好的智力

资源的军事化工业，难以承受的军事开支危害着我们社会的进步，我们也曾为此骄傲。后果是，我们的社会在经济和精神两个方面正在衰败下去。然而，对于一个漫不经心的观察者来说，这个国家看起来仍是一副相对健康、稳定、有秩序的图景。在宣传魔力错误引导之下的社会很难知晓正在发生什么，它所面临的最近的将来是什么。最微弱的抗议的表示也被镇压下去，绝大多数人将抗议者视为异类、诽谤者和反革命。这就是1985年春天的形势，还有着巨大的诱惑力让人们维持现状，只做一些表面的改变。这就意味着继续欺骗我们自己和人民。”

面对苏联这样的社会现实，戈尔巴乔夫何去何从？

人们发现，正是戈尔巴乔夫的价值观念以及领导实施的几个关键性改革措施，推动和加速了苏联的解体。

1. 民主价值观念是改革的原动力

“我也可以不改革。”戈尔巴乔夫回忆说：“制度本身还具有稳定性，再维持几十年是可能的。”确实如此。戈尔巴乔夫登上权力顶峰时才54岁，而且身体健康。只要他握紧帝王般的权力，拒绝政治改革，利用垄断的媒体把自己打造成英明领袖，镇压一切反抗，完全能够墨守成规地干他几十年甚至一直到死。

早在执政前，戈尔巴乔夫就产生了对苏联制度进行彻底改革的意念。1983年5月戈尔巴乔夫出访加拿大时，与时任苏联驻加大使亚·雅科夫列夫进行过深谈。亚·雅科夫列夫撰写的《“改革新思维”与苏联的命运》一书提到，戈尔巴乔夫那时就认为，苏联社会必须“改头换面，彻底改变自己的性质”。戈尔巴乔夫说：“不过，我只是在1983年以后才否定关于苏联制度等同于社会主义、体现出社会主义优越性这一看法的，而且不

是一下子就否定的”(见阿尔奇·布朗:《戈尔巴乔夫改革与五个转型》)。

戈尔巴乔夫在演讲中提到:“当我同意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时,我认识到我们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生活下去了。”

随着改革的进展,戈尔巴乔夫的民主理念越发坚定。戈尔巴乔夫的高级顾问、总统助理阿·切尔尼亚耶夫在《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一书说:“他是单枪匹马去推倒庞然大物的,而且是自己决定这样去做的,甘愿自己冒很大的风险,置他已经拥有的可使人心满意足的政治地位和良好的物质条件于不顾。”

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的结束语里说:“我从许多人那里听到一种意见,说戈尔巴乔夫最大的错误在于他把权力拱手让出去了。这被看做是软弱的表现,是一次非常严重的失败。的确,迄今为止,在所有的价值衡量表上,丧失权力的统治者都是失败者。对于这一点,我有不同看法。我不仅有思想准备,而且实际上我有意识地把事情办成这样,即到了一定的阶段,届时稳定的民主制度已经建立起来,我国的最高权力机构也就可以易手了。”

可见,彻底的改革不是突发奇想,而是既定思维和价值观念决定的。

2. 整顿干部队伍贯彻改革意图

毛泽东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戈尔巴乔夫非常重视干部队伍建设,为了组织改革的坚定力量,他上任之后便根据对改革的态度,大胆调整和整顿干部队伍。时任美国驻苏联大使的马特洛克在《苏联解体亲历记》一书中说,“戈尔巴乔夫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计划控制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一俟就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就竭力设法控制政治局。”戈尔巴乔夫上任半年左右时间,便免去了吉洪诺夫、罗曼诺夫、格里申等人的政治局委员职务,提升了利加乔夫、雷日科夫、谢瓦尔德纳泽等4人为政治局委员;更换了部长会议主席和6位副主席,撤换了40多名党中央和政府的部长,撤换了近50名共和国州委第一书记。中下层干部也进行了大范围的调整和整顿。戈尔巴乔夫的这一措施,为推行改革创造了重要条件。

3. 强调公开性,解除舆论控制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虽是全方位的,但他把主要精力集中到政治改革上,因为政治制度具有决定作用。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是以公开性拉开帷幕的。他说:“苏联共产党坚决让党和人民知道一切,公开性原则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所决定的”。

公开性的推行,势必要打破舆论控制。统一思想,钳制言论,是专制社会欺骗民众、维护特权的普遍招数。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中说:“从莫斯科直到最遥远的边疆,无论是党报还是工会、共青团、作家协会的报纸,甚至连渔民、猎人、老战士组织的报纸在内,不管是什么人办的,反正是宣传部凌驾于所有报纸之上。那时候全体编辑都相信党的规定是正确的。每月一次或两次在中央宣传部举行与总编们的碰头会,有时部长会议副主席和一些部长也前来参加。会上对报刊发表的文章提出表扬或批评,指示应该写些什么和怎么写。凡有关报刊的刊期、印数、栏目等事项的任何变动,均需经党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央委员会机关日常‘追踪’发表了些什么文章,督导员向领导报告自己的观察结果和评价,驯服听话的人得到鼓励,爱挑刺儿的人受到严惩。”

舆论一律和舆论统制,剥夺了苏联公民的言论自由和艺术家们的创作自由,举国上下呈现全民思想一致的虚假现象。戈尔巴乔夫大声疾呼:人们有权“了解有关过去的全部真相。必须废除关于档案的禁令,使任何文献都成为公开性的财富,如实地恢复我们所经历过的一切的本来面目。”

1988年4月17日苏官方报纸《文学报》第一次透露在斯大林时期有5000万人被杀害或被判处劳改,约占苏联人口总数的1/4。

1988年6月苏联《新世界》月刊发表文章,批评列宁废除私有财产和建立劳改营制度所犯的一些严重错误,认为列宁为斯大林的中央计划管理体制和实行大规模镇压奠定了基础。

公开性使原来被出版检查打入冷宫的作品纷纷出笼,一批揭露集权体制给苏联人民造成灾难的影视作品、文学作品、历史著作以及一大批遭到迫害流亡国外的思想家的著作得到开禁。在面对这些被强行尘封的思想与智慧时,戈尔巴乔

夫回忆录写道：“当时我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真可惜，大学时代竟然没能读到这一切！是的，我们这一代人缺少精神营养，只准许吃一份单纯意识形态的可怜口粮，却被剥夺了亲自去比较、对照不同流派的哲学思想并做出自己选择的机会。”到1988年底，数千部以前被称为特殊作品的著作同读者见面。

公开性的实行，使苏联人民第一次有可能了解自己国家的真实历史，他们知道了二战前夕《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议定书、二战期间屠杀波兰军官的卡廷事件、苏英划分东欧势力范围的百分比协定等苏联官方讳莫如深的历史事实。人们知道了苏联军国主义化的真相：“原来，军费开支所占国家预算的比例并非16%，而是40%！军事工业系统的产值占社会生产总值的比例也不是6%，而是20%。250个亿的科研总经费中，将近200个亿都用于军事设备的研制。”（戈尔巴乔夫回忆录）重新考察苏联历史和现实，人们犹如从一场持久的神话般的梦里觉醒过来。

实行公开性的结果，解除了舆论统制和舆论一律，在苏联历史上出现了从未有过的言论自由和社会舆论。拿破仑说过，世界上有两种力量最大，一是剑，一是思想。而思想力量更大。

4. 实行自由选举和多党制

戈尔巴乔夫回忆说：“从1988年春到1990年初”，“我们在创纪录的短时间内进行了自由选举，建立了议会，实行了多党制，使组织反对派成为可能——一句话，使社会有了政治自由”。

1988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第19次代表会议上指出，十月革命后“取缔非共政党和取消言论自由，是同民主决裂的鲜明标记。”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政治体制是“党国”的极权主义制度，“我们现在所遇到的许多困难，其根源也都在这一体制。”他指出，现行的政治体制“口头上宣布实行民主原则，行动上搞的却是独断专行，在讲坛上颂扬人民政权，而在实践中搞的却是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他强调解决苏联问题的关键是对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沿着深入且持续的民主方向前进”。

在这次会上，戈尔巴乔夫首次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概念，实质内容是建立“真正的人民政权制度”，实现社会公正。进而，戈尔巴

乔夫提出“党的地位不应当依靠宪法来强行合法化”，“苏共要严格限制在民主程序范围内”去争取执政地位。

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民主化的多项决议，会议决定进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公开竞选，在竞选的基础上建立拥有实权的最高苏维埃。

1989年春天，苏联第一次实行了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部分差额直选。出现了助选的刊物、集会和电视辩论等新事物。通过民主选举，20%的非党人士获得了胜利。一位评论家说：“尽管存在着不公正、作弊、非民主的结构和幕后操纵，但是这次选举将作为苏联人民在整个共产主义统治时期所见到过的最民主的选举而载入历史。”1989年5-6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新的最高苏维埃，由于民主选举的结果，新的最高苏维埃已不再是表决机器和橡皮图章，他们对总理雷日科夫所提名的8名部长表示了反对意见，初步显示了苏联议会的作用。

公开性和民主化，使苏联社会出现了许多非正式组织和团体，从1988年到1989年，非正式组织从3万个猛增到6万个。许多非正式组织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纲领并且开始按照政党形式活动。

1990年3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正式废除了宪法第六条关于“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苏联社会政治制度以及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等规定，苏共不再有法定的领导地位。戈尔巴乔夫在会上说，宪法的这一修改“……开创了我们社会民主发展的新阶段。从现在起，苏共将同其他政治组织平等行动，参加选举，用民主手段争取组成联盟和共和国政府以及地方政权机关的权力。”

1990年7月苏共举行第28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纲领性声明》，规定苏共“放弃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垄断主义”，并准备在多党制条件下同其他政党和运动进行竞争和合作。

苏共28大以后，苏联正式宣布“结束政治垄断”，实行多党制。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措施，终于导致各加盟国家纷纷掀起民主浪潮。

1991年8月执政74年的苏共下台。1991年

12月,随着独立国家联合体的正式建立,苏联正式解体。

随着苏联的解体,戈尔巴乔夫也失去不受制约的权力,并迅速“边缘化”。他将国家推上了民主之路,自己则成了普通公民。1991年12月14日,戈尔巴乔夫对美国《时代》杂志记者说:“就我的工作而言,我一生的主要目的已经实现。我感到安宁。”

2006年春天,戈尔巴乔夫在75岁生日前夕接受了记者采访,回首往事,他为自己完成历史使命而庆幸。他对记者说,“我问心无愧”。他认为自己推行的改革与新思维是一场和平的反集权

主义革命。他对《莫斯科共青团员报》记者说,他当年发动改革的动机是“摧毁否定民主和依靠专政支持的社会主义模式”。

“民调显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赞赏我为俄罗斯所做的一切。”2008年3月,戈尔巴乔夫接受美国《时代》周刊记者专访时说。

戈尔巴乔夫不用良知做代价追求权力和地位,而是颠倒过来,用这些去追求良知。他的行为留给世人诸多启示。■

(作者系河北大学马列教研部教授)

(责任编辑 杨继绳)

(上接85页)党禁,大赦政治犯,颁布符合现代文明要求的真正的宪法,实行宪政。三天后(11月2日)颁布的《宪法十九信条》,以中规中矩的现代君主立宪的政治架构昭告天下。但是,来得太晚了,统治核心的公信力完全破产了,庄严的承诺,成了人们不屑一顾的废纸。他们的垮台不足惜,重建稳定的现代社会秩序的历程,那么漫

长,那么沉重,那才是中国人心头难于抚平的创伤!

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当机立断。这就是大清帝国留给后人的最重要教训。

2011年6月6日星期一写完■

(作者为中山大学资深教授)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图 书 介 绍



建国以来,政治运动发动得还少吗?1951—1952年是“三反”、“五反”,1957年是“反右”,1959年是“反右倾”,1963—1966年是“四清”,1966—1976年是“文革”,中间还有“镇反”运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意识形态领域批判运动等等,哪一次毛主席他老人家不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结果呢,运动来运动去,问题总也解决不了,最后还要搞“文化大革命”。“文革”搞了十年,要多长有多长,要多彻底有多彻底,除了造成数不清的冤假错案,使国民经济的发展严重滞后以外,究竟解决了什么问题?

《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辑录了历次运动中一些较典型的亲历者的回忆,作者包括李雪峰(原政治局候补委员、前北京市委书记)、萧克(上将)、李新(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慎之(原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龚育之(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党史室副主任)、韦君宜(著名作家)、于光远(著名学者)、李锐(原毛泽东秘书)、李昌(原中纪委副书记)等。看一看这些亲历者的回忆,体会一下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凡有人性、有良知者,谁会期望通过“七八年再来一次”的这种毫无理性可言的运动,来解决我们面前那些令人愤愤不平的社会问题呢?

1980年,一位意大利记者在采访邓小平的时候,曾经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即你们今后将如何避免再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邓小平回答说:“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很多年了,“文革”对社会进步的毁灭和对我们个人灵魂的虐杀,早已被一浪高过一浪的经济大潮冲刷得痕迹模糊了。

邓小平1980年对意大利记者的谈话显示,他对这个问题也早有认识,解决的唯一办法,就是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一切问题要通过民主监督和法制建设的办法有序地解决。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再搞“文化大革命”那一套。遗憾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狠抓了经济建设,实现了经济上的腾飞,但却没有能够下大力气及时建立起一套比较完善的、并且是行之有效的民主监督制度和法律保障制度,致使无序竞争恶性发展,权大于法的现象比比皆是,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党的十五大已突出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中国实现经济发达、政治清明的唯一方法,只能照邓小平当年讲的那样,摒弃一切沾染着封建主义痕迹的制度和体制,真正使我们的国家走上民主和法制的轨道。

(定价28元,邮资7元,汇款地址见本刊址)

代购代邮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 费
李锐反左文选	李 锐	22.80	6.00
天安门 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	史景迁	19.60	6.00
高岗传	戴茂林、赵晓光	59.00	7.00
西路军——河西浴血、生死档案、天山风云	冯亚光	126.00	12.00
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	施用勤译	58.00	8.00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	150.00	12.00
苏联真相——对 101 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陆南泉黄宗良等	246.00	20.00
难忘一九五〇——志愿军入朝参战 60 周年图文实录	丁 伟	48.00	7.00
中国国情读本	中国年鉴社编	30.00	6.00
我这九十年——一段革命家庭的私人记忆	任均口述王克明撰写	38.00	7.00
国学大师之死	同 道	29.00	7.00
人生三路向：宗教、道德与人生	梁漱溟	28.00	6.00
走向革命 细说晚清七十年	雷 颐	29.80	7.00
最后的皇族	龙翔 泉明	38.00	7.00
我与中国民主同盟	梁漱溟	43.00	8.00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杨奎松	88.00	10.00
何方谈史忆人 纪念张闻天及其他师友	何 方	39.80	7.00
直译中苏高层会晤	顾达寿口述 郑少锋执笔	28.00	6.00
党员、党权与党争	王奇生	48.00	8.00
望九琐忆——一位老者的 20 世纪	白永达	22.00	6.00
底层的叩问——肖复兴人生笔记	肖复兴	25.00	6.00
国家记忆	章东磐	98.00	10.00
地狱门前——与李真刑前对话实录(内部发行)	乔云华	58.00	8.00
王光美私人相册	罗海岩编著	42.00	7.00
共和国大审判(二)——特别法庭内外纪实	王文正口述 沈国凡采写	38.00	7.00
蓝衣社——中国法西斯运动始末	丁三著	32.00	7.00
大国悲剧 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	49.00	8.00
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	金以林著	48.00	8.00
红墙知情录(一二三)	尹家民	95.00	10.00
历史：何以至此	雷 颐	28.00	6.00
直言无悔——我的“右派”经历	徐 孔	29.80	6.00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	沈志华主编	148.00	12.00
苏共亡党十年祭	黄苇町	26.00	7.00
三野名将	吴东峰	28.00	7.00
四野名将	吴东峰	28.00	7.00
张闻天在 1935~1938	张培森主编	17.00	6.00
张闻天与二十世纪的中国	张培森著	20.00	6.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蒋介石日记解读	杨天石	60.00	8.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蒋介石日记解读	杨天石	38.00	6.00
“中间地带”的革命	杨奎松	54.00	9.00
抹不去的记忆 老三届新三级	张 琦主编	48.00	9.00
牛棚杂忆	季羨林	29.00	7.00
烙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体记忆	林贤治主编	38.00	7.00
中南海人物春秋	顾保孜	78.00	7.00
元帅大将的最后岁月	李立宁 孟新	48.00	7.00
历史大转折中 22 个首任省长、市长和自治区主席纪实	孟庆春	49.80	7.00
最缜密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	侯井天	98.00	11.00
1957 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朱 正	26.00	7.00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吴 思	28.00	6.00
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	吴 思	28.00	6.00
国史札记(史论篇)	林蕴辉	38.00	7.00
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	萧 克 李 锐 龚育之等	28.00	7.00
流逝的岁月——中央党史研究室前副主任李新回忆录	李新著 陈铁健整理	39.00	8.00
官场怪圈定律	李茗公著	46.00	8.00
走出个人崇拜	冯建辉	16.50	5.00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薄一波	88.00	11.00
夹边沟记事	杨显惠	34.00	7.00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沈宝祥	39.80	8.00
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	戴 煌	21.00	5.00
1978 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	于光远	36.00	7.00

《高岗传》 这是国内出版的第一本关于高岗的传记。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高岗曾是红极一时的人物，作为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从陕北到东北再到华北，在不同历史时期，他曾先后任西北中央局书记，第一野战军政委、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新中国建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计划委员会主席等要职。在高岗进京担任计划委员会主席后一年多的时间，便背上“反党夺权”的罪名，落得身败名裂，自杀身亡的悲惨下场。

“高饶事件”亦称“高饶反党联盟”，是建国后党内斗争的第一个重大事件，高岗的死亡并未使得该事件平息，相反围绕着“高饶事件”的风波却再三发生，1955 年 5 月的“饶、潘、扬反革命集团”；1959 年的庐山会议，在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时又演变为“彭高联盟”。

本书是作者磨砺了十五年的心血之作，力图拂去岁月的灰尘，还原一个真实的高岗。

《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作为十月革命的直接领导人、最主要的领袖，托洛茨基在二月革命爆发后直到 1918 年 1 月间做了大量的演讲和报告。本书收录的文章和报告不仅全面细致的展现了托洛茨基的思想脉络和重要活动，而且也对革命的意义和得失进行了反思和总结，不失为研究十月革命进程、细节和影响的第一手材料。

《西路军》西路军是党史上的一件大事，西路军西征的起因是什么？失败的历史原因有何复杂性？应当怎样评价他的历史作用？本套书完整、系统地记叙了西路军的悲壮征程。

《“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 本书比较完整和系统地讲述了中共夺取政权的决策过程和影响其决策的种种复杂的内外因素的作用。它清楚地说明，中共革命的成功和新中国的由来，很大程度上都是得益于整个世界大环境和国际政治理念的改变，包括俄国革命、二战及战后国际关系的改变，得益于毗邻的共产党政权的大力援助。具体到中国，对于正在崛起的毛泽东来说，还离不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日本入侵的影响。否则的话，在接连遭遇了 1927 年和 1934 年惨重失败的中共，何以能由极度弱小而一步步壮大？原本足够强大的国民党，何以会一步步削弱、瓦解，以至于无法适应战后的新形式、新条件，最终竟被中共所推翻？

《李锐反左文选》 1957—1978 年的 20 年，中共走了一条漫长的“左”的错误道路：反胡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四清”社教，直到十年“文革”灾难。历史上“左”造成的恶果甚多，其中整人（往死里整）是最大的恶果之一。

了解中国政治，必读李锐文章。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69 号

邮 编：100045 收款人 北京炎黄春秋杂志发行部

(注 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 10%付邮费)

个人出书、单位出书约稿通知

一、约稿范围

- 1、**文史类书稿** 回忆录、自传或其他人物传记,年鉴、地方志、历史与文化记录、历史事件实录、或其它历史纪实作品等;
- 2、**社科研究著作书稿** 社会科学研究、人文与伦理、历史研究、哲学与思想、文化与民族等研究著作;
- 3、**文学类书稿** 散文、诗歌、杂文、时评、游记、通讯、人物传记、报告文学等个人专著、作品集;
- 4、**小说类书稿** 历史、当代商战、言情、武侠、反腐等各类题材的长篇、中篇、短篇小说集作品;
- 5、**美术类书稿** 绘画类:中国画、油画、水彩画、水粉画等作品集;书法类:毛笔、硬笔、篆刻等作品集;摄影类:风光、人物、旅游、收藏等专业或业余摄影作品集。
- 6、**其他学术研究著作** 行政管理、经济管理、企业管理、教育教学等领域学术研究著作、论文、各级课题研究成果等;
- 7、**博客博文** 各类题材以及不限体裁的博客作品集、网络专题作品集。

二、书稿要求

书稿为个人专著、也可为多人合集。个人专著可以由单独的作品或若干篇合集组成,字数应达到6~8万字以上;多人合集可以由2~10名作者的作品组合而成,每位作者单独或多篇作品字数应达到3万字以上。

三、出书办法

与出版社合作,以图书形式陆续出版。其中国内出书的,由国内相关出版社出版,国家标准书号,国家新闻出版署备案查询;根据作品和作者意愿,可以丛书形式出书(如:社科文献丛论、探索文库系列)和单独出书。书稿达到出书水平的,按合作出书方式的办法;达到畅销书要求的,签订标准出版合同,按版税或买断方式支付稿酬的办法。

四、其它事宜

1、保证尊重作者著作权,签订标准合同;2、约稿、征稿长期有效,来稿来函将在一到二周内回复;3、来稿请勿寄原稿(手稿),保证字迹工整、清楚,已编好目录、顺序;4、书稿经审阅,如达到出书水平,我们将及时通知作者。如经审阅不符合要求,作者可要求退稿(挂号或特快退回,须自付邮资);5、寄稿须知:书稿打印、复印、剪贴、抄写、磁盘均可,发电子邮件(E-mail)更佳,来稿时附彩色近照一张,200字内简历一份,注明联系地址、电话;6、未尽事宜,欢迎来人、来函、来电联系。

24小时全国免费投稿热线电话:

400-680-8368

北京东方朝阳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投稿地址:北京朝阳区八里庄东里3号654信箱(邮编100025)

在线投稿:bookbj@126.com

咨询电话:010-57733086、57733087、57733088

传真:010-89506878

联系人:伽悦、文馨、高晶(编辑)

约稿详情请浏览网站:

<http://www.zuojiaaba.com>

作品欣赏、展示

请登录网站:

<http://shop.chinesezj.com/>

最新作品展示

更多作品展示敬请登录我们的网站



文史类:《哲学大师冯友兰》



社科·心理研究类《人体波动原理》



长篇小说类:《梦幻终点》



美术·绘画类:《虎姐历险记》



生活·美食类:《中华厨品大典》



社科·励志类:《第七大营养素》



三千元五十本起编辑出版

家史·家谱·回忆录

出书范围

- 1、个人文集：诗文、小说、杂文、随笔等单集或合集。
- 2、回忆自传：革命、受难、创业、怀旧等回忆录、自传。
- 3、先辈遗文：先辈遗文集、先烈纪念集、家族先贤传、家史档案。
- 4、家史传记：家族百年史、家族大事记、家族老照片、家谱族谱等。

服务流程

作者来电说明打算→编辑部寄发参考样书→作者寄送稿件图片→公司核算成本价格→协商签约支付定金→电脑录入编排校对→寄送大样作者初审→专业编辑审改→协商设计封面插页→排版设计制作样书→作者终审签字付款→出版印刷送书。

基本价格

“个人文集、回忆录、自传”一般32开本，“家史传记、家谱族谱”一般16开本，封面与照片铜版纸彩印，内文黑白胶印，胶装或线装；二百页出版50本三千元起，设计、排版与加印彩页费用另行计算。

相关说明

所出书一般没有书号，只用于交流与赠送；北京客户上门服务。外地客户来电详询赠送样书。

老人出书，历史见证；家族出书，文化传承！

服务电话：010-68920114 68920399

单 位：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公司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图书城25号（家史·家谱·传记书店）

登陆网址：《个人出书网》（www.grcsw.com）《家族出书网》（www.jzcs.net）

人人出版

全国免长话费咨询
400-668-0650

愿人人都有作品传世

北京天禾佳诚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是国内一家从事图书合作出版的文化公司,公司成立以来与多家出版社建立了密切业务关系。

业务范围:

- 个人出书:诗歌、散文、小说、生平传记、学术著作等。
老人出书:回忆录、自传、诗词、散文、思想理论著作、书画图册等。
家庭出书:家庭照片画册、家史档案、家谱族谱、先辈遗文、家族音像等。
学生出书:优秀作文集、书画作品集、学生纪念集、孩子成长图册等。
学校出书:教学经验谈、教研论文集、名师纪念集、名校成就图册等。
博客出书:个人博客作品集、网络专题作品合集、社区网文集等。
旧书翻印:旧书急用少量翻印、书刊资料整编重印等。
电子音像:音乐、戏曲、录像摄影、光盘复制、磁带复制等。

另有:合作出书 常规出书 宣传推广 合作教材 录入排版设计 著作署名/挂名/编著

出书类型:

- A类:国内出版社出版,国家标准书号,可在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备案查询。
可在国内主渠道(新华书店等)发行销售。
B类:无书号出版,用于交流与赠送,不进入书刊发行渠道,数量一般在300册以内。

基本价格:

- 大32开本:封面用250克铜版纸,赠送勒口,内文用70克蒙肯纸或胶板纸。200页出版100本三千元,300页出版100本四千元;排版、设计与增加彩页费用另行计算。
- 16开本:封面用250克铜版纸,赠送勒口,内文用70克蒙肯纸或胶板纸。200页出版100本四千元,300页出版100本五千元;排版、设计与增加彩页费用另行计算。

(注:A类型出版的书,1000册起印;所有书籍无论开本印量越大越便宜。)

服务流程:

作者来电说明书稿详情(如需要公司寄送参考样书)→公司报价→签约支付定金→电脑录入编排校对→报送出版社(如需正规出版)→出版社三审三校(如需正规出版)→邮寄样书→作者终审签字付款→回邮样书→印刷送书(附赠成书光盘)。

欢迎“组稿代理”与“项目合作”

目前,中国中产阶层不断发展壮大,传统文化精神逐步回归,民间文化、家族文化的搜集、整理与出版渐成热点:本公司大力开拓民间文化、家族文化的网络数字传播与纸质书出版业务。尤其自(学生出版网)(老人出版网)(人人出版网)(出版发行网)开办以来,深受离退休老人与各地文联、作协、民间作者、学校老师和家长的欢迎,每月编辑合作出版作品近百余部;为方便作者就近洽谈与交稿,我公司设立“地方组稿代理”与“编辑出版分站”,请有写作经验与组稿能力的单位或个人洽谈合作。

出版服务热线:010-58608407 82057551 58608409

传真:010-58608409

投稿邮箱:5805191@163.com

登陆网址:(老人出版网)www.lrchuban.com(学校出版网)www.xxchuban.com

(人人出版网)www.rrchuban.com(出版发行网)www.chubanfaxing.com

公司名称:北京天禾佳诚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邮编:102218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立汤路188号北方明珠大厦三号楼1509室

作品展示





王佩英（1915年3月14日—1970年1月18日），河南开封原铁道部铁路专业设计院职工。因上世纪六十年代大饥荒后对毛泽东的政策持异议，并公开支持刘少奇、彭德怀等国家领导人，文革开始后即被关入“牛棚”，“接受群众专政”。1968年10月21日，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以“现行反革命”罪名逮捕王佩英并捆绑毒打，戴上牲口嚼子在全市各区游斗。

1970年1月18日，经公安部领导小组谢富治等人向中央请示，1月22日获批，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下达“〔70〕刑字第19号判决书”，1月27日王佩英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由于担心她喊出口号，在押往卢沟桥枪决的囚车上用细绳勒住了她的咽喉。

1980年4月10日，中共铁道部专业设计院党委会作出《关于为王佩英同志平反的决定》，2011年6月9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王佩英无罪，为其彻底平反昭雪。

《炎黄春秋》杂志2010年第5期发表了郭宇宽的调查报告“寻找王佩英”，介绍了王佩英的生平事迹。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2011）高刑提字第304号

原审被告人王佩英，女，1915年出生，河南省开封市人；原系铁道部铁路专业设计院职工；1968年10月21日被逮捕，1970年1月27日被认定为现行反革命犯，判处死刑（已执行）。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审理原审被告王佩英现行反革命一案，于1970年1月27日作出〔70〕刑字第19号判决书；原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80年3月7日作出（80）中刑监字第295号刑事再审判决书。上述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本院于2011年5月3日作出（2011）高刑监字第173号再审决定书，提审了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判决书认定：王佩英自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八年十月，书写反革命标语一千九百余张，反动诗词三十余首，公开散发到天安门、西单商场等公共场所，并多次当众呼喊反革命口号。故以反革命罪判处王佩英死刑，立即执行。业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原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再审判决书认定：王佩英一九六三年开始患精神病，原判认定王的罪行是其在精神病状态下的胡言乱语，不应负刑事责任。原判以反革命罪判处其死刑是错误的，应予纠正。故判决：撤销北京市公法军管会〔70〕刑字第19号判决书；王佩英不负刑事责任。

本院经审理查明，王佩英原系铁道部铁路专业设计院职工，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0年1月27日，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以反革命罪判处其死刑，已执行。1980年4月10日，中国共产党铁道部专业设计院党委会作出《关于为王佩英同志平反的决定》：为王佩英同志彻底平反昭雪，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对王佩英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全部推翻。

本院认为，依据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王佩英具有“推翻人民民主政权，破坏人民民主事业”的反革命行为和目的。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原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80）中刑监字第295号刑事再审判决书和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70〕刑字第19号判决书。

二、被告人王佩英无罪。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少波
代理审判员 赵英波
代理审判员 张学梅



二〇一一年六月九日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误

书记员 方亮

答 谢

《寻找王佩英》一文发表以来，承蒙诸多
《炎黄春秋》读者关心和慰问，不胜感激。

北京高级人民法院秉公为家母冤屈彻底
平反。

至诚动天。

**告慰英灵于泉壤
昭彰正义于神州**

张 大 中 铭感

2011年6月14日夜

张大中，王佩英三子，改革开放后以铁道部发给家属的1000元抚恤金起家，创办大中电器。现为大中投资和国美电器的董事长。

应正式重新评价陈独秀

一个沉冤几十年的大案

我眼中的广西文革

重读《国际歌》感言

我在“初澜”写文章

戈尔巴乔夫与苏联解体

ISSN 1003-1170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定价: 8.00元